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6期 | VOL.48 NO.2



## 2·2026

TAIZHOU XUEYUAN XUEBAO

# 台州学院教育硕士学位点简介

## 基本情况



学位点迎接全国教指委检查

台州学院教育硕士学位点于202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现代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高素质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为目标。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学位点建立行业全程参与研究生培养机制，组建分工明确和优势互补的“双师型”团队，探索“理论教学—基地实践—学术交流—能力提升”四位一体教学模式，注重对研究生实践创新力和教师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学位点所属学院办学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教师教育特色鲜明，为教育硕士学位点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优质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实践平台。

## 培养方向

学位点下设7个培养方向。1.教育管理：致力于课堂教学评价、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班级与少先队建设等研究；2.小学教育：致力于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小学教师成长、小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研究；3.学科教学（体育）：致力于区域体育教育、训练、竞赛及其管理等研究；4.学科教学（思政）：致力于教师职业道德、现代教育教學理论及方法等研究；5.学科教学（语文）：致力于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等研究；6.学科教学（英语）：致力于现代二语习得理论及方法、中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改革等研究；7.科学与技术教育：致力于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教学理论、课程设计与教学评价策略、大中小学科学教育一体化等研究。



专家来校开展专题讲座



行业导师为硕士研究生作指导

02

Vol.48 No.2

#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6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IS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韩得满  
Editor-in-chief Han Dema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 目次

## 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

具身智能驱动下重思媒介和媒介叙事本质

——基于摹仿论的人机交互叙事研究……………师曾志 | 01

献给自我的嬉游曲：数智时代“小丑”的隐喻建构与生存技艺…肖 键 | 10

“AI时代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生活方式与审美实践中

的活态传承”会议综述……………张慧凤，王紫迎，丁芳菲 | 16

## 外语学科国际话语体系建构

浙江省外文学会2025年年会暨“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陈 蔚 | 21

全球治理视域下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知识生产…严春妹 | 27

## 天台山文化

歌谣的“记忆之场”和地方认同

——以“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为例……………吴芷境 | 34

方孝孺古籍辨伪之探赜 .....陈心怡 | 41

## 语言

《五音集韵》古文中的“以篆为古”例释 .....邱龙升 | 48

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态势 .....陈振艳 | 54

### 体认翻译学与公示语翻译

——以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为例 .....陈丽红 | 62

## 文学

论唐末“诗文互渗”现象的样态及原因 .....蒋宇婷, 李定广 | 69

在场与不在场：“庄周梦蝶”的文学成像 .....邓 歆, 白宪娟 | 77

## 数字新闻

### “基础设施捕获”

——人工智能重塑全球新闻业的实践应用与未来展望 .....张琪云 | 85

# CONTENTS

Rethinking the Essence of Media and Media Narrative Driven by Embodied Intelligence	
—A Study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Narra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mesis .....	Shi Zengzhi   01
Entertainment for the Self: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and Living Techniques of the "Clown"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	
	Xiao Jian   10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AI Era: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Lifestyles and Aesthetic Practices"	
.....	Zhang Huifeng, Wang Ziyang, Ding Fangfei   16
Review of the 2025 Annual Conference of Zhejiang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ciplines .....	
	Chen Wei   21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d Area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	
	Yan Chunmei   27
Realms of Memory and Local Identity of Ballads	
—Taking the Exhibition "The Poetry of the People: A New Collection of Linhai Folk Ballads" as an Example .....	Wu Zhijing   34
An Inquiry into Fang Xiaoru's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Texts .....	
	Chen Xinyi   41
Exemplification of the "Viewing Seal Script as Ancient Characters" of Ancient Characters in <i>Wuyin Jiyun</i> .....	
	Qiu Longsheng   48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	
	Chen Zhenyan   54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nd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aizhou Prefectural City .....	Chen Lihong   62
On the Forms and Causes of Poetry-Prose Interpenetrat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	
	Jiang Yuting, Li Dingguang   69
Presence and Absence: The Literature Imaging of Zhuang Zhou's Dreaming of Being a Butterfly .....	
	Deng Xin, Bai Xianjuan   77
"Infrastructure Captu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Global Journalism .....	Zhang Qiyun   85

# 具身智能驱动下重思媒介和媒介叙事本质

——基于摹仿论的人机交互叙事研究

师曾志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数智时代具身智能推动媒介叙事迎来本质性范式跃迁,研究突破传统媒介研究“媒介是什么”的静态实体论视角,转向“这是什么媒介”的动态生成论思考,提出媒介的本质是“中介性生成”,作为勾连各类关系的“之间”存在,主动建构感知、意义与社会秩序。以亚里士多德摹仿论与叙事思想为思想根基,追溯媒介中介性生成的古典渊源,论证叙事作为媒介化摹仿行动,其真实性显现依托媒介隐匿性与动态性的生成耦合,阐释媒介叙事与人机交互叙事的内涵特征,指出人机交互叙事作为数智时代新型叙事范式,借人机协同、多模态感知与沉浸式体验,实现摹仿主体、叙事方式与认知模式的变革,将叙事从语词中心的有言对话拓展为感官共鸣的无言对话,通过实践持续追问与技术共生的人类自我存在方式,重塑认知、情感、伦理与社会关系。

**关键词:**摹仿;具身智能;媒介叙事;中介性生成;人机交互叙事;生成性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1

## 一、问题提出：从静态实体到 动态生成的媒介研究范式转向

长期以来,媒介研究始终围绕“媒介是什么”这一本质主义展开,研究者多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界定媒介的内涵。从广义层面而言,媒介被阐释为连接世间万物的载体与信息传递的工具,这一界定为“万物皆媒”的思想提供了理据;从狭义层面来看,媒介则被限定于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具体形态,凸显其作为作品、产品以及社会建制所蕴含的规范属性和管理功能。然而,这两种界定路径都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媒介本质的探寻,以此将媒介理解为静态的实体存在。

传统媒介研究多聚焦于媒介的静态本体,侧重分析其物理形态与信息内容,却忽视了媒介在具体情境、微观关系中的动态生成过程,也未能充

分回应具身智能下媒介形态、关系与功能的新变化、新特征与新延伸。这种对媒介本质的认知取向,易将媒介意涵抽象化、封闭化与空洞化,使其内蕴的隐匿性、动态性、连通性与生成性被遮蔽,既无法解释数智时代媒介场域的一系列变革,也难以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解释力困境,甚至因片面强调媒介静态传递信息的功能,分离了媒介与时代语境、社会实践、主体行为之间的深层内在关联。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其与媒介研究的深度交融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也为重构媒介研究视角、解释传统媒介研究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此,本文拟跳出“媒介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迷思,以“这是什么媒介”的认识论提问重构研究框架,推动媒介研究范式从静态实体论转向动态生成论,聚焦于媒介在具身交互场景中、在人与智能体的微观互动中所生成的多元意涵对人事发展的影响,重点考察媒介内容、形式

与功能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所引发的人类认知变革、思维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重塑等问题。为深入阐释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将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叙事思想为研究切入点,追溯媒介生成性特质的古典理论渊源,挖掘摹仿、叙事与媒介中介性生成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媒介本质的重思筑牢思想根基。这一研究不仅聚焦媒介自身的演化脉络,探索具身智能推动下媒介形态的迭代升级,解析当下媒介研究面临的新课题与新挑战,更将为具身智能与媒介研究的深度融合提供兼具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理论思路和实践参考。

## 二、理论溯源：摹仿、叙事 与媒介中介性生成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奠定了摹仿、叙事的思想基础。摹仿作为汇聚人类认知本能、创作实践与行动方式的综合过程,其实现依赖于叙事。叙事通过情节的编织与结构的安排,将散乱的经验整合为具有内在隐喻秩序的符号系统,使潜藏于现实表层下的人性本质与社会关系在故事的展开中获得显现。叙事根植于媒介特性、表现对象与表达方式三者构成的动态关系中,不同艺术门类的叙事本质上是这一动态关系差异化的结果。其中,媒介不仅扮演载体角色,其物质属性与符号象征更主动地建构了叙事的感知边界与在场形态,既决定了叙事展开的客观性、当下性和形态性,也为摹仿的可能性提供了实现条件。这使得摹仿始终并非仅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媒介作用下对可然或必然世界的持续探寻。

摹仿、叙事概念的源头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诗学》。学界普遍认为《诗学》奠定了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基础,其影响贯穿后世诗歌、戏剧、文学创作,直至现代影视、视觉等艺术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作为人类的认知本能,既通过引发审美快感激活人的情致与思维,又以摹仿的逼真性满足人的求知欲,因而成为艺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内核。摹仿不仅是技艺,更是人类理解与定位自身存在的基本路径。叙事的本质是摹仿行动,是对人类行动的摹仿。叙事赋予摹仿可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通过艺术加工不断显现出真实,切近事物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

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进而他指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sup>[1]81</sup>他对历史学家和诗人进行了区别,认为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sup>[1]81</sup>。与历史记录已发生的事不同,诗(叙事艺术)可以描述潜在的可能发生之事,切近一种普遍真实的可能。这种普遍真实的真实,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可度量、可实证的客观事实,而是可穿越时空的关乎人类精神世界、价值意义与存在方式的真实。

亚里士多德洞察到“作为一个整体,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sup>[1]47</sup>。人类自古便具有通过摹仿获得认知与快感的天性,这是诗艺产生的根本动因。摹仿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再现,而是通过叙事行动揭示人性的深层存在。人类天性中的摹仿本能与求知欲望,促使人们通过艺术媒介进行叙事实践。艺术通过特定媒介完成摹仿行为,而观者在观看过程中能够学到东西的心理诉求,则驱动他们从既有经验出发,对叙事所构建的可能性世界展开主动认知与情感投射。摹仿不仅通过叙事揭示行动中人性的内在复杂性,更将艺术从单纯的生活再现提升为对人性本质与存在方式的追寻和创造,从而为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思想确立了超越偶然真实的普遍真实的地位。摹仿既是经验世界向知识转化的源头,又是情感与认知在媒介中凝结而成的整一行动。摹仿在叙事中实现的并非事物的表象,摹仿揭示出必然性或可然性的真实,为人类独立自主的认知地位与不断发现和突转的能力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也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深层确认与持续叩问提供了可能。

在此框架下,媒介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隐匿性和动态性耦合运作的特性。隐匿性使其在叙事中退入背景,却不减其影响力;动态性则令其持续演化,不断重构叙事与经验的链接。这两重特性相互交织,在看似“不可见”的媒介运作中,摹仿的本质被激活,并最终在叙事中得到呈现。由此,媒介不仅是摹仿与叙事的中介性的存在,更是其生成条件和显现机制本身。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媒

介的隐匿性和动态性,便能更深刻地理解摹仿如何在叙事中成为可能,并持续探问:媒介的不可见运作,是如何推动了真实的显现?

### 三、隐匿与显现:媒介化摹仿行动中的真实性建构

叙事作为一种媒介化的摹仿实践,其内在张力正在于媒介本身的属性,它既是通向真实的通道,同时也参与着对真实的遮蔽。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在重塑摹仿的表现形式与认知方式,而这种重塑本质上是通过媒介的隐匿运作实现真实的显现。古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自然爱隐藏”的思想在此被赋予了媒介哲学的维度,即被摹仿的真实既向媒介敞开,也在媒介的特性中被重新编码与延迟显现。由此,媒介并非透明载体,而是以自身的物质性、构型逻辑与时态特征参与到摹仿的真实建构之中。媒介运作机制的不可见、符号形式的非透明以及中介过程的自我消隐,使得摹仿能够超越简单再现,抵达对存在本真的诗意揭示。在这种意义上,媒介的隐匿性与动态性的协同生成是其表意能力与认知潜能的所在。它通过自我消解,使观者得以穿越形式表层,切近意义的更深层结构。

媒介每一次的技术嬗变,都在解蔽与遮蔽的辩证运动中开辟出新的真实显现方式。从口传时代的韵律记忆到数字界面的交互叙事,媒介的隐匿机制不断演化,但其功能始终为摹仿提供不可见的结构性支撑。在古典语境中,羊皮纸的质地、墨迹的渗透、卷轴的物理展开方式,都是隐匿却实质性的叙事参与者;而在算法时代,数据流、界面逻辑与交互协议构成了新的隐匿架构,它们虽然不可直观,却从根本上规定了叙事如何被组织、传播与体验。正是这种动态的隐匿性,使摹仿与叙事的关系始终保持历史性的活力。

进入人机共生的叙事生态,媒介的隐匿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维度。人工智能的生成逻辑、算法的推送机制、虚拟现实的感觉知觉,共同构成了新的隐匿层。这些技术框架虽在日常体验中处于背景位置,却实质性地参与了真实的建构过程。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当代性亦体现于此。真实不再是被再现的静态对象,而是在媒介的隐匿运作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由此,叙事艺术的内在使

命也随之对媒介隐匿机制进行自觉运用与批判性反思,并在技术架构之中,为生命经验的表达开辟出新的空间。

摹仿所彰显的真实与可能性,本质上是一条穿越媒介隐匿性的认知之路。它要求我们不仅关注叙事“言说之物”,更要洞察媒介“以不言而言”的运作机制;不仅欣赏艺术的形式呈现,更要理解隐匿于形式之下的媒介中介性生成的意义内涵,意识到每次技术变革都意味着对真实的再度发现和反转。它促使我们重返自身,重新观看自我和世界,校准认知的路径,并在隐匿与显现的游戏中,持续追寻那既古老又始终富于创造性的真实。

### 四、本质重思:媒介作为隐匿性动态生成系统的运作方式

媒介本质离不开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机制。“自然爱隐藏”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摹仿和叙事的论述,共同为理解媒介的隐匿性与动态性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也为这一认知转向提供了思想依据。“自然爱隐藏”揭示出存在本真的隐匿特质,这不仅指向自然本身,更折射出媒介运作的基本特征:真正的媒介力量往往并不显现在表象层面,而是以隐性结构、关系网络与权力资源的形式渗透于人类实践,主导而不张扬。亚里士多德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摹仿与叙事的阐释,则暗合了媒介的动态生成性。摹仿并非对既定现实的静态复制,而是在叙事中不断生成、持续重构的开放过程。

这些思考共同指向一种媒介本体论,即媒介功能处于“由显入隐,再以隐驭显”的复杂关系之中。媒介的隐匿性构成了由显入隐的基础,使媒介从表面的具象实体(如纸张、屏幕)转化为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算法逻辑;而媒介的动态性则开辟了以隐驭显的路径,其隐匿的媒介力量通过持续的动态生成、实时调适与语境适配,不断转化为显性的叙事形态、认知模式与社会实践。这呼应了当代媒介研究中的关键转向:从将媒介视为静态的再现工具转向将其理解为动态的生成系统与认知基础架构。

当万物皆媒成为现实,媒介已从实体更多地走向关系,从稳定结构变化为流动生成,媒介研究也随之经历从静态再现观向动态生成观的本体论

与认识论转型。它要求我们以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式的“根茎思维”追问——媒介正朝何种形态演化?它以怎样的速度、节奏与强度发展?它又与哪些社会力量、技术逻辑和主体实践相互交织、协同生成?唯有穿透媒介的显性表象,我们才能洞察那个以隐匿为底色、以动态生成为运行逻辑的媒介本质,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人类的认知、交往与存在方式。这亦是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介叙事的命题:当AIGC深度嵌入创作流程,叙事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正被无形中重构,其背后正是媒介隐匿性与动态性两者的耦合机制。

这一耦合机制亦深刻塑造着当代媒介叙事的特征:隐匿性让叙事重构悄然发生、不露痕迹;动态性则使之灵活适配、不断演进。媒介所敞开的可能性与诠释空间,经由不同主体的具身体验与意义协商,持续转化为鲜活的生命传播,从根本上重塑人们感知世界、组织经验、赋予意义乃至展开行动的方式。通过文字、图像、代码、交互界面等多重符号系统的交织互动,媒介叙事得以构筑开放多元、层次丰富的故事世界,实现叙事时空的发现、突变、转折与拓展。技术迭代,尤其是AIGC对传播场域的系统性嵌入,持续拓展着媒介叙事的形式边界与功能维度。媒介不再仅是内容的载体,其形式本身也获得了本体性意义:一方面,隐匿性使其以无形中介的方式参与叙事时空建构、冲突编织与关系转化,将自身干预痕迹巧妙消融于沉浸式体验之中;另一方面,动态性则打破了传统叙事的静态封闭与线性传播,使之在技术迭代、场景适配与多主体互动中实现非线性的动态生成与持续演化。

这为当代媒介研究带来的启示在于:媒介并非先验固定的实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与社会实践中持续生成的关系性存在,其本质始终包含着隐匿性与动态性的联动和共振。真正的媒介力量常以隐匿为运作底色,在持续演化与渗透中悄然发生作用,因而把握媒介需要我们保持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对自我认知的反思以及对现实情境的介入,穿透表象以洞察其隐性作用与权力关系,顺应其动态生成的规律。在“隐”与“显”的动态生成中,我们得以探索媒介与人类共生的可能路径,趋近对世界与自我本真的理解。最终,指引媒介研究导向一种具有伦理关切与生命温度的实践智慧,正视媒介的演进而非被其裹挟,使其隐匿性成为承载意义的方式,以其动态性促成意义的持续生成

与联结,从而拓展人类对存在与生命形式的理解。这正是重思媒介本质、回应时代命题的要义。

## 五、媒介中介性生成:作为“之间”“关系”的生成性

从“媒介是什么”到“这是什么媒介”的认识论转向,标志着学界对媒介的理解已从静态的实体范畴迈向动态的关系范畴,其在当下社会变迁中的建构性作用愈发凸显。尤其在具身智能深度嵌入媒介生态与日常生活的今天,这一转向更成为理解媒介本质、把握媒介生产规律的关键。传统媒介研究多以出版物、电视、电影等具象实体为分析范本,这种基于介质形态的分类虽直观易懂,却陷入载体论与工具论的局限。它将媒介简化为静态的文本容器或技术工具,既忽视了媒介背后的制度化传播逻辑,也遮蔽了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权力结构,难以把握媒介演化脉络、洞察社会变迁对媒介体制机制的重塑,更无力回应具身智能引发的媒介生产范式变革。这种认知更割裂了媒介中介性生成对历史进程的建构作用,既无法回应AIGC、算法平台等技术对媒介生态的颠覆性重构,也难以解释人机协同生产带来的社会影响、解读其在生命传播与艺术实践中的价值,最终弱化了媒介化实践对个人与社会的能动建构意义。

具身智能的到来,尤其是AIGC规模化、日常化的应用,突破了人们对媒介静态性的认知局限,也让媒介作为“之间”“关系”的生成性本质得以具象化显现。当人们将对媒介本质的追问置于动态生成的视角下便会发现,媒介并非预存的实体,而是作为“之间”“关系”的存在,即它是连接主客体、社会关系、权力资源乃至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中介性场域,具有动态生成、主动生产的特征。

媒介中介性生成重塑着传播主体、过程与秩序,更让媒介作为“之间”的生产性本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AIGC的崛起为这一反思提供了具象的实践活动与学理支撑。媒介中介性生成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对媒介本质反思的结果。它超越了传统媒介工具论的认知,凸显了媒介的能动性、实践性与生成性本质。媒介绝非被动承载信息的静态工具,而是作为活态中介参与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社会和认知自我的过程,它不再是单纯的媒介工具延伸,而是成为媒介中介性生成的主体之

一,与人类主体、技术环境、社会规范等形成多元互嵌的生产格局。媒介在连接各类关系、促成彼此联结的过程中,并非被动作为,而是主动生产并塑造着感知主体。它们持续释放感觉、感知、认知与意义,唤醒人们的社会本能。其塑造的审美取向与文化氛围所凝结的共情伦理,正不断重塑社会关系本身,并进一步深刻影响政治、经济等权力资源的运作逻辑,最终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确证自我的基本方式。AIGC的介入让这种感知和意义的生产从人类主导、技术辅助转向人机协同、智能生成,其无中生有的生成能力,也印证了媒介隐匿性与动态性本质的存在,成为媒介中介性生成的内涵与实践形态。

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也为我们理解具身智能下的媒介中介性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批判了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被动反映的传统观点,提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过程。在威廉斯看来,文艺等文化形式本质上是媒介化实践,这种实践并非静态的意义呈现,而是具有鲜明的“构形”特征。构形强调媒介化实践与语言、符号、写作、技术、身体及社会环境等要素的深度纠缠与不可分割,明确指出意义并非预先存在的客观显现,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包括媒介化实践)生产出来的。威廉斯的这一核心思想,与媒介中介性生成所凸显的生产性内核形成了深层的思想呼应。作为一种新型技术要素,AIGC深度嵌入媒介化实践的全流程,与人类主体、语言符号、社会环境等要素相互纠缠、彼此建构,其生成的内容、塑造的认知、引导的行为,本质上都是这种构形实践的具体产物。可以说,AIGC的介入让媒介更深入地参与并主导了意义的生成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也让威廉斯所强调的媒介化实践的构形性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随着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传播速度加快的同时,感觉、情绪、情感等也参与到即时交互中。这意味着身心、技术、符号等多要素跨媒介叙事在各种信息生产与生成中愈发凸显出其重塑社会的力量。当现代技术不断冲破传统社会壁垒时,隐匿在技能和信息鸿沟背后的认知鸿沟也得以显现,与自我相关的如表情、眼神、语气等微具身进一步揭示出媒介中介性生成对自我认知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媒介中介性生成参与到自我和社会建构之中,其充满创造性的生产过程,使人类感觉、感知

与情感也加入了意义的生产与行动之中。

媒介中介性生成始终处于多重主体的编织、纠缠与互嵌之中,通过动态实践不断推动社会的再秩序化。媒介与人类并非相互孤立的实体,而是通过内在的多重互动实现相互生成、共同演进。媒介既非中立的信息信使,也非主宰一切的自主主体,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与技术环境、使用者、规范、制度、权力、感知等持续展开互构,不断重构社会行为规则与法制框架。媒介中介性生成在回应人们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会被既有的社会关系反向塑造与强化,形成媒介化制度的循环反馈机制。这种多重互嵌的关系,使得媒介化实践逐渐演变为媒介社会化的维度,其影响具有持久性与不可逆性,最终重构社会运行机制并成为社会结构性的要件之一。

具身智能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媒介中介性生成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媒介化实践中凸显了其隐匿性与动态性特质。媒介既联结着人类主体的需求、情感与认知,承载生命体验的传递与审美情感的表达,也衔接技术逻辑、数据资源与社会规范,以隐匿运作动态调和生命传播的真实性与艺术表达的创造性,并通过摹仿叙事,将鲜活的生命形态与艺术审美价值转化为可传播、可感知的媒介内容。这种中介功能正是媒介中介性生成的集中体现:它以摹仿叙事为认识论传递生命意义与艺术价值,以动态性适配生命传播与艺术创作的流变特质,以隐匿性实现生命体验、艺术审美与技术算法的融合,并借助智能生成将人类的生命感悟与艺术构想转化为具体媒介内容,把技术算法与社会规范嵌入意义生产过程,最终指向人机协同、共生演进的媒介生态,使媒介中介性生成成为联结生命传播、艺术实践与技术革新的纽带。

当下反思媒介中介性生成的思想意义,在于它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割裂,突破非此即彼的对立认知框架,以构形为分析工具,揭示媒介与社会共生演化的内外在形式,从动态视角追踪媒介化实践如何通过多元连接生成新的社会秩序,为理解社会变迁提供新的思考方式。这一思想提醒人们,需以批判性与建设性互动的姿态介入现实与自我,既要警惕审美浅表化、自我表演化的认知困境,关切资本与技术合谋下的异化风险,更要呼吁通过媒介素养的提升与媒介生态的治理,重构文化生产的公共性。媒介中介性生成的这些变革与反思,最终都落脚于媒介叙事形态

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人机媒介叙事的范式变革,成为数智时代媒介发展的标识。

## 六、概念延伸：媒介叙事的界定、 时空特征与感知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是叙事的本源,叙事通过摹仿现实的行动与关系呈现意义。而媒介叙事则将这种摹仿行为拓展至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借助媒介的技术特性,打破了传统摹仿叙事的时空局限与主体单一性,让摹仿对象、方式与意义生成均呈现出动态生成的特征。基于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思想,媒介叙事可界定为以各类媒介为载体,延续叙事作为摹仿行动的本质,通过符号、技术、语境以及感知、情感等的联动,对事件、关系与意义进行再现、重构与传播的活动。媒介叙事具有鲜明的跨时空性,其叙事主客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持续转化的动态关系之中。叙事主体可由人、机器或人机协同担任,叙事客体则可跨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边界,涵盖不同空间场域的事件与符号。差异与歧义在这种更广阔的时空场域内不断碰撞、链接,进而生成新的意义。

不同于传统叙事“起—中—终”的固化结构,人机交互叙事作为媒介叙事的重要形态,并未脱离摹仿的本质,而是在显现与隐匿、看见与看不见的媒介互动间完成对现实的摹仿与重构。它依托于跨越时空的事件链条的持续聚合与分化,在因果同时与因果异时的反复纠缠中,呈现出线性与非线性交织的延展特征。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媒介叙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互呼应之中,也正是媒介叙事突破传统摹仿叙事时空局限的关键所在。

媒介叙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在于时间观的呈现方式。共时性的时间是隐蔽的,侧重空间维度上的关系聚合;历时性的时间是显性的,侧重时间维度上的延展。而时间本身,成为理解两者关系、把握媒介叙事摹仿本质的基础。被隐匿的时间与显性标注的时间之间,那种复杂的生成、交织与消弭关系,不仅丰富了媒介叙事对现实的摹仿,更赋予了媒介叙事超越传统摹仿叙事的妙不可言的意义张力。共时性观照着复杂系统中各方事物之间的关系与连接,在这种视角下,时间因素处于隐匿状态,事物之间的联系既可能是有明确因果的,

也可能是无因无果的偶然关联,但无论何种形式,都在媒介叙事的摹仿框架内,构成对现实关系的多元再现;历时性则清晰标注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遵循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线性摹仿与呈现。

媒介对人类感知的延伸,让媒介叙事的跨时空传播与多元意义生成成为可能。媒介叙事所具有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以及其对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思想的延伸,与人们的媒介感知、叙事真实性等议题深度关联。诸多学者早已给出深刻洞察,其中加拿大媒介研究者麦克卢汉的论述尤为重要。他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听觉与视觉作为两种不同的感知媒介,对人类意识乃至社会形态的塑造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在电力时代的技术语境下,他率先提出人类中枢神经系统靠技术得到了延伸的论断,并进一步阐释道:“在部落文化中,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听觉与低清晰度的、中性的视觉不同,它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无所不包的。口头文化在行动的同时要作出反应,拼音文化却赋予人行动时压抑情感和情绪的手段。只行动而不用作出反应,不用卷入其间,这是使用文字的西方人特有的优越性。”<sup>[2]</sup>麦克卢汉的话揭示了媒介感知与人类认知模式、叙事方式的内在关联,为人们理解媒介叙事为何能打破传统摹仿叙事的时空局限、实现主客体动态转化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

如果说麦克卢汉的论述从媒介感知维度,呼应了媒介叙事的技术特性与时空特征,那么英国艺术家和思想者约翰·伯格则从叙事真实性的维度,进一步佐证了媒介叙事的意义生成逻辑,点明了体验的模糊性对意义建构的价值,并与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再现现实行动与关系的本质形成呼应。伯格曾言:“一切‘美的’写作都是晦暗的。真实性只来源于一种单一的忠诚:对于体验之模棱两可的忠诚。它的力量只出现在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的方式之中。”<sup>[3]244</sup>这一观点直指叙事真实性的本质,叙事的真实性并非依附于语词的精准表达,更植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认知实践之中,尤其是在行动所蕴含的无穷歧义,以及由行动引发的切实改变之中。这与媒介叙事通过摹仿现实、重构关系生成意义高度契合。媒介叙事所具有的跨时空性、动态性、多义性,为这种植根于个体体验的模糊性与歧义性,提供了展现叙事真实性的有效空间,也让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思想在数智

时代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数智技术快速迭代、媒介形态持续革新的当下,媒介叙事的意义生成关系日益复杂,与其隐喻的内在性关联愈发凸显,“媒介即隐喻”也成为剖析数智时代媒介叙事本质、把握意义建构规律的重要切入点。隐喻作为认知与表达工具,为媒介叙事搭建起跨时空的关系联结,为意义建构与行动指向提供可能。媒介以“关系”与“之间”的存在形态成为语义创新与意义生成的关键,它以既有认知框架帮助受众解码陌生叙事符号,又以陌生化策略推动固有认知的突破,在熟悉与陌生的互动中完成意义重构。这一隐喻机制既承继了亚里士多德摹仿论中叙事建构现实意义与未来可能的内核,又契合数智时代媒介叙事的特征,进一步释放了媒介叙事的意义张力,让理解兼具感官体验与语言表达的活力,打破叙事元素间的固有壁垒,在看似断裂、无关的符号与事件间重塑关联。

人类的感性经验与理性认知在媒介叙事构筑的跨时空场域中共同参与意义编织,使摹仿从对现实的简单复刻转向更具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而叙事情节与行为在分化与聚合中于宏观时空维度不断形成新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并非外在于个体的抽象框架,而是与个体生存实践深度联结,既呼应了伯格所强调的叙事真实性植根于个体体验,也符合媒介叙事主客体动态转化的特质。个体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沉浸体验、情感共鸣与意义理解,本质上是媒介隐喻通过调动多重感官、叙事模式显现出个体意图与生存经验所形成的协同效应。个体对异质性事物的理解视角、认知视野,以及目标预设、因果逻辑、偶然机遇等要素,均深度嵌入意义生成的过程。由此,不同媒介叙事的独特属性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成为意义建构的差异化资源,共同彰显出数智时代媒介隐喻与叙事对人类认知方式与实践活动的深层塑造力。

## 七、范式演进：人机交互叙事的 界定、技术基底与摹仿深化

作为媒介叙事在数智时代的延伸与新型范式,人机交互叙事既承继了传统媒介叙事跨时空、动态化、多义性的特质,又依托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实现了媒介隐喻的具身化转译,并推动叙事形态、叙事主体与实践行动发生根本性突破,从而成

为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重要实践形态。从本质上看,人机交互叙事是一种以技术发展为基底,尤其依托AIGC、多模态合成与跨平台分发等技术融合而形成的新型叙事模式,主要通过人机协作动态重构叙事要素,生成高度个性化、沉浸式的叙事体验。这一模式既与媒介叙事摹仿现实、建构意义的本质一脉相承,又在技术支撑下突破了传统媒介叙事的既有边界,展现出具身智能叙事实践的新可能。

与传统叙事形态相比,人机交互叙事打破了传统媒介对摹仿实践的封闭性。传统叙事始终受限于媒介的内容属性,往往忽视了媒介形式对摹仿实践的建构性作用。印刷时代的文字媒介塑造了线性、分离式的认知思维,催生了思想与行动、自我与世界相互割裂的认知模式。影像媒介主导的传统影视时代,叙事权力高度集中于创作端,观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位置,难以真正参与到摹仿中的自我探寻与意义建构。即便部分早期科幻作品尝试以非线性、留白叙事等方式激活观众认知潜能,也未能突破传统媒介的封闭性。直至人机交互功能落地,依托算法技术的赋能与跨平台的交互整合,才真正推动摹仿叙事从静态封闭的文本形态,转向人机交互叙事所呈现的动态开放的系统形态。

作为感官与言辞交融的意义建构纽带,媒介隐喻与叙事思维模式的协同发力,成为解析人机交互叙事发展本质的视角,而人机交互叙事的异质性特征,本质上就是媒介隐喻突破传统媒介叙事边界、随传播技术变化促进媒介中介性生成的具象呈现,个人自我的存在方式也成为媒介隐喻与叙事深度勾连自我生存实践的场域。个人在人机交互叙事中的生命重心调适,正是媒介隐喻激活多重感官联动的结果,眼、耳、身、意等感官维度的纵横呼应,打破了视觉、听觉等感知叙事的孤立状态,使语言、感觉、情感等要素共同构成媒介叙事运作的基础,既契合了叙事模式对人类经验时空根基的聚焦,也延续了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关注行动与个人体验的内核。

数智时代的人机交互叙事,进一步强化了摹仿的认知功能与情感价值,这也是其对亚里士多德摹仿、叙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算法对多重媒介符号的多模态整合,人机交互叙事为个人提供了更丰富的摹仿对象与体验场景,使知识的获取与推论更具沉浸感与主动性。“人间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等网络语的流行,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自我天性和本能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正是通过人机交互叙事的摹仿实践得以实现。人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下,渴望通过对真实生活场景与情感的摹仿,回归自我天性、追寻本能化情感的真实需要。这种摹仿所具备的情感净化功能,能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疗愈与身心平衡。当网络视觉传播泛滥导致符号摹仿取代真实摹仿时,人们转向线下贵州村超、苏超、湘超等地域性体育赛事寻求真实快感。这一现象也印证了人机交互叙事的摹仿实践,始终以捕捉真实人性与具体情感为核心旨归。

## 八、本质呈现：人机交互叙事 作为“无言的对话”与价值校准

纵观媒介演进与叙事转型的复杂过程,跨媒介叙事的符号转译与意义增生,始终延续着亚里士多德摹仿论中追问事物可能性的诉求,而摹仿的本质也在媒介中介性生成的持续作用下,不断向人类生存实践的深度延伸。作为数智时代新型摹仿形态,人机交互叙事的变革集中体现于摹仿主体与叙事实现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其区别于传统跨媒介叙事的特质,叙事话语权从专业创作者、组织机构掌控的等级化、科层化体系,向分布式大众主体迁移,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摹仿意义生成的主流形态,受众得以通过评论、二创、演绎等多元方式主动参与摹仿的叙事建构与意义阐释,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中摹仿主体的垄断性。在此基础上,人机交互叙事更实现了AI生成内容与人类价值校准的深刻博弈,在人机互动过程中形成意图与执行相融合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既延续了摹仿论贴合人类生存实践的本质内核,又赋予摹仿全新的技术载体与实现路径,充分彰显了人机交互叙事的时代创新性。

当AI技术迭代推动媒介叙事与脑科学、情感计算深度融合,人机交互叙事顺势引发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层变革。这一变革既进一步深化了摹仿论的当代内涵,也与伯格关于叙事本质的思考形成跨时空呼应。传统以语言符号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被打破,多模态感知联动的神经可编程叙事成为新的认知载体,而这种叙事形态正是人机交互

叙事的认知呈现,通过人机交互中的多样性衍射与智能具身性感知,构建起适配不同认知模式的动态框架,推动全球化传播从表层信息理解迈向深层感知贯通,使摹仿不再局限于语言符号的单向再现,而是延伸至多感官联动的沉浸式体验建构。

作为人机交互叙事的重要呈现形式,沉浸式视觉传播的兴起推动了摹仿中本能性的回归,唤醒了被遮蔽的人之本性的在场,而这种被遮蔽的,正是人类自身身心的心理变化过程与本真感官体验。沉浸式视觉传播借助人机交互技术,将悬置的主体感受重新拉回自我,使叙事主体不再是空洞的认知载体,而是在瞬时感官冲击与刺激中直抵心性的自我在场。这种感官触感连贯而富有想象、能够无限延伸,让人的身心摆脱僵化意识的束缚,进入自我释放的状态,最终实现感性自我的自主体现。

人机交互叙事在显隐之间不断释放摹仿的本质,使人的感知、情感、认知、思维方式等在跨越时空中持续生产与生成,其根本在于与人类天性、本能、感知、情感的共鸣和共情,并在其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持续净化与提升。这既是对亚里士多德摹仿论源于本能、归于净化主张的当代诠释,也契合伯格对叙事回归人类本真体验的期待。伯格曾指出:“叙事的问题并非如人们经常设想的那样是‘寻找恰当语词’的问题,而是选择和放置事件,允许或鼓动它们无言的对话。”<sup>[3]242-243</sup>这种“无言的对话”指向传统文字媒介无法承载的、基于感官与体验的摹仿形态,而人机交互叙事通过多模态呈现与沉浸式体验,恰好为这种无言的对话提供了可落地的叙事载体,成为伯格这一叙事思想在数智时代的具体实践。

伯格的这一前瞻性思想,与人机交互叙事人机共生、价值校准的形成深度契合与深刻呼应,其对人工智能不可能精确化管理的判断,更为人们解读人机交互叙事的本质、厘清其发展边界提供了重要学理参照。他明确指出:“卷入其间的选择之复杂,当它们涉及整个文本之时,足以击败最精密的计算机,因为这种复杂性永远不可能被充分程式化。作者之被程式化,则是通过他生命的体验和无言的体验,因此他凭着直觉,而极少凭着计算去容纳。他成了自己作品自我保存的本能:这种本能被应用于为相互补足的无穷无尽的歧义保持开放的空间。”<sup>[3]243</sup>在伯格看来,文本创作与解读的复

杂性,根植于创作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与直觉性,这种由个体经验沉淀而成的认知模式,既无法被拆解为标准化的算法规则,也难以转化为可供计算机执行的程式指令。这一判断揭示了人机交互叙事中人类价值校准的必要性。AI固然能高效完成叙事符号的转译与内容生成,却无法替代人类的生命体验与直觉判断,更难以承载叙事中多元歧义的创造性空间。人工智能的运作本质依赖数据建模与逻辑运算,其对文本意义的处理必然会消解人类思维中模糊、多元且充满歧义的创造性空间。这正是伯格预判人工智能无法实现文本深度管理的依据,也为人机交互叙事的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技术赋能绝非技术主导,而是要实现AI生成与人类价值校准的共生共赢,让AI服务于人类摹仿的本能与意义追求。这与人机交互叙事回归人类本真体验、释放摹仿本质的诉求保持一致,更以伯格的学理思考为支撑,进一步理解了人机交互叙事的本质。

具身智能下人机交互叙事作为新的摹仿范式,其终极意义或许正在于:利用技术的生成能力,更深刻、更沉浸地探索和呈现这种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普遍真实,从而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之为人的意义根基与存在尊严。这种沉浸式体验所承载的无言的对话,打破了传统语词叙事的局限,将叙事延伸至感官共鸣与情感共情的层面,回应了伯格回归人类本真体验的叙事期待,也为人机交互叙事的意义转译提供了可能。伯格认为,作家和评论家的使命,在于通过真诚而富有洞察力的观看与言说,打破艺术、阶级、政治等各类壁垒,让被遮蔽的真实、被忽视的人群、被异化的经验,以及事物之间本真的联系,在共同的人类视野中生动显现。其主张延伸至人机交互叙事领域,便转化为技术赋能下的叙事公平,即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摹仿的参与者、意义的阐释者,打破专业创作者的垄断壁垒,彰显人机交互叙事的伦理价值。这既是对伯格美学主张的当代延续,也是人机交互叙事所承载的伦理与政治行动,由此回应数智时代的媒介叙事变革,推动人们共同参与构建更真实、更富有人文关怀的世界。

## 九、结语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摹仿论与叙事思想的当代

重释,本文系统考察了具身智能下的媒介叙事所经历的本质性跃迁。研究表明,传统将媒介视为静态载体或信息工具的认知框架,已无法解释数智技术深度嵌入后,媒介在叙事实践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生成性与建构性力量。媒介的本质,应从“是什么”的实体范畴,转向“如何生成”的关系范畴与过程范畴,即媒介中介性生成。它作为勾连主体、技术、感知与社会的“之间”场域,以其隐匿性与动态性,持续参与并塑造着摹仿的真实性建构与叙事的可能性展开。

人机交互叙事作为这一本质跃迁的集中体现,并非对传统叙事的简单技术叠加,而是一种根植于摹仿本能、由具身智能技术重新赋能的范式变革。它打破了叙事权力的垄断,模糊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边界,通过多模态感知联动与沉浸式体验,将叙事从线性、封闭的语词表达,拓展至非线性、开放的身体感知与情感共鸣领域,实现了伯格所言的无言的对话。然而,技术的赋能亦伴随着深刻的反思: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无法完全程式化人类基于生命体验的直觉与歧义性创造。因此,人机交互叙事的健康发展,在于坚持人机协同与人类价值校准,使技术服务于而非主导人类对自我本质的追问、对真实体验的回归以及对意义世界的共同建构。

展望未来,媒介叙事的研究与实践,应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持续关注媒介中介性生成本质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与人类主体、社会规范、技术环境相互编织、共同演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穿透媒介隐匿运作机制的批判性洞察,更呼唤一种积极的、具身的叙事实践伦理,在技术日益外扩人类智能的进程中,通过自觉的、反思性的媒介化摹仿行动,不断向内返回并叩问人之为人的本质内核,从而在具身智能与人类共生的叙事生态中,维系意义的深度、情感的温度、责任的勇气与生命的厚度。这或许是数智时代媒介叙事本质跃迁所赋予我们的一种启示。

### 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忠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7.
- [3]伯格.约定[M].黄华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下转第15页)

# 献给自我的嬉游曲：数智时代“小丑”的 隐喻建构与生存技艺

肖 键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当代互联网语境下,小丑逐渐演化为高频出现的指称意象与情绪符号。从隐喻视角看,小丑建构了一种理解和表述日常困境的认知框架。结合传统戏剧中的角色功能与艺术地位,小丑又呈现出日常生活拟剧化过程中的集体共演形态。迷因传播中的摹仿机制,进一步推动小丑成为互动性创造实践的对象,从而加速了其扩散,使其在持续复制、变体生成与协同演绎中凝聚群体认同,形成具有边界感的亚文化圈层,产生可信的情感真实。以阿甘本对普尔奇内拉的哲学阐释为参照,小丑显现出生存技艺与韧性的意涵,指向数智时代个体借助共情、协商与创造重构生命叙事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小丑;隐喻;戏剧;摹仿;生存技艺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2

百年前尼采就曾感慨：“我不愿成为圣徒，而宁可成为一个小丑……也许我就是一个小丑吧。”<sup>[1]</sup>通过自嘲为“小丑”，尼采将自身置于当时的标准规范与庄严崇高之外。与其说是秩序的反面，不如说小丑以一种插科打诨的方式暴露了裂缝的存在。在当代语境下，小丑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高频出现的指称意象与情绪符号。人们用“谁是小丑”“你是小丑”“小丑竟在我身边”等表达，戏谑他人的荒谬处境，也调侃自身的尴尬与无力。伴随着热点事件的快速传播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这一语词迅速衍生出大量图文与视频迷因，在不同圈层间流动、复制、变形，形成一种具有高度辨识度的网络亚文化景观。表面看来，“小丑”似乎只是作为情绪出口的网络热梗，但其反复被调用的强度与持续扩散的速度，已远远超出普通流行语的生命周期。小丑所承载的并不仅是轻佻的玩笑，还包含着深层的隐喻意涵。尤其是当代语境下的小丑与阿甘本笔下的小丑普尔奇内拉相遇时，跨越时空的小丑对话得以展开。普尔奇内拉是一种关

于“如何存在”的方式，一种关于韧性、可能性与生命形式的隐喻，在失败、错位与不可能性中以戏谑和游戏维系生命的弹性。当代网络中的小丑显现的恰恰是个体在结构性压力、意义失效与符号过载中的自我体验，而不单纯是失败者的代名词。由此，文章尝试以小丑作为切入点，从隐喻建构、迷因摹仿、戏剧共演与生存技艺等多重维度，探讨这一形象背后隐含的困境与可能性。

## 一、“谁是小丑”：从隐喻出发

作为网络热梗，小丑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和经验提供了可被言说、可识别的形象，个体借助这一指称将自身的尴尬、无力与挣扎具象化。当被追问“谁是小丑”时，问题的关键或许已不再指向某个角色或群体，人们更应看到一种通过隐喻建构起来的经验框架，它以具象的方式组织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

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sup>[2]4</sup>莱考夫和约翰逊研究下的隐喻超越了传统的修辞手法或语言现象,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概念基础,系统性地构建了人们的日常经验。隐喻无处不在,它塑造了我们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而非仅仅是语言修饰。

莱考夫和约翰逊将隐喻划为三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人们将抽象的情感、状态或经历视为有形的实体或物质,以便于指称、量化并谈论它们,这种隐喻被称为“本体隐喻”<sup>[2]24</sup>,小丑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戏剧里的标志性角色逐渐进入日常语境中,人们乐于将自己或他人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和处境与小丑联系在一起。那些难以名状的微妙的负面情感和尴尬处境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变得易于讨论和共情。小丑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多面体,允许通过漫不经心的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它凸显了境遇的荒谬性和个体的卑微感,同时又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更深层的脆弱和伤害。同时,小丑隐喻还是一种“结构隐喻”<sup>[2]62</sup>,即通过一个结构清晰、高度系统化的概念(源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目标域)。目标域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呈现却遭遇尴尬情境,而源域小丑承载的悲喜剧形象在结构上能够与其转换对应。本体与喻体二者共享一种展演式的观看模式,同时兼备外在表现与内在感受之间的断裂性。正是这种对应使得“谁是小丑”“你是小丑”“小丑竟是我自己”等表达能够引发强烈共鸣,将复杂的感觉和体验提炼为一个可被传播和共情的亚文化符号。

小丑的传播和应用有着深刻的隐喻逻辑。传统戏剧中小丑的整套符号系统被结构化地映射到现代人在种种情境中所遭遇的尴尬与失败等体验之上,比如精心营造的社交人设就像小丑夸张的妆容,滑稽的行为举止就像是取悦观众的表演,自嘲自黑的姿态体现着小丑的幽默等。小丑隐喻的运作也具有严密的系统性,提供了一系列描述性的语言标签,同时重塑了人们对特定处境的认知方式和建构框架。这种系统性转换凸显了情境的荒诞性、情感的复杂性以及自我的客体化,对他人而言多了一番玩梗与狂欢,对自己而言则使痛苦被外化审视,从而获得一定的心理防御距离,实现对痛苦的消解。

小丑隐喻源于更宏大的戏剧隐喻系统,后者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日常语言中,人们早已

习惯借助戏剧隐喻来理解和组织社会经验。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可感知、可操作的概念框架,将复杂的社会互动转化为可被直观理解的戏剧领域里的经验图式。表1汇集了汉语中常见的戏剧隐喻,部分展示了这一隐喻体系如何渗透到日常表述中。

表1 常见的戏剧隐喻<sup>①</sup>

戏剧领域类别	相关隐喻
戏剧流程类	开场、落幕、谢幕、压轴、救场、走过场、打圆场、重头戏
表演技法类	靠谱/离谱、唱高调、对台戏、叫板、一板一眼、大打出手
角色分工类	角儿/腕儿、龙套、台柱子、挑大梁、打下手、大拿、红脸/白脸
观众舞台类	亮相、喝彩、捧场、砸场子、平台、台前幕后、草台班子

## 二、“小丑竟在我身边”： 摹仿行为中的情感真实

小丑热梗的流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摹仿行为,玩梗相当于实现了莱考夫等人所说的“基于互动的创造性理解”<sup>[2]201</sup>。摹仿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行为模式,为当下理解网络迷因的传播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sup>[3]47</sup>人的摹仿本能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中,更是人类学习和社会化的基本方式,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文化创造和文明延续的基本规律。在网络时代,摹仿以迷因的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玩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其魅力超越了小丑等梗词本身的内涵和价值,更多在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机制。网民通过复制、改编和传播某种特定的表达形式,相互鼓励二次创作,参与到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共创过程中。摹仿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的过程,创作者会在重复的过程中寻找更适合的玩法,最成功的变体往往是那些

<sup>①</sup> 部分参考:《这些日常用语竟都源自戏曲》,https://m.newsduan.com/static/content/MP/2025-06-11/13823608809934169.html。

最能迎合当下社会心理需求的版本。各类流行梗在特定的时期加速适应新的语境,产生丰富变体,形成一个动态发展的迷因系统。这种适应性演化使得迷因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强大的文化活力。除了在形式上的复制,摹仿更包含着对特定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的共享。摹仿者们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在一定的互动规则和创造性的情境下,诸如小丑表情包、特定小丑句式等,都赋予了懂梗、玩梗的人以身份认同。这些特征使得类似小丑的梗词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媒介。这种网络亚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参与感和互动性,不断扩大玩梗的情境、群体以及文化圈层。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著于2014年的一部哲学小品。该书以意大利即兴喜剧传统中的小丑形象“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为核心,通过图像、寓言与哲学片段交织的方式,展开一场关于生命、政治与可能性的沉思,其形式与主题的高度统一,仿佛一首断裂而跳跃的“嬉游曲”。在阿甘本看来,普尔奇内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副词:他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如何”<sup>[4]62</sup>。普尔奇内拉作为一种小丑隐喻,超越了静态身份的指认,转向对生存方式的动态描述,启发人如何应对、如何表演、如何在场。阿甘本认为“在语言中,展示一种不可能性,并以此制造笑声——这就是喜剧的本质”<sup>[4]24</sup>,其中的“不可能性”是指语言层面的不可能性,但这种不可能性暗示着无限的可能性,引人发笑并令人信服,指向情感与叙事的真实和可信。

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对经验现实的某种提炼、强化甚至背离,以建构一种更加纯粹、更加典型的情感象征。小丑夸张的话语实践将现实中平铺直叙的经历集中到一个鲜明的戏剧化符号上,通过话语建构和迷因扩散将其转译为更具张力、直指人心的离谱和反常,在虚拟空间中营造一种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情感真实。“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sup>[3]170</sup>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件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只要在情感上、逻辑上或表达上符合某类人的普遍处境与反应,就比一件虽然可能发生却令人无法信服的事更具艺术层面或符号层面上的可取性(见图1)。因为艺术创作的目的并不是如实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通过某一类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展演来表达普遍的“可然或

必然原则”<sup>[3]81</sup>。尼采认为“一切戏剧观点的第一定律是应当作为真实发挥作用的东西是不可成为真实的”<sup>[5]965</sup>。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就在不断生产着“作为真实发挥作用”但“不可成为真实”的拟态景观。在符号层面,“可信”的标准从现实经验的真实转向叙事、情感和群体认同的真实。小丑梗的可信在于它准确捕捉和表达了某种集体情感体验,其描述的情境是否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则并不重要。当一个迷因能够唤起广泛共鸣时,它就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可信性。这种可信不仅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还依赖于迷因传播过程中的社会验证机制。小丑梗能够流行,说明它成功地捕捉到了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或集体情绪。现代个体在生活中屡屡受挫、自我价值感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荒诞感与无奈感,经由这种夸张的表达,高度凝结成一种普遍的生存体验。小丑语词描绘的不一定是事实,但一定表达了某种真实情感,因而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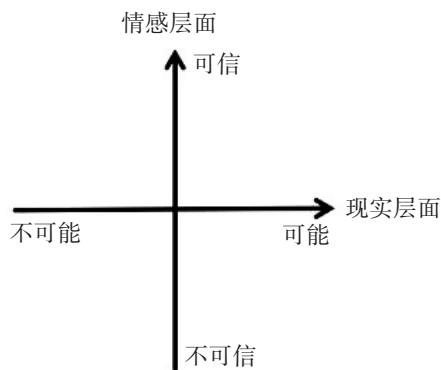


图1 可能与可信

### 三、“无丑不成戏”： 日常生活中的共演

小丑在传统戏剧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其重要性远超出插科打诨的边缘点缀。“丑是戏中胆”<sup>[6]1</sup>,小丑往往是一部剧目的点睛之笔,能够最为直接深刻地概括戏剧及人生,承载厚重繁复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效果。方家有言,“丑角不开面,他角不得抹彩”“尊丑系梨园特色,如果梨园外人重丑,方被视为戏曲行家”<sup>[6]41</sup>。能否读懂小丑甚至成为评判戏剧鉴赏水平的标准之一,足见其在戏剧体系内的重要性。小丑艺术的繁荣与社会心理动因密切

关联:在社会层面,它回应了民众在乱世中借戏剧揭露丑恶、呼唤英雄以整饬世道的普遍期待;在心理层面,它则为承受重压的百姓提供了一个得以委婉讽谏、宣泄郁愤的艺术出口<sup>[6]45-47</sup>。

“看透梨园生觉悟,从来做戏要逢场”<sup>[6]19</sup>,人生如戏,在过去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媒介使用并不繁复,人们只需扮演某个固定角色或只在某个特定的场合表演,而在当代每个主体都需掌握流动的生存技艺,做活戏,活做戏。小丑的每一次登台都不是对固定剧本的机械重复,都是在不同场景下的即兴创造与对当下的回应,以保持对表演的新鲜感。与之对应的,在传统戏剧中丑角享有“言无邮”<sup>[6]80</sup>(“邮”通“尤”,即无过失)的特权,语言可自由发挥,丑角表演贵在“活”字,戏“活”乃丑行根本<sup>[6]116</sup>。同时丑行具有天然的平民意识,能直率表达一个群体的心声,其角色跨度极大,正如“丑角在戏中常扮演八面玲珑、性格随环境和剧情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人物”<sup>[6]84</sup>。在数智时代,社交媒体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媒介赋予当代人更广阔的展演空间,表演逐渐突破了戏里戏外、线上线下的界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活度。在这般混杂的场景下,“演员和面具被召集于一个领域,真实生命和舞台场景变得模糊不清”<sup>[4]71</sup>,原本属于后台的真实生活逐渐具有表演性质,原本属于前台的展演变得更具“活人感”而更加令人信服。

阿甘本笔下的小丑普尔奇内拉本质上是在群聚性地展演,或称共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的,最喜欢做的事诸如跳舞、搞怪、恋爱、习艺等,作者概括为“总之就是生活”<sup>[4]70</sup>。小丑的剧目总是围绕日常生活中的一桩桩具体事件展开,正如尼采通过对“戏剧”(Drama)的语词考古,建构了对戏剧的多立亚僧侣式的阐释,即“戏剧是事情、事件、神圣故事、莫基传说、对僧侣使命的沉思和回忆”<sup>[5]94</sup>。小丑及其围观群体没有明确架构和固定成员,是一个由瞬间的情感共鸣聚集而成的成分多变的临时集群,是一种短暂、松散却真实存在的“情感共同体”<sup>[7]5</sup>。马费索利认为界限分明的传统范畴已难以描述那些轮廓模糊的新型聚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植于日常交流、氛围、感觉和情感的“社会本能”<sup>[7]5</sup>。迷因本身是易逝的、不稳定的,但小丑所承载的消解性与防御性功能如一根坚韧的主线贯穿于有机群体之中。小丑的流行依赖于“共同经历的感觉或情感的感染机制”<sup>[7]7</sup>,

其剧目强调对“戏剧性事件的共同体验”<sup>[5]94</sup>。共同感受和意见的产生不再源于理性说教,在当下更多源于“日常基质”<sup>[7]7</sup>,比如路边八卦、茶馆闲聊以及网络冲浪等。在群聊、评论区、弹幕等邻近的数字空间里,情感通过共同展演得以具身化、在场化,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感受性”<sup>[7]7</sup>,这种内部的集体记忆与微型语境让每个理解、使用、品鉴小丑语词和小丑行为的人都能够确认彼此属于共在群体。

#### 四、“小丑净是我自己”: 断裂中的生存技艺

“韧性”,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5年十大流行语中位居榜首。在社会心理层面,韧性尤其强调人们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指向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弹性、可持续的意志品质。小丑普尔奇内拉在戏剧中永远不死,正如阿甘本所言“普尔奇内拉与死亡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关系,如同神圣人,人们怎么也杀不死他”<sup>[4]73</sup>,他被抛弃于秩序之外,又在这种被抛弃中获得了一种无法被终结的生存姿态;无论顺境逆境,他始终是一个“幸存者”<sup>[4]16</sup>的形象。小丑与死亡有着紧密关系,但小丑的使命绝非献身于死亡。面对困境与绝望时,他总是以插科打诨和戏谑轻浮的方式对死亡进行消解,从不逃避或畏惧。小丑通过幽默拉开人们与痛苦的距离,将看似绝对的终结转化为可被审视、可被揶揄的对象,“它诙谐地占据了死亡的位置,它戏弄着死亡”<sup>[4]89</sup>。于是,韧性便体现在以主动的戏谑的姿态面对困境,消解生活中面临的无奈与压迫,为自身赢得行动与转换的机会。普尔奇内拉对终结有着清醒的沉思,阿甘本赋予他“神学里的复归形象”<sup>[4]16</sup>。所谓“复归”需要一种强大的韧性,保持在每一次终结之后重新进入生活的可能。普尔奇内拉的韧性显现于这种往复之中:他清楚终结不可避免,但终结并不意味着意义的消失;他承认失败与荒诞,却不将自己交付给虚无。

当成功叙事与精英话语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强化,那些无法达标、无法融入的人,常常以小丑自嘲。自黑既是一种防御性的幽默,也是一种对现实秩序的间接接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小丑叙事是对英雄或精英的软化和消解。特里林认为

“英雄就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感……自身气派的提高不过是装腔作势,道德上又不免矫揉造作……英雄实际上就是一个演员,他的角色就是他的厄运”<sup>[8]</sup>。这一尖锐的批判揭示了英雄或精英形象的本质是经由文化建构与集体想象编织而成的一种角色扮演。当话语和权力塑造起一座又一座完美雕像的时候,类似的虚构不仅显得荒诞,更在日常实践中阻碍了真实行动的可能。一旦个体的本真性在持续表演中丧失殆尽,所谓精英的高贵感逐渐沦为演技与修辞的粉饰,社会的倦怠与失望便显现了。与之相反,小丑形象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断裂式的反抗,以普尔奇内拉般的插科打诨或荒诞举止实现其核心功能,即“打断行动并将人物从一切责任的指派中解放出来”<sup>[4]58</sup>。与纯粹的破坏或中止交流不同,戏谑地打断往往是对日常叙事连贯性与逻辑推进的创造性悬置,特别是对秩序与责任的颠覆。通过滑稽与错位的表现形式,小丑身份的寄居暂时瓦解了严肃的权力结构和日常规范,将主体从固定的角色期待与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新的可能性开辟空间。

对于普尔奇内拉来说,生活的意义反而在终结之时开始流动,困境是现实秩序出现裂缝的时刻。一瞬间的松动和空隙打破了日常功能与职责界定的生存模式,生命由此不被锁定在既定轨道上,投入一种开放状态,向尚未完成的可能性场域敞开。阿甘本认为“普尔奇内拉既被绑着,又被堵住了嘴巴:他说的只是言说的不可能性,他做的只是行动的不可能性,而这样的不可能性就是完美的政治使命”<sup>[4]83</sup>。他处在“正常的”言说与行动同时失效的状态之中,他的存在不再适用于任何可被识别的角色或效用,因此权力赖以运作的规则结构被悬置了。正是在这种无法被归类、无法被利用的姿态中,异质的小丑般的生存技艺浮现出来了。

## 五、结语

在数智时代,信息的来源有明的渠道,也有暗的渠道。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论战无止无休,在似是而非、明暗交织的边缘地带反复横跳不失为一种乐趣。眼花缭乱的面具、千人千面的身份、暧昧模糊的语词……都在这个可以被无限复制与重

组的代码时空中,为日常生活重新赋予一种变动不居的灵韵。小丑以其戏谑与荒诞为个体提供了一种面对压力的表达方式,也为情绪的释放与意义的转化打开了新的出口。然而,隐喻游戏通过已知领域点亮未知领域的同时,这个符号操控的过程也必然隐藏了一系列问题。当小丑语词被反复调用为一种自我指认,它在麻醉痛苦的同时,也可能遮蔽个体改变处境的能动性,淡化社会环境的结构性问题,消解愤怒与悲伤等情绪的严肃性与正当性。更重要的是,流行本身并不意味着深刻和正义,一些热梗可能是短暂的情绪共振与宣泄,也可能仅是受到算法推荐和商业逻辑等外在机制的放大。

在生活中无论是摹仿、展演抑或游戏,视角始终需要回归于自身。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理解自己与理解他人本质上是同一种能力<sup>[2]200-202</sup>。虽然人们常认为自己更易了解自身,但真正深刻的自我认知必然要求我们超越个人界限,从与自然、文化及他人的关系网络的互动中寻找答案。因此,相互理解所需的共情与对话能力是深入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在自我理解的实践中,人们不断尝试整合自身多样的经历,以构建一个连贯的生活叙事。人类会主动寻找或创造个人隐喻,以此来连接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赋予生活以整体意义。这意味着自我理解是一个创造性的动态过程,在与自身经验的反复协商中,通过觉察激活那些潜藏的个人隐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照顾好自己,不断重构生命叙事,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1]尼采. 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55.
- [2]莱考夫,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3]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4]阿甘本.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M]. 尉光吉,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5]尼采. 权力意志[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6]赵兴红. 无丑不成戏:京剧丑角艺术研究[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24.
- [7]马费索利. 部落时代[M]. 许轶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8]特里林. 诚与真[M]. 刘佳林,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5-87.

## Entertainment for the Self: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and Living Techniques of the "Clown"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Xiao J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et context, the clown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frequently invoked symbolic reference and emotional signifier. From a metaphorical perspective, the clown constructs a cognitive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everyday predicaments can be interpreted and articula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unctional role and artistic status of the clown in traditional theatre, this figure also reveals a form of collective performance embedded in the dramat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The mimetic mechanisms in meme dissemination further propel the clown into an object of interactive creative practice, thereby accelerating its spread. Through ongoing replication, variant gen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it fosters group identity, gives rise to subcultural spheres with defined boundaries, and cultivates a sense of authentic emotional resonance. Drawing on Giorgio Agamben's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Pulcinella, the image of the clown acquires connotations of living techniques and resilience, pointing toward possibl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may reconstruct life narratives through empathy, negotia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

**Keywords:** clown; metaphor; theatre; mimesis; living techniques

---

(上接第9页)

## Rethinking the Essence of Media and Media Narrative Driven by Embodied Intelligence

—A Study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Narra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mesis

Shi Zengzh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embodied intelligence, media narration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paradigmatic shift. This study moves beyond the static ontological question of "what media are" that has long dominated traditional media studies, and instead advances a dynamic generative perspective that asks "what kind of media it is". It proposes that the essence of media lies in mediating generativity, a mode of "betweenness" that connects diverse relations while actively shaping perception, meaning, and social order. Grounded in Aristotle's theory of mimesis and narrative thought, the study traces the classical origins of this mediating generativity and argues that narrative, understood as a mimetic action, reveals its authenticity through the generative coupling of media's concealment and dynamism. Building on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narrative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narrative. It suggests that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narrative represents a new narrative paradigm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throug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ultimodal perception,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it transforms the mimetic subject, narrative form, and cognitive patterns. Narrative thus expands from word-centred verbal dialogue to a form of sensory resonance and non-verbal dialogue. Through ongoing practice, such narratives continue to interrogate the mode of human self-existence in symbiosis with technology, thereby reshaping cognition, emotion, eth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mimesis; embodied intelligence; media narrative; mediating generativity; human-machine interactive narrative; generativity

# “AI时代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生活方式与审美实践中的活态传承”会议综述

张慧凤, 王紫迎, 丁芳菲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在人工智能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范式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举办“AI时代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生活方式与审美实践中的活态传承”座谈会。来自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的近30位专家学者、业界同行围绕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活态传承展开深度对话。在对“技”“艺”“心”三层关系的层层追问中,与会者洞察到AI正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动态共生,但技术始终是桥梁而非目的。学者们一方面辩证看待算法带来的审美碎片化与主体性危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AI在美育浸润、空间疗愈、生命安顿等领域的实践可能。基于此,会议进一步展望了技术与人文共生的文化图景,让传统智慧真正合于日用,在伦理引领下实现文化自信的扎根与活态传承。

**关键词:**AI时代;文化自信;活态传承;审美疗愈;生命安顿;会议综述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3

2025年11月16日,由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举办的“AI时代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生活方式与审美实践中的活态传承”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和中国美术馆原党委书记**安远远**召集并主持。来自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的近30位专家学者、业界同行出席会议并展开热烈研讨。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聪平**、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莹**等也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了会议。

开幕式上,**师曾志**深刻剖析了AI时代的文化转型路径。她指出,AI正推动传统文化从“博物馆式保护”转向“沉浸式共生”,但若缺乏对文化生命整体性的敬畏,技术极易导致“文化存尸”。她主张,活态传承必须实现从“保存”到“生产”、从“传

递”到“生成”的跃迁,警惕技术工具化、审美碎片化、跨文化转译失真等风险,应构建“伦理—技术—文化”三位一体的审美实践路径,通过AI、大模型等技术深化文化理解、增强跨文明对话,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方式与审美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为AI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东方范式。

本次会议设主论坛与青年学者论坛,围绕AI赋能传统文化、跨媒介叙事、宗教美学转化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安远远**在点评中肯定了这种代际交融的研讨氛围,认为青年学者对文化主体性与伦理边界的敏锐思考,正是跨界协作的生命力之所在。

## 一、技以载艺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入社会发展肌理,重塑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格局。AI为中华优秀传

收稿日期:2026-01-08

作者简介:张慧凤(2002—),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变迁;王紫迎(2001—),女,安徽铜陵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伦理;丁芳菲(1998—),女,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命传播。

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但同时也对其审美深度与价值根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 (一)从“静态保存”到“动态共生”

活态传承不是单纯地保存原始特征,而是要保护、培育成长机制,保护文化群体的生命力延续与表达<sup>[1]</sup>。在人工智能时代,活态传承的实践路径需借助“技术中介”重构人与技艺的交互关系,利用数字工具弥合代际认知鸿沟。AI时代的文化自信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稳定而深厚的生命结构,也离不开新技术的赋能与支撑,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

师曾志以《数字赋能、伦理重构与文化主体性的激活——探索中华文化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为题,指出AI作为一项不断演进的新兴技术正逐渐下沉为文化生产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传统文化的智能载体,涉及算法研发、数字资源整合、社会场景应用等多个维度。由此,依托于AI技术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不能依赖于单一学科或主体,而应形成产学研协同推进的综合发展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业界和学界需要共同探索更多真实的AI应用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使曾经“被观看”“被展览”的静态标本转变为真正被感知、被使用的活态体验。另一方面,数据是AI的底层驱动力,因此需要丰富传统文化数据库种类,优化传统文化数据处理工艺与流程,持续提升数据库产品的易用性与可维护性,为AI在文化领域的数据查询与管理提供坚实支撑。

雅昌文化集团总经理程成以《雅昌集团的文化传播实践》为题,分享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融合路径。她强调文化自信的本质在于让古老智慧回归当代生活,并提出了多种实践策略。首先是固本承源的生活化嵌入,如通过“漫步北京”中轴线游学主题线路等场景,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具象的生活智慧,实现文化基因的当代延续。其次是数字赋能推动美育普及,如通过搭建《雅昌艺术图书数据库》,实现临摹研习、作品鉴赏、艺术教育一体化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拓宽美育普及与艺术创作的功能边界。最后是传统IP的现代化重构,推动传统IP与前沿科技、时尚设计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文创产品。

### (二)从“全民创作”到“全民族共创”

人工智能技术也深刻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创作逻辑与生产范式。一方面,算法生成、智能编辑与多模态表达大幅降低传统文化活态创作的专业门

槛,推动文化表达进入“全民创作”时代,使作品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受算法推荐、流量逻辑的影响,部分内容陷入迎合浅层审美、片面追求传播量的困境,难以承载民族文化根脉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使命,亟须转向“全民族共创”。

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引导培育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内生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传承发展须紧跟时代步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sup>[2]</sup>

北京市道教协会秘书长高欣在题为《AI时代:以图像叙事激活传统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新格局》的发言中建议,应通过图像叙事激活传统文化符号,在算法模型中嵌入文化价值权重,弱化单纯的流量反馈,使深度创意获得优先推荐。同时,开发适配多民族语境的AI工具、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文化培育生态,确立由学者、艺术家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度参与的人机协同机制,以多主体协作模式规避浅层化审美困局,在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中,筑牢民族文化根脉传承的共识基础。还可依托智能算法与VR、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实现宏观主题与微观故事的精准匹配,推动受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亲历”,构建起既能“破圈”扩散又能“穿透”人心的传播新格局。

### (三)从“技术产物”到“审美疗愈”

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本质上是基于海量数据和概率建模的“技术产物”,缺乏本体论意义上的情感认知和审美体验。然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中介化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实现情感共鸣与审美疗愈。

中央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赵旻以《旋律的共鸣:论音乐的情感疗愈力与社会文化功能》为题,指出音乐的核心价值在于超越语言壁垒,通过节奏与旋律的沉浸式渗透触发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与社会认同;AI的介入并非消解这种人文属性,而是通过“形式—内容”的深度重构,将抽象的审美体验具象为精准的神经干预方案。如“央音一号”脑机接口系统突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局限,建立起“生理信号捕捉—AI动态生成—实时情绪反馈”的闭环机制,根据感知到的用户脑电波等生理信

号,合成匹配个体心理状态的“音乐处方”,从而将音乐疗愈从通用的感官抚慰跃迁至睡眠调节、情绪疏导等个性化精准医疗场景,实现了技术理性对人文关怀的深度赋能。

## 二、艺以养心

在技术为文化“赋形”的基础上,与会者进一步探讨文化传承应如何超越形式的展示,真正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实现其滋养心灵、安顿生命的根本功能。研讨从学校、企业及个体三个层面出发,审视审美活动如何从外在知识传递转化为内在生命体验,为人心提供一处“诗意的栖居”之所。

### (一)学校美育的“体悟”转向

学校美育是连接国家文化战略与个体成长的关键环节,其使命在于将宏大的文化自信转化为具体可感、可参与的日常实践。当前,学校美育正从“知识普及”向“深度体悟”转变,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领悟“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等传统美学智慧,通过课程革新与场域拓展打破学科壁垒,使美育成为贯通智识、情感与价值观的综合生命教育。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简单复制、复原,而是需在时代语境中激活其独特生命力。如何实现这种激活?技术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行路径。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驻会副会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万丽君**指出,各地学校依托AI、3D打印等技术手段,推动美育融入课程体系、延伸体验场景、服务社会发展,并以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

这种“从课堂走向生活”的美育转向,正在重新定义艺术教育的边界。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杨志**以《其命维新·任重道远——艺术设计教育产学研的试验与探索》为题,从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当代艺术与设计不应停留在课堂与理论中,而应同时挖掘“表格外真正有价值的事”。他以中国艺术教育史与乡村建设传统为脉络,串联蔡元培、钱穆、梁漱溟、费孝通等人的思想,强调艺术始终源于“为生活服务”。在AI时代,通识教育、文化两创、乡村振兴与人文经济学的结合,是培养兼具专业能力、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的新一代设计人才的可靠路径。

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付砾乐**结合自身从人

文社科转向科技与管理领域的经历,以科普月参与“科普+非遗”项目为案例,提出以科学普及的方法活化非遗,使传统文化在现代技术与社会语境下被重新理解与传播,同时用文化反哺科技,使数字化、AI等技术具有人文价值指向。该实践呈现四个特点:依托节日或科普月的仪式性传播、基于在地场馆的空间化体验、具身互动促进青少年参与、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拟真呈现。其目标是在真实体验与科技场景中实现文化活态传承与教育创新。

### (二)企业空间的情感支持

当审美教育从校园延伸至企业,其内涵便从单纯的育人拓展为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组织化回应。首开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李晓莉**从企业视角以《职工美育与心智赋能——以首开为例》为题进行讨论。面对AI时代的普遍焦虑与“内耗”,企业需从提升科技“硬产能”转向关注“心智生产力”,将美育作为疏导情绪、激发创造力的柔性力量。

传统的思政教育往往因过于抽象而难以入心,而美育则通过营造沉浸式的审美场域,将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实践。当艺术资源打破精英壁垒下沉至基层,当古老的技艺与记忆不再是橱窗里的陈列品,而是成为员工可亲身感受、深度融入的情感纽带时,企业便由此超越了单纯的生产单元,进化为一个滋养心灵的“精神共同体”。在这种生态中,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教化的对象,而是在共鸣中主动完成身份认同,实现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的深层共振。她提出,企业美育的可持续发展重在相信、协同与坚持。这一模式既契合国家文化强国建设导向,又能将审美价值转化为组织内生动力,实现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

### (三)个体关照的日常修行

文化的传承与心灵的安顿,最终要落脚于个体的自觉意识与生活实践。在信息密集、节奏加快的AI时代,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更需要通过艺术与文化建立内在秩序与价值锚点,以深度审美体验对抗碎片化带来的浮躁与焦虑,实现心灵整合与精神疗愈。

这种从个体出发的文化需求,正在催生新的审美实践。艺术爱好者**江文红**提出“观照者”理念,强调以沉浸式审美进入“心流”状态,并以对《清明上河图》的深度品读为例,阐释了经典艺术如何成为安顿心灵、涵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围绕这种“沉浸与联结”,北京外国语大学副

教授温志宏进一步从理论层面予以回应。他引入本雅明“灵韵”理论,指出在数字复制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亲眼观看原作,是因为原作承载着不可复制的历史气息、材质痕迹与时代光晕,能够带给人独特的审美体验。他强调,数字技术并没有消解文化的“灵韵”,反而在更广泛的传播中放大了公众对文化源头的认同。AI、三维重建与虚拟环境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活态表达”方式,使“灵韵”以新的形态延续。

那么,在技术赋能之下,文化的“灵韵”如何才能被真正感知?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廖元植,结合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印刷与书籍史”的研究分享观点。他强调,文化自信的生成不仅来自理论宣讲,更来自亲身体验;理解传统文化必须回到历史情境,结合当时的时空与社会背景还原其形成过程,避免被西方中心话语误导。他认为,AI时代为传统文化传承带来新机遇,可借助技术还原历史语境,让文化的“灵韵”被真正感知,为讲好中国故事、筑牢文化自信提供重要支撑。

### 三、心以合道

当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并深度嵌入文化生活时,对文化的理解需超越媒介更迭,迈向“心以合道”的生命视角,跳脱出“技”与“艺”的层面重新追问生命与秩序。

#### (一)伦理秩序:生命合于天地之道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翁超明指出,当今社会的健康危机,本质上是生命认知的失位。现代人陷入将生命碎片化为“数据指标”的误区,而古中医的核心价值,恰在于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框架,将天时、气候、体质与情志纳入同一生命秩序。在时间维度,它颠覆了机械的时间观——时间不是均匀流逝的刻度,而是天地运行与人体脉动的共同节律;在疾病维度,它超越了孤立的器官视角——疾病并非局部的功能故障,而是气候、体质、情绪与生活方式交织作用下的整体失衡;在方法维度,它将“治未病”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路径——“五运六气”为天人节律提供了可推演的模型,使生命调理有章可循。中医不仅是医疗技术,更为信息过载下的个体提供了身心安顿的系统方案,让“心以合道”从抽象哲学沉降为可知可行的健康实践,在指标崇拜中找回生命主体的尊严。

这种生命秩序的找回,还有赖于主体性伦理的觉醒。桂兰书院创办人陈鸣以《照顾好自己:从赤马天子到“不明白”》为题,强调在AI放大感官诱惑的时代,真正的出口不在于无限的向外追逐,而在于收回身心体验的“验证权”。他以“赤马天子”的寓言警示,AI时代的便利往往包裹着迷失的风险,真正的修行是守住“六根门头”的觉知,从而在外部喧嚣中保留“不明白”的留白空间。当主体性在向内验证中被重新确立,传统智慧便不再是孤立的教诲,而具备了进入公共生活的底气。

#### (二)空间实践:文化合于日用之道

当内在认知完成回归,文化自信的建立便需要从“心”落地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研究员、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科大先研院人工智能文旅融合研究院)院长周慎的探索,为哲学理念向生活路径的转化提供了实践范本。他以《徽州文化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场景创新与活态传承》为题展开论述,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对地方文明资源的转化能力上,核心在于“以场景组织资源,以场景带动转化”。通过人工智能驱动,将古村落、非遗等静态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数字文化体验与“超级场景”,地方文化得以进入全球视野。这种转化的本质是通过“人工智能+”,将“以生命为中心”的传统智慧产品化,把“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嵌入康养服务与文创体系。当文化自信被纳入这种可体验、可参与的平台化构想,哲学理念便真正转化为公共生活路径,使个体在真实场景中重新找回天地节律与身心秩序。

#### (三)代际传承:经验合于生命之道

技术演进的根系深植于文化的土壤,决定了其生长的姿态与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宋奇在对比中西AI叙事时发现,西方受基督教传统中个体与超越性结构张力的影响,往往将AI想象为伦理冲突的反思对象,充满艺术化的警惕;而中国基于“关系本位”的文化基因,则更关注技术如何重构人际网络、促进社会共生,呈现出鲜明的建设性温情。他主张,AI不应是替代人类创作的冷峻工具,而应成为增强主体性的辅助力量(如AI辅助书法训练),于协同中激发新的创造灵光。这种文化差异不仅提醒我们警惕跨语境传播的错位,更预示了一种具有东方规范的美学可能。

安远远继续延伸文艺在技术时代地位的讨论。她指出,文艺是时代最敏锐的感知器与先行者,是社会精神状态与价值方向的象征。缺乏审美

与价值引领的技术与力量极易滑向毁灭,而具有共同愿景、情感与道德基础的人类文化表达,才能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力。

与会青年代表德吉普尺、张祺祺、董闻天则分别从跨地域文化交流、AI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化转化、集体情感共鸣等视角展开分享。他们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双向流动与自我更新,在于借助新技术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融入日常场景,同时也印证了技术迭代虽不断推进,但人类对情感联结与精神共振的根本需求始终未变。

#### 四、结语

从“技以载艺”的数字赋能,到“艺以养心”的审美疗愈,再到“心以合道”的生命安顿,AI时代的文化传承呈现出由外而内、由器入道的三重递进维度。技术不应成为消解传统的力量,而应成为激活文化主体性、重连生命情感、安顿存在秩序的“解蔽之途”。

而人之为人的完整性,恰恰植根于文化所赋

予的意义结构与精神坐标。在算法深刻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范式的今天,文化自信的确立亟需回归一系列根本性命题:如何在工具理性的膨胀中守护人文价值?如何在信息过载的喧嚣中重建身心节律?又如何让传统智慧真正融入当代生活,焕发解释力与实践性?

也许答案在于:唯有在伦理的引领下,推动技术与文化的深层对话;在人机协同中,始终捍卫人类情感经验的主体地位;通过可感、可参与、可共享的场景化实践,将天人合一、道器相融等生命哲学转化为日常可触的公共路径。如此,传统文化方能在智能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文化自信也才能超越符号消费,真正扎根于生活实践——在算法之中安顿生命,在变革之中绵延文脉,完成其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

#### 参考文献:

- [1]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6(5):1-7.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1).

##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AI Era: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Lifestyles and Aesthetic Practices"

Zhang Huifeng, Wang Ziyang, Ding Fangf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the paradigm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 Center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conjunction with Huizhou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vened a symposium title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AI Era: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Lifestyles and Aesthetic Practices". Nearly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fields including arts,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education were engaged in a profound dialogue on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a layered inquiry into the triad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rt", and "mind", participants gained insights into how AI is propelling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static preservation toward dynamic symbiosis, while emphasizing that technology serves as a bridge rather than an end in itself. The scholars dialectically viewed challenges such as aesthe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brought by algorithms, while also identifying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for AI in aesthetic immersion, spatial healing, and the settling of human life (An-dun). Based on this, the symposium further envisioned a cultural landscape of technology-humanity symbiosis, aiming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wisdom into daily praxis and to achieve a rooted, living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under ethical guidance.

**Keywords:** AI Era; cultural confidence; living inheritance; aesthetic healing; settling of life; symposium review

# 浙江省外文学会 2025 年年会暨“习近平文化思想 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蔚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2025年11月21日至23日,浙江省外文学会2025年年会暨“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台州学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进行系统整合的学术活动,聚焦学科前沿问题,汇聚省级学会行业力量,其研讨成果可为同类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会议设开幕式、七场主旨报告、六个平行分论坛及一场主编论坛,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外语教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等主要领域。围绕会议核心议题,专家学者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方法论,聚焦“价值之基、范式之变、路径之择”三大方向展开深度研讨,为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浙江省外文学会2025年年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价值之基;范式之变;路径之择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4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浪潮激荡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正站在体系重构与范式创新的历史关口。外语学科发展亟待突破“价值认同模糊”“知识生产依附”以及“实践根基遭遇颠覆性挑战”等深层危机,迫切需要根本性的思想引领与路径擘画。在此关键时期,周敏会长力推的浙江省外文学会2025年年会暨“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25年11月21日至23日在台州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外文学会主办、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协办。作为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学科建设进行深度融合的学术盛会,本次会议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开幕式由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刚教授主持。台州学院党委书记朱坚、原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蒋承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丁毅、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周敏先后致辞,围绕会

议主题阐述了全国外语学科发展的方向与使命。朱坚书记强调了外语学科在文明互鉴与国家战略中的桥梁作用;蒋承勇教授呼吁在AI时代坚守人文理性,超越工具性定位;丁毅社长表示出版界将持续深化与学界协作,共促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周敏会长则提出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发挥区位优势,推动学科转型升级与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面对时代命题,来自3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共同探寻外语学科发展的新定位、新范式与新路径。

本次年会设置七场主旨报告、六个平行分论坛、一场主编论坛及别开生面的颁奖仪式。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枫教授、复旦大学郑咏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苏婷教授、台州学院任开兴教授等七位专家先后作主旨报告;分论坛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外语教

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外语学科主要领域。为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前沿引领,会议特设主编论坛,由浙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樊燕龙教授主持,汇聚了《外语教学与研究》王文斌、《当代外语研究》杨枫、*System* 郑咏滢、*Island Studies Journal* 苏娉、《加勒比地区研究》周敏等海内外期刊主编,就学术创新、话语建构与发表实践展开深度交流,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指导。年会首次设立“突出学术贡献奖”,经过严格评审,授予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以表彰其在外国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领域的持续深耕与突出贡献。闭幕式由浙江省外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方凡教授主持,副会长黎昌抱教授作大会总结,下届承办单位代表、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彭国珍致辞接旗。

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这一核心议题,聚焦“价值之基、范式之变、路径之择”三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度对话。这三个维度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内在逻辑的递进体系,分别回应了外语学科发展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价值)、如何变(范式)、走向哪里(路径)。三者形成从理念奠基到学术重塑再到实践落地的整体推进链条,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外语学科系统性重构的变革图景。这一变革图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与理论基石,旨在推动外语学科实现从“沟通中外”到“融通中外”的深刻转型,从而在文明互鉴与国家战略中履行新的历史担当。

本综述将以此系统逻辑为框架,首先论述根本遵循的思想引领作用,继而分层阐释价值、范式与实践三大维度的会议成果。

##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外语学科变革提供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于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指导原则与实践路径。这一思想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体”指的是文化的本体、核心原则与理论基础;“用”则是文化的具体实践、应用方法与现实效用。“体用贯通”则概括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文化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实践也反哺并推动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征相呼应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文化自信”强调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支撑,只有立足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发展内驱力,才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对应了“明体”的要求。“开放包容”则强调文化建设需要在全球文明交流中吸收一切有益成果,推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的深度互鉴与融合,这种“文明互鉴”的精神体现了“达用”的实践指向。“守正创新”则深刻呼应了“体用贯通”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基本要求。它强调文化发展必须在坚守正道、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创新精神付诸实践,通过持续的具体实践推动理论落地,并在实践的检验与发展中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成从“知”到“行”的闭环。

这些重要思想为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支撑、方法论指引和实践方向,明确了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文化定位和发展目标。

首先,“明体”和“坚定文化自信”为外语学科发展确立了“价值之基”。它强调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要求在外语研究和教学中筑牢中华文化的根基。一方面,在外语研究中,应自觉打破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依赖,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研究理论与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外语教育中,不仅要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更应通过语言教学深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在跨文化交流中站稳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达用”和“秉持开放包容”为外语学科的“范式之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它强调外语学科的发展不仅要在语言研究和教学中落实文化的“体”,更要在实践中推动文化的应用和创新。这就要求外语学科发展范式进行深刻变革:在研究上,推动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打破学科壁垒;在教育实践中,注重学生跨文化能力与全球视野的培养;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

段,推动外语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交互化方向发展,同时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人文传承的核心价值。这一转变不仅符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精神,也回应了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

最后,“体用贯通”和“坚持守正创新”为外语学科的“路径之择”指明了实践方向。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强调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外语学科的实践路径选择中,应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积极融入现代科技。例如,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推动外语教育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与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同时,外语学科应积极拓展全球合作与交流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与实践机会,培养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沟通、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外语学科的全面变革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和清晰的实践路径。此次会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直面学科在价值、范式与实践层面遭遇的具体挑战,展开深入研讨。

##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 重铸学科价值之基

面对工具理性对学科价值的侵蚀与人工智能挑战,本次会议将重塑学科的价值根基作为首要议题,探讨如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强化学科的人文主体性与文明对话能力。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解答外语学科“为何存在”与“去向何方”的根本性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价值坐标与方法论指引。围绕外语学科价值重塑这一主线,主旨报告分别从文化价值与人文教育价值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在重塑学科的文化价值与对话能力层面,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明确了外语学科在促进跨文明理解、推动文化互鉴中承载的价值自觉。他通过对“中体西用”说的重审,强调文化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他指出,须以辩证眼光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推动学科从单向的“理论消费”转向平等的“文明对话”,最终构建开放包容、批判反思的“文明共生”新格局。

在重塑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与育人使命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直面人工智能对教育形态的冲击,明确提出“人文主体性”与“思想力”是学科不可替代的根基。他主张回归“文”的本体地位,并提出了AI时代外语教育必须思考的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外语教育究竟在哪些方面可基本交给AI完成?二是究竟在哪些方面需由人类师生来体验?三是究竟在哪些方面需借助人机协同来实践?他将人文教育的根本价值锚定于“思想力熏染”,包括知识力、想象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国际沟通力。

在上述宏观价值框架下,各分论坛聚焦“人文主体性”命题,围绕其理论建构、文本阐释与传播实践等方面展开具体探讨。在人文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层面,铜陵市委党校马晓云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智慧出发,系统回答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创新”的问题,提出了“文化基因解码—价值体系重构—实践范式创新”的内生性创新闭环,强调打破外源依赖、激活文化本体自我更新机制。浙江大学任洁则关注AI时代下人文认知的挑战,她系统重构了AI时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主张将批评的焦点从作者的“人类身份”转向文本是否实现“教诲功能”,并强调伦理准则与文学教诲仍是AI文学活动的核心,在价值层面确立了人文效用的延续性。

在人文主体性的文本呈现与阐释层面,学者通过具体文学案例,揭示人文主体性在文学与思想表达中的多元形态。浙江海洋大学何泽对葡萄牙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分析,展演了文学如何通过叙事结构建构民族航海认同中的人文自觉;宁波大学辛红娟教授探讨《道德经》在美国的女性主义诠释,呈现经典在跨文化语境下如何被赋予新的人文意义;台州学院李春风从生态诗学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诗歌,阐发其通过“生命的凝视”重建人与自然的对话伦理,拓展了外语学科人文主体性的生态维度。

在人文主体性的话语传播与实践参照层面,研讨聚焦于人文价值在跨语际、跨历史语境下的传递与影响机制。台州学院王刚教授对寒山诗英译中“和合精神”传递的剖析、钱虹对政治话语中“红色”术语译介的探讨,均关注人文核心价值如何在语际转换中得以存续与调适。台州学院刘常民进一步分析文化“溢出效应”,凸显人文核心价值传播的长期性与非线性,强调在传播中需保持

战略定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敬南非**教授则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变革中“犹太底色”为历史个案,揭示特定族群的人文观念作为深层主体性能力,如何持续参与并形塑社会进程。

###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学科范式之变

为突破长期存在的“理论依附—话语依赖”路径惯性,本届年会进一步聚焦于学术范式的创新变革。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系统思维”和“守正创新”的辩证哲学,为外语跨学科融合与知识生产转型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基于此,研讨会从跨学科方法论的元理论探索与学科实践两个维度展开。

在跨学科方法论的创新探索层面,主旨报告提出了具有引领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模型。其中,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提出了一个极具整合性的“文化·共同体·普通读者·愉悦”的四位一体批评框架。该框架以文化批判为起点,延伸至共同体书写对现代性分裂的回应,以“普通读者”为实践主体,最终将“愉悦”这一审美共通感确立为凝聚文化与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从而构建了一个贯通文化政治、社会与审美,兼具批判力度与建设情怀的理论模型。上海交通大学**杨枫**教授以“知识翻译学”重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将区域研究界定为对异域知识进行解码、转码与再编码的实践。他提出“话语考古—概念谱系—理论回馈”三位一体方法论,推动研究对象从“本质”走向“关系性建构”,方法从“单向应用”走向“双向翻译”,研究者从“观察者”转向“知识译者”,从而助力中国学界实现从知识引介到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华南理工大学**苏婷**教授则以“互文性操演地理”为核心概念,通过对19世纪广州沙面这一特殊历史空间的个案分析,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文化表征如何能动地参与空间政治的生产,为文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范式。

在学科方法的具体实践层面,各分论坛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意识与实证转向。语言学领域呈现出从“形式分析”向“人文—社会”综合关切的重要转向。一方面,学者从微观语言现象切入宏观文化议题。如杭州师范大学**詹宏伟**教授通过“搭配偏离”论证中式英语的“中国性”;台州学院**刘芬**教授从认知视角阐释情感事件的因果关系框

架,揭示了语言使用与思维模式、文化认同之间的深层互动。另一方面,研讨会自觉将语言学工具应用于国家叙事、国际传播等重大现实议题。如温州医科大学**潘好**通过多模态分析构建中医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浙江农林大学**朱怡**从国家叙事视角剖析教材如何协同叙事要素以构建国家话语;台州学院**姚晓光**运用“话语—历史”方法分析政治贺词,探讨政治修辞对治理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文学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国别界限,展现出鲜明的理论交叉与问题意识,议题涵盖了从学术史反思到具体文本的批判性解读。如温州大学**李开**对英国文化研究范式演变及其当代意义进行元理论梳理,重申其“跨学科”与“当下历史取向”的核心精神;杭州师范大学**田颖**则融合文学地理学与后殖民理论,基于对杰克·伦敦文学创作的研究,创造性运用“文学绘图”理论剖析文学叙事如何参与国家地理想象和殖民意识形态的形塑;台州学院**孙雁冰**则从历史修正视角出发,以加勒比历史小说《自由人身份的黑人女性伊丽莎白》为案例,探讨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对殖民档案中被歪曲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帝国反写”,从而揭示文学作为解构历史、重构主体的批判性场域。

区域国别研究则呈现出“话语—数据”双轨并进的范式特点。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简智颖**以会话分析为理论框架,精细解剖了柬埔寨的“全方位对接”、新加坡的“价值绑定”与泰国的“去政治化转换”等差异化话语策略。台州学院**吴彦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中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对绿色复苏的影响;**柯于国**以肯尼亚为具体观测站,通过实证证据采掘,深度追溯中国对非出版的动因与传播路向,为增强国际传播的精准性提供了基于现实考察的决策参考;**戴敏**创新性地将管理学“精捷创业”理论应用于非遗海外传播的路径探索,为传统文化活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外语教育研究聚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如浙江科技大学**黄扬**探索了将德国技术和工业文化系统融入语言教学的有效路径,验证以跨文化能力为核心、以领域知识为拓展的复合型培养模式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作用。此外,研讨会还引入科学观念史视角,通过对17世纪“金疮药”魔法叙事的考察,揭示虚幻的技术想象如何参与科学范式

的历史演进,为理解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提供了历史参照。

####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 数智时代路径之择

在确立了学科的价值根基与推动研究方法论创新之后,本届年会进一步聚焦于“路径之择”,直面人工智能对学科“实践根基进行颠覆性挑战”这一深层危机,探寻外语学科在人机协同时代的行动路线与发展生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体用贯通”与“守正创新”“实践导向”,为这一探索提供了根本遵循。学科的未来不仅在于价值重铸与方法更新,更在于能否在技术融合中构建理性、建设性且人文内核稳固的实践体系。围绕数智时代的学科实践路径,研讨会从教学与翻译两大关键领域展开系统论述。

在教学领域,复旦大学**郑咏滢**教授通过翔实的案例与数据,辩证揭示了AI赋能教学的多重面向与潜在风险。她指出,AI虽可促进多主体、网络化学习,但其“幻觉”输出、算法偏见、内容同质化及可能引发的学习者元认知惰性,构成了外语教育的新挑战。为此,她提出构建“协商互联”的二语习得与教师发展框架,倡导通过多元协作、行动研究与反思性探索发展教学和学术,从而为形成人机共育、教学相长的教育新范式奠定学理基础。

在翻译领域,台州学院**任开兴**教授以“道一法一术一器”为框架,系统构建了人机协同翻译新范式。通过具体案例,他阐释了“以术驭器”的实践逻辑,强调通过提示语优化与多轮迭代激发大语言模型潜力,同时指出人类译者应在专业术语、文化内涵及多模态理解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校准作用。这一协作机制不仅实现了译者从技术操作者到质量责任人的角色升华,更构成了人机优势互补的翻译新生态核心。

在分会场研讨中,数智赋能的具体路径也在教学与翻译两个维度展开。在教学层面,研究致力于构建智能教育的新范式,推动外语教育向个性化、交互化与深度化发展。如浙江海洋大学**钟伟良**教授基于大规模调研探索地方高校英语学科融合AIGC的转型路径;嘉兴大学**章剑飞**构建了“教师—平台—学生”协同模型,以探索技术在教学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台州学院**王显云**则聚焦构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阅读教学机制。此外,杭州师范大学**沈莉娟**通过大数据分析,从产业视角探索了语言大模型对学习绩效的影响机制。

研讨会同时关注转型中的核心挑战与能力建设。浙江工商大学**胡春晓**对教师“数字焦虑”的生成逻辑进行深度解构,区分生存性、发展性、技术性与价值性焦虑,并据此提出以“数智胜任力”为核心,涵盖制度、标准、培训与个体调适的纾困体系。此外,台州学院**卢立伟**教授通过多标准决策方法,构建高校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体系,形成“诊断—建设—评估”的实践闭环。

在翻译领域,研讨会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驭器而译”。衢州学院**袁秀娟**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基于MQM/TQI框架评估学生使用生成式AI的策略、态度与译文质量的关系,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实证依据。台州学院**何小燕**同样通过混合方法,揭示了ChatGPT为MTI学生自主学习带来的机遇与潜在的过度依赖风险。

#### 五、结语

本次年会成功描绘了一幅外语学科变革的全景图。它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通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哲学智慧,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原则,深刻回应了新时代赋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核心命题,即如何在文化自觉中重塑外语学科价值之基,在范式创新中拓展知识边界,在技术变革中重构教育生态,为破解外语学科时代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坚定文化自信”为学科“明体”,指引学科锚定“价值之基”,这是奠定学科转型的思想原点,是一切范式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前提;“秉持开放包容”与“坚持守正创新”为学科“达用”与“贯通”,直接催生“范式之变”与“路径之择”,推动研究方法论在守正中创新,并确保前沿探索在数智时代的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是这一“体用”哲学,使得“价值之基—范式之变—路径之择”超越了线性递进,构成了一个价值引领实践、实践升华价值的辩证发展闭环,确保外语学科建设真正进入可操作、可实践、可验证的阶段。

研讨会表明,当下外语学科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整体性范式演进,其核心从以语言能力为核心

的传统模式,转向“思想力—方法论—实践路径”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这一转变在主旨报告的理论深度、分论坛的实证探索与跨界对话中得以充分展现。学者们既坚守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核,又积极运用实证与跨学科方法,自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相衔接,推动学科从“沟通中外”向“融通中外”的角色升级。

作为浙江省外语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年度学术盛会,本届年会不仅以前瞻的议题、扎实的研

讨凝聚了学科共识、指明了发展路径,也进一步巩固了浙江省外文学会在全国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与组织活力。会议充分证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外语学科在时代变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正以更加自觉的主体姿态、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度融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国家发展进程,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重要的智慧与力量。

## Review of the 2025 Annual Conference of Zhejiang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ciplines

Che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From November 21 to 23, 2025, the 2025 Annual Conference of Zhejiang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aizhou University, focusing on the them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ciplines". This academic event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ciplines, while addressing the cutting-edge issues. It gathered the industry forces from provincial societies and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onference included an opening ceremony, seven keynote speeches, six parallel forums, and one editor-in-chief forum, covering major field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and area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core 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experts and scholars, guid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clarifying form and achieving application,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rofoundly discussed three major directions: "foundation of values, paradigm shift, and choice of paths". Their discussions provided significant insights into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2025 Annual Conference of Zhejiang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oundation of values; paradigm shift; choice of paths

# 全球治理视域下外语学科 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知识生产

严春妹

(衢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国际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正经历从传统知识领域向国家战略知识体系的结构性转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倡议为相关学科协同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基于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跨文明意义转译以及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所形成的递进分析框架,可系统揭示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生产、意义转译与叙事竞争三个层面的协同知识生产逻辑。两者通过深度融合发展,不仅拓展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内涵,也通过原创性知识供给有效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话语建构的能力,彰显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形成多元共生国际话语格局的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球治理;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协同知识生产;叙事竞争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5

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sup>[1]</sup>,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论述,不仅系统回答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更清晰地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体两面的交叉领域,因其独特的跨语言能力、区域深度认知与文明对话禀赋,成为阐释中国全球治理观、解码多元文明逻辑、参与国际规则话语建构的关键学术支点。然而,要真正发挥其战略功能,亟须超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或区域描述范式,转向一种以文明互鉴为理念、以意义转译为能力、以叙事竞争为场域的新型知识生产模式。本文所指“协同知识生产”,正是以此三维框架为基础,旨在系统回应:在全球治理深刻转型与国际话语格

局由“西方中心”向“多元共生”演进的时代进程中<sup>[2]</sup>,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如何通过深度融合,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以此回应中国国家战略之需,更顺应学科专业建设之需<sup>[3]</sup>。

从整体理论结构看,上述三大命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全球治理知识体系重塑过程中递进与互构相统一的有机整体。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作为价值基底,为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提供理念指引;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多元文明治理实践的深度比较与理论提炼,为外语学科的跨文明意义转译提供扎实的知识资源与实证支撑;而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作为关键实践场域,不仅为区域国别研究开辟了直面现实问题的知识生成空间,其对有效中国叙事的迫切需求,又反向驱动外语学科不断提升意义转译的解释力与在地适配性,并进一步倒逼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持续迭代创新。三者由此形

收稿日期:2026-02-10

基金项目:衢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地域特色与国际视野融合的衢州村落文化与农旅新业态研究”(2023K215)

作者简介:严春妹(1975—),女,浙江衢州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区域国别研究。

成“理念—转译—场域”的闭环互动,共同支撑中国自主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者的结构性耦合与动态互动,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由单一中心向多元共生转型。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掌控国际话语体系,将自身价值观包装为‘普世标准’,并借助全球化进行输出,严重挤压非西方文明的生存空间”<sup>[4]</sup>。即便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在国际话语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sup>[5]</sup>,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更通过《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等法律工具,将价值观输出与技术主权诉求深度绑定,争夺全球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形成对非西方文明的双重挤压。文明互鉴取向的知识生产为突破单一文明主导的知识生成格局提供了新的路径。外语学科逐步突破单一的语言工具定位,在国际话语表达与跨文化理解方面承担起更为重要的学术功能;区域国别研究则由经验性描述研究转向面向全球治理问题的理论探讨。2025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将区域国别学列为新增专业并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门类,为相关学科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 一、文明互鉴视域下外语学科 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知识生产

### (一)文明互鉴对外语学科和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构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论述中,文明互鉴理念是兼具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的核心范畴。他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sup>[6]</sup>。这一论述确立了全球治理视域下“平等互鉴、双向共生”的知识生产原则,突破了单一文明价值主导的认知框架,为新时代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全球治理倡议深入推进与国际知识生产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文明互鉴已成为推动国家知识体系转型与学科话语重构的核心理论支点。就国家及其国际关系而言,“知识生产和知识对话构成的国际传播能力决定着未来的世界秩序和民族命运”<sup>[7]</sup>。这一理念与外语学科发展、区域国别研究

深化及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了协同推进的互动关系。

这种协同性在实践中体现为动态互动循环。国家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对文明价值与发展经验的系统叙事能力,而文明互鉴原则要求国际传播必须坚守多元文化认同与平等对话精神。在此过程中,外语学科承担着转译与表达的功能,通过多语种语义分析与文化符号研究,将文明互鉴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的叙事模式;而区域国别研究则发挥认知与支撑的作用,对具体国家文化认知结构、制度实践进行深度剖析,为外语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避免话语表达流于抽象空泛。反之,外语学科的跨语言传播能力,又将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有效转化为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通过知识生产、传播表达与理论创新形成互动循环结构。

总体而言,文明互鉴理念正深刻引领着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整体方向,为两大学科划定了价值导向与理论框架。外语学科通过跨文明表达推动文明互鉴理念的国际传播,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多文明比较深化文明互鉴理念的实践内涵,而两大学科的发展状况又不断塑造文明互鉴理念的现实表达路径。

### (二)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对外语学科产生的影响

文明互鉴理念与文明平等原则,为外语学科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型提供了价值导向。以此为内核的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实践功能三个维度,推动外语学科实现从语言工具学科向文明解释学科的系统性跨越。

从工具性教学到文明性阐释的认知跃迁,是这一转型的核心特征。传统外语学科囿于语言技能训练与文学文本分析,以单向度的语言转换为主要知识生产模式,其传统定位未能充分彰显其连接中外文明的桥梁价值。文明互鉴理念赋予了外语学科跨文明认知解释与价值沟通的时代使命,使其核心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语言已不只是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更是文明价值体系、历史发展经验、民族思维模式的重要载体,“在由语言发挥沟通工具作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负载在语言之中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sup>[8]</sup>。这要求外语学科必须打破单一的翻译教学范式,树立文明平等视角,向深度的价值转译与文明解释领域拓展。

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对外语学科的结构

性重塑,体现在研究发展的多维度之中。在研究对象上,外语学科突破传统语言符号、文学文本的局限,拓展至文明认知体系、文化意义结构与跨文化叙事模式,实现语言本体研究与文明深层研究的深度融合。核心依据在于,语言与文明本就互为构成——“语言文明参与构成人类文明,不同文明塑造了不同的言说方式。无论哪种语言研究视角,都承认‘跨语言对话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对话’这样一个事实”<sup>[9]</sup>。从文化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语言是文化认知模型的外在表征,唯有挖掘符号背后的文化认知逻辑与价值隐喻体系,才能真正揭示意义建构过程并实现深度跨文化理解<sup>[10]</sup>。这必然要求研究对象向文明认知维度延伸。

在研究方法上,跨文明比较是外语学科回应文明互鉴的核心方法论。语言蕴含的文化价值体系,决定这种比较并非文明优劣评判,而是以文明平等互尊为前提,通过对照不同文明的语言符号、文化语境、价值范式,挖掘认知逻辑与表达差异的深层根源,最终实现多元文明的平等理解与精准阐释,促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这一方法论转向的核心,在于外语学科从“知己知彼”的竞争范式转向“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范式<sup>[11]</sup>。正如蒋承勇等学者所指出,在文明互鉴视域下,外来理论唯有通过与本土资源的深度对话,并经由对不同文明传统的比较省思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有机融合。这一路径正体现了外语学科从对抗性认知向共生性建构的范式跃迁<sup>[12]</sup>。

在实践功能上,外语学科将跨文化传播与国际话语建构置于核心位置。依托多语种与跨文化研究优势,外语学科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实现从语言翻译到意义阐释、从文化介绍到价值沟通的功能升级。在教育教学维度,外语学科打破单一技能训练,聚焦学生跨文化能力与叙事能力培育。通过文明认知教学塑造学生“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与跨文化领导力;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导向,培养学生用外语精准表达中国观点、在国际场域有效发声的能力<sup>[13]</sup>。在学术研究维度,借鉴主体间性理论视角,构筑文明共鸣的理解桥梁,突破“依附性知识生产”困境,将中国外语教育经验转化为具有原创性与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话语,进而在全球话语博弈中参与知识体系重构,以理论创新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

**(三)文明互鉴机制与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结构系统性重构的耦合**

文明相互尊重与文明互鉴理念,首先界定了中国研究与欧美体系的本质分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以文明互鉴、合作发展为主线,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为核心思想,致力于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构建全球知识共生网络,而非确立单一中心或依附性战略目标<sup>[14]</sup>。同时,它也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结构转型提供了根本价值导向与理论基础。

文明互鉴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内部的范式革新。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更多聚焦制度、地缘或经济层面,较少系统考察文明演进、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对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深层塑造作用。事实上,正如学者白云真所言,“文明学习过程、文明扩散过程会对不同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成具体影响”<sup>[15]</sup>。由此,区域国别学亟须超越“外部观察者”立场,转向一种更具有文明自觉和主体间性的研究范式——在平等对话中理解他者文明的内在逻辑,并反思自身知识生产的文化前提。而这一范式转型直接导向区域国别学“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双向实践路径。在教学层面,引入“主体间性”理念,设计多元文化教学大纲,推行中外学生混合编班研讨式教学,促进认知理解与实践应用相融合,培养复合型区域国别人才。在学术层面,研究既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改革提供咨政支持,也通过深挖各国文明智慧、推动多元文明对话和互鉴互构,反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 二、跨文明意义转译的知识生产与学科支撑

### (一)跨文明意义转译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全球文明倡议从文明维度明确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的历史之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了文明之基<sup>[16]</sup>。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亟待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国际话语竞争逐渐从语言传播层面转向文明意义解释层面。跨文明意义转译,实质上是指不同文明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价值观念、制度理念与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和再建构的实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依托

语言优势和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全球意义解释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较大程度上塑造了以西方叙事为中心的国际知识生产格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这一变化对跨文明意义转译的深度与效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 (二)外语学科在全球意义解释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语言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同时也是文明价值、历史经验与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不同语言体系往往蕴含各自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文化象征结构。正因如此,外语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研究经验,并在全球意义解释结构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通过多语种文化比较研究,外语学科能够揭示不同文明叙事结构及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为跨文明对话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广泛支持的背景下,外语学科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语言翻译,而是在文化沟通与价值解释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跨文明意义转译逐渐成为影响国际话语交流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以语言转换为基础,更体现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对异质文明价值进行再阐释的能力,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密切相关。在跨文明传播过程中,这种再阐释既要回应文化差异,也需尊重文化认同,并致力于在不同社会之间寻求可能的价值共识。外语学科在跨文化认知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理论积累,通过对具体文化语境的深入分析,可一定程度上提升理念传播的认知共鸣与价值认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度竞争往往伴随着话语层面的竞争,那些能够形成较强意义解释能力的国家,通常更容易在相关规则讨论与制定中赢得话语空间,进而增强其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引领力和感召力。

### (三)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通

跨文明意义转译的深化离不开跨学科合作。为推进跨文明意义转译,有必要构建以多学科参与为基础的研究框架,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拓展跨文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正如姜锋等人所言,外语学科向区域国别学转型时,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形成跨学科思维,凭借语言优势结合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构建综合性研究体系<sup>[17]</sup>。跨学科研究为跨文明意义转译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语言研究

与制度研究的结合,有助于形成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近年来,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多语种语料库的建设,使研究者能够系统观察国际话语结构的变化,并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传播模式。

根据202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报》信息,教育部已设立42家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411家备案中心,两类机构总计453家,分布在全国186所高校。一些重点高校还相继设立国际传播学院,推动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在学科建制层面的深度融合,初步形成“外语能力—区域知识—国际传播”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为跨文明意义转译研究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学科基础。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数据库整合了20余类子库,总规模逾1.2亿形符,为政治术语转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词频统计与语境分析依据。

在全球治理理念传播过程中,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通构成国际话语建构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形成的理念体系,需要通过多语种表达与区域知识的结合实现有效传播。例如,不同区域与国家在安全议题上存在差异化的认知传统与现实关切,这直接影响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地效果与接受程度。区域国别研究凭借扎实的在地调研与语言文化积累,能够精准把握不同话语圈的安全诉求。以法语非洲国家和西班牙语拉美国家为例,这类具有鲜明语言文化圈层特征的区域,其安全逻辑与西方主流话语存在显著差异。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分析其安全认知指出,当地更重视发展安全与区域安全。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外语学科通过多语种转译与话语重构,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行语义调适,并结合区域实践经验进行阐释,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实现有效传播与价值共鸣。

## 三、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与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成场域

### (一)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与合法性竞争

当前全球治理变革的核心,正从制度规则博弈转向围绕合法性的叙事竞争。治理不仅体现为正式制度,更深层地依赖于对其正当性基础的叙

事建构。世界各国依托自身文明传统与发展经验,构建具有文化感召力和价值说服力的叙事体系,争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主导权:谁的叙事被广泛接受,谁的方案就获得道义正当性与实践合法性;反之则可能面临质疑甚至排斥。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的区域国别研究,将自身经验抽象为“普世规则”,以学术、媒体与国际组织为载体,将其治理模式包装为“普世价值”,通过知识生产定义“真理”、文化渗透制造“共识”、制度安排固化治理权力结构,以此压制多元治理实践。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文明互鉴”的价值导向,有力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为构建包容、平等的全球治理新叙事格局提供了关键引领。

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之间的深层互动。其说服力根植于对特定区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在地化知识积累;而一个国家能否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区域知识,已成为其文化软实力、外交精准性与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支撑。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制度结构与社会实践的深入分析,为叙事竞争提供扎实的经验基础;外语学科则依托语篇分析、批判性话语研究以及跨文明转译能力,将相关知识转化为具有传播力的叙事表达。两者的深度融合,使叙事话语既具备知识深度,又具备跨文明可接受性,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格局提供了可能。

全球治理中叙事竞争的核心,在于知识解释权的建构和争夺。世界各国通过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系统构建各自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和阐释体系,并借助国际学术网络和多语种传播渠道加以扩散。近年来,“全球南方”整体影响力逐渐上升,但其发展诉求和治理理念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仍未得到充分体现。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通过跨区域比较,揭示西方主流叙事的历史局限与规范偏见;外语学科则通过多语种表达与文化语境适配,将中国的区域认知与治理主张转化为更易被不同文明背景受众理解与接纳的叙事形式,从而有效提升相关理念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可见度与可信度。

## (二)区域国别研究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

志着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从松散的知识生产机制,迈向系统化、制度化的学科建设新阶段。这一制度性跃升,显著强化了区域国别学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作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区域国别学通过整合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视角,构建起整体性、在地化的区域认知体系,为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提供不可或缺的知识根基与解释框架。

区域国别研究揭示制度选择背后的文化逻辑,为全球治理中的价值主张锚定深厚的文化根基。其核心优势在于深挖不同国家制度实践所依托的文明传统与社会认知,助力全球制度话语有效突破“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例如,在东亚区域安全合作中,对“和而不同”“协商一致”等本土智慧的阐释,显著增强了亚洲安全观叙事的合法性与区域认同感。

区域国别研究通过解析国际规则形成背后的权力结构,为全球治理叙事话语的构建提供现实依据和战略支撑。其核心价值在于动态把握全球权力格局演变和区域力量重组,为中国参与规则制定和理念传播提供精准策略指引。一方面,聚焦全球权力结构的宏观变迁,深入研判各国利益关切与立场倾向,使中国在全球议程设置与话语建构中更贴合实际需求。例如,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通过对“全球南方”国家在减贫、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核心诉求进行系统分析,推动中国主张有效转化为凝聚广泛共识的叙事载体。另一方面,揭示西方在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及话语霸权机制,为中国构建多元、多语、多层级的国际传播网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现实参考,提升对外叙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能力,根本上源于其背后的学术深度与理论原创性。区域国别研究通过深度融合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推动区域知识从经验描述转向系统化理论建构,为国际话语竞争提供坚实的原创性学术支撑。杨庆龙指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语言研究路径与社会科学研究路径都是必要的,两者的结合才更符合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跨学科属性。”<sup>[18]</sup>这一融合体现在多个维度: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制度演变规律,通过社会结构分析阐释国家治理模式形成机制,通过文化比较视角探析制度合法性的本土来源。尤其在数字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领域,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政策实践、技术伦理框架与监管模式的系统比较,为中国参与乃至引领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兼具在地洞察力与理论前瞻性的学术支撑。

### (三)两大学科协同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叙事实践路径

全球治理中的叙事建构并非单一学科的独立行为,而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外语学科深度融合的过程:前者提供知识基础、议题锚点与实证支撑,解决“说什么”;后者支撑跨文明转译、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回应“怎么说”“向谁说”。以人工智能治理为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以“风险防控优先”为核心,强调分级监管与数字主权,体现欧洲技术治理逻辑,却相对忽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发展与技术普惠方面的诉求;而中国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强调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其话语建构有赖于上述两大学科的协同支撑。

区域国别研究与外语学科的深度协同,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叙事建构的核心机制。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差异化实证分析,为中国话语提供坚实知识支撑:一方面,深入剖析欧盟以“数字主权”和“风险规避”为核心的治理逻辑,揭示其《人工智能法案》虽标榜“普世性”,却可能因其高合规门槛而对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成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深入调研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应用地区,通过实地考察梳理其对技术普惠、能力建设与发展赋能的核心诉求,并提炼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中的AI集成经验、卢旺达“普惠AI治理”等本土实践。这些来自“全球南方”的在地化探索,为倡导“发展与安全平衡”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多元、鲜活的区域佐证,显著增强了其包容性、现实感与道义正当性。

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外语学科通过精准转译、分层叙事与话语创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理念的跨语际表达,为超越西方“风险规制”(Risk Regulation)的单一范式提供新路径。例如,将“智能向善”译为“AI for Good”,契合全球伦理共识;“发展与安全平衡”译作“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以区别于西方“安全优先”逻辑;面向法语非洲国家强调“Solidarité Technologique”(技术团结),针对西班牙语拉美

家则采用“Desarrollo Inclusivo”(包容性发展)。这些在地化术语策略既忠实传达核心理念,又嵌入区域话语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治理主张的跨文化阐释力与价值认同度。

在叙事传播层面,外语学科协同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区域实践案例+中国治理方案”的分层叙事模式:面向欧盟,依托英、法等语种的精准转译,阐释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中“风险可控”“以人为本”等原则与欧盟“可信AI”理念在技术伦理上的共通性,寻求制度对话空间;面向东南亚、非洲等发展导向型区域,则通过多语种语料库与短视频、研讨会等形式,将中国在人工智能赋能减贫、智能医疗和数字基建等领域的实践,与当地需求及本土经验有机融合,推动中国叙事与区域诉求同频共振。

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协同,不仅助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设置议程,更形成了“实践反哺学科”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差异与文化诉求,构建起“技术应用—规则诉求—文化适配”的三维分析框架,丰富了自身的学科内涵;另一方面,外语学科在跨语际话语实践中,逐步确立“语言能力+区域知识+话语建构”的复合型路径,实现从语言工具向治理赋能的转型。这一双向互构,既强化了两大学科服务国家全球治理理念的学术支撑功能,也为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和外语学科范式革新提供了实践基础。

## 结 语

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与国际格局的加速演进,推动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从传统知识领域向国家战略知识体系转型。本文围绕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跨文明意义转译、全球治理中的叙事竞争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两大学科协同如何回应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知识需求。三者构成递进式互动结构:文明互鉴型知识生产机制奠定价值基础与方法论方向,推动外语学科超越工具属性、深化文明解释功能,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从制度分析迈向文明比较;跨文明意义转译架设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的桥梁,外语学科通过语义调适与叙事重构实现理念的在地化表达,

区域国别研究则提供制度语境与区域经验支撑;在此基础上,两者协同赋能中国全球治理倡议的有效叙事与话语呈现,在全球治理转型中提升其国际解释力、话语认同度与传播效能。这一协同范式,不仅重塑了两大学科的知识边界与发展路径,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理论支点,彰显了全球治理视域下两大学科协同知识生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5-09-02(1).
- [2]侯冬梅.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1-37.
- [3]郭英剑.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概念、内涵、定位与内容[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1):23-29.
-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琪,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171.
- [5]吕丹红.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权提升及其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展,2023(6):118.
- [6]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1).
- [7]刘建平,张毓强.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J].对外传播,2022(11):55.
- [8]宁琦.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3(4):100.
- [9]李宇明,张振达.语言与知识:关于语言文明的思考[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4(1):21.
- [10]文旭.文化认知语言学再探[J].外语学刊,2025(2):1-9.
- [11]周敏.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外语学科的价值重构: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知识转型路径[J].当代外语研究,2026(1):48-58.
- [12]蒋承勇,查明建,陶家俊.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三人谈[J].山东外语教学,2025(6):1-9.
- [13]王守仁.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外语教育[J].中国外语,2024,21(5):17-22.
- [14]邱运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当代视野与学术构建[J].人民论坛,2025(12):60-65.
- [15]白云真.文明互鉴视角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J].长白学刊,2026(1):48.
- [16]刘建超.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关系[N].人民日报,2023-08-08(9).
- [17]专访:姜锋教授谈外语学科如何融入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EB/OL].(2026-01-26)[2026-02-0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6544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65440).
- [18]杨庆龙.当前外语学科下国别与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3):28.

##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d Area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Yan Chun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zhou University, Quzhou 324000, China)

**Abstract:** Ami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ove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d area studies are undergoing a structural shift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domains towards strategic knowledge systems serving national priorities.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s provide crucial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se fields. Drawing on a progres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med by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cross-civilizational meaning-making, and narrative contest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uncovers the logic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nd area studies across these three interlinked dimensions. Their deep integra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intellectual connot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but also enhances China's capacity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rough original knowledge contributions, thereby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n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fostering a pluralistic, coexistent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rder.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rea studies;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narrative contestation

# 歌谣的“记忆之场”和地方认同

——以“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为例

吴芷境

(浙江大学 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歌谣作为流露民间真挚情感的“民族的诗”,蕴含丰富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文化基因。伴随新时期民俗学的复兴,民间歌谣成为学界研究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构建的重要材料。“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临海市歌谣谚语卷》编纂为线索,回到歌谣在民间传唱、保存、变迁的历史现场,扎根于丰厚的地方文史资料和鲜活的田野调查经验,呈现歌谣中过去与当下交织、复杂而又生动的“记忆之场”。展览的展出作品和展览事件本身,不仅阐释了临海民间歌谣“记忆之场”的核心内涵及其特征,而且剖析了民间歌谣唤起个体、集体记忆进而影响地方认同构建的机制,最终归纳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认同模式。

**关键词:**临海;民间歌谣;记忆之场;地方认同;展览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6

## 一、引言

歌谣是方音的诗,具有音韵上朗朗上口、内容上“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特质。作为一种根植、传承于民间的口头文体,歌谣不仅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抒发对一方水土的体认和依恋,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地方记忆的印记,而且具有保存乡土文化的情感结构、传递稳定的社会共识、加强“人—地”之间的情感纽带的社会功能,成为研究地方认同形成机制的理想中介。

2024年10月至11月,“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于浙江省临海市惠风楼开展,集合了策展小组为期1年在临海及其周边乡镇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的成果。展览以1992年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临海市歌谣谚语卷》(以下简称《集成》)为出发点,主体分设“锚点：从《集成》到群文系统”“风从何处来”“不辍

弦歌”“桥上打花鼓,桥下娶新妇”“民间的诗情”和“尾声：未竟的故事”等6个板块,梳理并归纳了临海民间歌谣在知识生产环节、集体记忆传承、日常生活仪式、文学创作母题等不同维度的特征。现场展出内容包括歌谣讲唱影像、讲唱人口述和田野笔记、地方文史文献以及相关实物材料、当代艺术作品,展览期间还邀请艺术家、学者、写作者面向公众举办综合展演、学术讲座等系列活动,融汇个人和集体对歌谣的多重记忆,呈现民间歌谣在过去和当下的鲜活样态。可以说,这次展览搭建了一个看似松散却又相互关联的框架,尝试对临海民间歌谣复杂而混合的状态予以语境性阐释,重新激活观众对一方水土的关注。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展览所展出的作品和展览事件本身也激发了观众的地方感知和地方认同,同样可以视为临海民间歌谣传播的一个环节。因此,有必要在学理上予以进一步归纳和反思,剖析歌谣如何唤起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从而参与地方认同构建。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建构

歌谣具有文化学意义上的丰厚内涵,构成了克拉克·威斯勒所谓的“文化综合体”(complex)<sup>[1]</sup>,即歌谣讲唱、保存、变迁的过程与其形态特质存在着功能性的联系。已有的歌谣研究呈现出涵盖社会学、人类学、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围绕记忆、仪式、身份认同等多视角的交叉趋势。例如,以文本为中心,集中于具体歌谣文本的源流阐释和艺术分析;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关注北大歌谣运动、“新民歌运动”等运动的发生和影响;以民族、地域特色为中心,探究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和民众社会生活习俗,等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侧重于历史的、传统的文献史考察而缺少对当下的、延续性的现象研究。在民众社会生活实践中,歌谣仍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在讲唱的环境、空间、仪式等综合场域中,不仅传承了具体的歌谣唱词,而且共享了人们对地方的感知方式和情感,从而激发更深层的地方价值和身份认同。正如采访中一位讲唱者所说:“见到外地人,总是要问问他们有什么歌谣。”歌谣讲唱过程中,自我认同上升为地方认同的现象具有普遍性,而其作用机制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 (一)记忆之场

在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sup>[2]</sup>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继承了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视记忆为“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sup>[3]序言6</sup>。通过将“场所”(lieu)和“记忆”(memoire)合成生出“记忆之场”一词,诺拉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把这一概念从纪念性建筑、历史遗产拓展到了言语和日常生活,讨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意向<sup>[3]20-28</sup>。

记忆之场这一带有神秘感和含混性的概念,恰能表征民间歌谣中的记忆特征。歌谣既是最易感知、直接经验的对象,又是高度抽象、被赋予谶语性质的创作,通过代代相传,提供了一种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经验。

### (二)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是环境心理学中研究“人—地”关系

的核心概念。地方认同理论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核心维度组成<sup>[4]</sup>,关注个体与特定地理空间的情感联系,促进地方的发展和保护。目前对地方认同作用机制的研究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内生型地方认同。在人文主义视角下,强调人的主观体验、情感依赖和日常生活实践,即段义孚所谓的“恋地情结”<sup>[5]</sup>。二是外生型地方认同。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强调区位、自然条件差异对地方认同的作用,如大卫·哈维所言:“从记忆到希望,从过去到未来的旅途中,保护或建立地方感是一项积极的因素。重建地方能够揭示隐秘的记忆,这些记忆为不同的未来提供了前景。”<sup>[6]</sup>

民间歌谣的讲唱者多以地缘、血缘为纽带,从长辈、邻居处习得歌谣,讲唱的场景与本人经历相互联系,通过重新唤醒歌谣记忆使得那种对人和乡土的美好感觉再度复苏,再现了个体的情感体验和集体记忆,涌现出对地方特殊品质的愉悦感、自豪感和归属感。部分歌谣在生产和传递过程中,深度嵌入特定场景、仪式或节庆。如《洞房经》《上栋桁歌》,这些附着于特定时空的歌谣进入听众的文化认知,在深度沉浸感中强化了地方认同。同时,随着近代历史的浮沉、城镇乡村的兴衰,人口的聚会会带来歌谣的流动。透过大量的同宗民歌、同题异文,歌谣显现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对地方认同构建的共同作用。在当下旅游化、社会资本及外来文化入侵等外部环境变化下,民间歌谣也包含了更多异质因素,让地方认同的意义层次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 (三)研究框架

本文将“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作为中介,梳理出临海民间歌谣所蕴含的“记忆之场”及其特征,并结合不同时刻、不同主体所激活的歌谣记忆实例——如1955年牧童山歌经改编后登上大雅之堂、1992年《集成》经系统性编纂工作形成规整文本、2024年观众在展览中具身体验等,归纳出三种地方认同模式。

临海民间歌谣的形态,从最初的口头传唱变为书面的文字记载,再到如今在展厅中通过多种媒介材料得以再现,其负载的意义也由即时的、零散的生活表达,转化为承载地方文化、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本文将歌谣的讲唱者、采录者和编纂者,居民和游客,民间和官方力量都纳入对歌谣象征意义的建构过程,使这些主体一起参与筛选和固定民众对歌谣及其背后文化传统、集体历史的

记忆。不同主体对民间歌谣可能形成了不同的感知、情感和意向,通过内生、外生以及内外共生三类不同路径产生地方认同,赋予自身与地方联结的意义。

### 三、案例选择和研究方法

#### (一)案例概况

本文以“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的展出作品和展览事件本身为研究对象,分析展品内容层面的叙事策略和展览形式层面营造的体验空间,并阐述两者如何将民间歌谣还原为“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激活和强化了地方认同感。

在内容层面,展览集合了策划组长达1年的文献研究以及田野调查成果,回顾以《集成》为中心的歌谣编纂事件,访谈歌谣的讲唱者、采录者和编纂者,不同代际的文化站工作者、地方文化工作者等不同参与者,审视口头文学被文本化这一过程中的民间与官方力量的互动。在形式层面,展览借助实物、影像、声音材料,模拟歌谣讲唱的立体环境,补充其在书面文献中被抹去的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背景,让观众能够切实感受民间歌谣的魅力。此外,展览空间还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进行综合展演和学术讲座活动,延续民间歌谣的开放精神、平民价值和民众智慧,为挖掘、传承和建设地方文化注入新的可能性。

####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法收集材料。笔者参与了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的田野调查全过程,寻访临海古城及周边乡镇的歌谣讲唱者,并对当年负责编纂《集成》的文化站、文化馆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经整理得到15篇访谈材料。同时,笔者参与了2024年9月至10月的展览筹备阶段,进行了全程的参与式观察,并获得了包括展厅选址、展品布置、现场观众互动和反馈在内的第一手经验材料。

### 四、歌谣的“记忆之场”特征

#### (一)从《集成》到群文系统:歌谣的知识生产伴随新时期民俗学的复兴,民间歌谣成为研

究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构建的重要材料。1984年,包括《中国歌谣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撰工程启动,在全国普查、采录的基础上,历时20余年整理出版,保存记录了中国各省、市、县范围的民间歌谣。《中国歌谣集成》代表的是官修类书传统,其中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无处不在,形塑了口头传统的文本化后、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民间歌谣的样貌。以1992年《集成》为锚点,可以看到讲唱者、采录者、编纂者等多元主体穿插于这一知识生产机制,合力服务于群众文化这一整体性、社会性目标。

当时市里的宣传部部长说了一句话,(《集成》)不是一般的、灵活性的东西,而是作为民间一定要保存下来的知识,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编纂者S)

在田野采风的时候,会去不一样的地方,一定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如果出现异文,就要另外再找一个讲唱者,看有没有补充或者修改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两个或者三个版本,再选择讲唱完整、情节合理的收录进来。(编纂者Y)

调查线索是各村老年协会提供的,村里妇女主任问村里有谁会唱小调、山歌调、孟姜女调。知道了之后,平时就会去村民那边了解一下。确定讲唱人以后,找临海市文化馆对接,文化馆有专门的录音棚。我们就把讲唱人带到文化馆去录音。录音的时候让他们自由发挥,山歌讲究的就是随性而唱。(采录者L)

当年负责《集成》编纂的主力是年轻的文化站、文化馆工作人员,属于群众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了政策宣传、文艺改造、社团活动等诸多方面,配备了专业人员组织“群文学会”以及机关刊物,拥有软硬件设备,如包括唱机、幻灯、图书等的“文化挑”,另外还有实体场所如工人农民俱乐部、文化馆、少年宫等系统设施。改革开放以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群文系统仍延续了国家主导文化事业的运作逻辑,组织民众参与文化活动,首先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不可否认的是,《集成》的编纂工作背后,承载着一个覆盖城乡、凝聚社会主体认识并致力于改造社会现实的宏伟构想<sup>[7]</sup>。

在歌谣从口头到文本这一转换过程中,群文工作者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展览中,大多数接受采访的群文工作者已经退休或转岗。他们带着追忆青春的心态热情地回顾了这项工作。他们对于歌谣价值以及本真性的认识与其自身经历、个性

差异有关,如采录者L有家传的民间曲艺爱好,认为《采桑歌》中大胆泼辣的内容应尽可能保留,而采录者H通过自考进入行政编制,认为对原生的歌谣进行删减改造是完全合理的。

### (二)“旧瓶装新酒”<sup>[8]</sup>:歌谣的主流改造

展厅一楼的墙面上挂有两个耳机,播放着同一曲调的两首异文歌谣。歌词分别是:

#### 杜鹃鸟<sup>①</sup>

杜鹃鸟哎叫落阳,  
看牛小弟哭亲娘。  
别人衣穿又饱饭,  
只我梦中见亲娘。

#### 救命恩人共产党

日出东山红似火,  
我看牛小弟笑呵呵,  
东山上藤缠树来,  
西山上那树缠藤,  
受苦的人儿缠上了共产党,  
救命恩人是毛泽东!

前一首《杜鹃鸟》是临海原生态民歌,演唱者刘道寄当时年仅14岁。1954年,刘道寄偶然间被大田文化站推选参加了临海县的文艺汇演,此后一路参加地区、省里的文艺汇演皆获大奖。1956年,在他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时,为了配合形势,省里专家对民歌进行再创作,形成了第二首歌《救命恩人共产党》。这首歌一炮走红,刘道寄也因此获得机会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唱该歌曲,还发行了唱片,引起音乐界的轰动。

这段经历也改变了歌者的命运,让一个乡间放牛的小牧童破格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在被时代浪潮短暂推举之后,大田镇牧童刘道寄的故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落幕:他意外在1961年辍学回家务农<sup>②</sup>,并且从此在乡间生活。在邻居的回忆中,他成为“娶不来老婆”的普通农人。1978年,38岁的刘道寄因一场意外去世。

这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歌谣改编的例子。随着官方对歌谣创作的鼓励,群文系统对民间歌谣进行选择、解读和重构,打造出了有地区代表性的歌谣,并将其推介至大雅之堂。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歌谣并非完全与主流意识形态无涉。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革命浪潮都不同程度地借用或改造歌谣,使之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从而推动民众的观念变革,尤以1958年的新

民歌运动为盛。官方通过歌谣这一记忆载体,既强化了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也以历史构建者的身份,融入了平民文化的脉络;而个体情感在与官方叙事发生分歧时则被完全压制,逐渐被历史尘埃覆盖。

### (三)时空的“湍流”:歌谣的具身体验

展览不仅仅是歌谣的“单向陈列”,也成为地方认同的再生产和再塑造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展览形式的体验,公众的参与和认同被激活和塑造。

展览的展厅位于临海市崇和门惠风楼的城门楼上,南北通透、四面临风,正呼应“风从何处来”板块的标题。临海市既有广袤的山地丘陵,又拥有众多海岛,海陆兼备的栖居空间决定了人们猎山渔海、凿饮耕食的生产生活方式,临海歌谣是这一地域文化格局忠实而立体的佐证。展厅中心的展具上覆有带海水腥气的渔网,当观众凑近阅读和翻动悬挂着的文献材料时,能够通过视觉、触觉、嗅觉感知到歌谣中的物质现实。

展览中专辟“不辍弦歌”板块讨论歌谣的音响要素。不满于《集成》中大量借用普通话读音、创造俗字来表记临海方言,忽略了许多古老的语音层次和精细的口语信息,策划组以调形图《斗斗虫》《懒汉谣》《天上一颗星》,尝试描写临海歌谣的语音轮廓和音域,将语言与事物之间的神秘应和图像化,呈现出方言音响实感。展览期间,“河边走”乐队围绕临海市古城墙和东湖即兴演奏,来自云南彝族的表演者在展厅中奏响口弦时,没有具体唱词但同为民间歌谣的韵律打动了观众。歌谣成为触发回忆、承载乡情的象征空间。

正如一位讲唱者所说,“我的声音里有我爸爸的声音”。歌谣既重现了个体生命经验,也传递了群体的集体信仰。尤其是仪式歌,扎根于民众心里,与岁时、婚丧、方术等民俗信仰相互纠缠。讲唱者的创编、听众的参与、演出的空间共同构成了理解临海歌谣的重要情境。展厅二楼放映的影片《上栋桁歌》里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讲唱情景,主家更易新衣、备办饮食,木匠师傅享祀先师、感恩神明,从

① 本文涉及的歌谣作品皆出自“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

② 成公亮的口述回忆录《秋籁居忆旧》中,记录了一段刘道寄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故事:刘道寄在一次下乡劳动时,没有救落水的同学,由此竟被写了许多大字报,众怒难犯。“树这个典型好比下棋,出了一个臭子,全盘搞砸了。”大约两年后,刘道寄变了声,就在学校里消失了,也很快被大家忘记了。

“开白”“成桁”“贺桁”“祭桁”“索桁”至“上桁”，众人唱诵喝彩，场面庄严而喜气，与日升节律相接，令人难以忘怀。有许多外地观众在观看歌谣影片及触摸展台上“上桁”后抛掷的红色小榔头时，提到他们家乡浙江东阳、湖南等地也有类似的仪式和歌曲。这也印证了民间歌谣保存了乡土社会的感统结构，在歌谣创造的象征空间中能够激发个体记忆和特定感受，使个体重返人与地方之间古老而亲密的家园体验。

## 五、歌谣记忆对地方认同构建的作用机制

韦大列在1896年出版的《北京的歌谣》中将民间歌谣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认为“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之上，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生发出来”<sup>[9]</sup>。这一判断激发了周作人、常惠等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对歌谣的兴趣，发起了北大歌谣运动，呼唤“眼光向下的革命”<sup>[10]</sup>。经过一百年的摸索和验证，今天的我们对歌谣的价值具有更深厚的认识，尤其关注到歌谣在一些现实社会议题的讨论中，如传承地域特色文化、激发地方感知和地方认同等问题上有何作用或者其新形态如何演变<sup>[11]</sup>。

### (一)内生地方认同

策划组曾在一年内两次拜访讲唱者C，在她口中听到了《十香袋》《十要俏》《闹洞房》等长篇歌谣。我们非常好奇老人如此庞大又在经年间不曾忘却的歌谣库，从哪里来？讲唱者C自言从小喜欢听人讲唱歌谣，“那时家中在永安溪旁的‘望洋店’做百货生意，也兼卖酒水。此处地理位置颇为紧要，水路上‘上接河滩，下接海口’，是往来海门港的重要航线。陆路上‘上屋走落两边开’，西边缸窑、杨杜的村民上更楼赶市都得走这条路”。在老人的讲述中，1957年10月，临海至仙居的公路才建成通车。在此之前，店门口往来行船络绎不绝。家中开店的那条街上，南货店、糕饼店、饭店俱全，甚至仅卖木炭的摊贩就有18家。天南海北的行商船客在店里歇脚采补，也在无意之中把嬉笑怒骂的歌谣老话讲给了一个年岁尚轻、好奇一切的小女孩。待到公路建成，望洋店的陆路就成了岔路，而水路走的人也少了，逐渐不兴旺了。

当策划组问起歌谣的时候，讲唱者C依然流露出小女孩般的雀跃和欣喜。这意味着歌谣与她的生命体验产生了深度关联。通过讲唱歌谣，她能够分享土生土长小世界里的地方知识，表达对已经消逝但铭记不忘的人、事、物的情感依恋。

### (二)外生地方认同

#### 点点扳扳

点点扳扳，家住南山，  
南山北斗，乌南小狗，  
红布白布，毛兰细布，

何人拔牢勃算数/少狗脚踏斫一只。

《点点扳扳》是在临海人中流传最广的歌谣之一，版本和解释也多种多样。总体来说，歌词趁韵而成，并没有连贯的意思，但共通的是此歌谣的讲唱场景。往往在多人围圈时唱，边唱边点人数，唱最后一句话的人或成为被选中的对手，或从圈内退出，其他人接着进行下一轮。具体玩法多样，有讲唱者说是用竹棒点膝盖的、有讲唱者说是点脚的，总之是与足相关的游戏歌曲。有学者记录收集了全国范围内的《点点扳扳》异文，指出其中不变的有两个要素：一是南山，二是脚。“脚”又可分为“烂足”和“缩脚”两系<sup>[12]</sup>。

在展览对若干不同版本的歌谣盘点中，有这样一则异文：

#### 倭乱斑斑

倭乱斑斑，斑过南山，  
南山搏斗，倭卵吓抖，  
四十弓箭，长矛扁尺，  
当家人威、威、威，  
乃崦岭头全歼灭。

雄鸡别草鸡，

别到板坑弄头喔喔啼。

由于泛临海地区在明代深受倭寇袭扰，戚继光抗倭的事迹进入了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与童谣韵律结合产生了新的版本，反过来作用于这一历史记忆的传承。张哲能在《九十琐忆》一书中回忆，自己年少时仍听卖炭老人口述这样的抗倭童谣。

近年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依托古城资源发展旅游业，在公众平台上发布歌谣或改编的歌曲作为城市宣传内容，不仅面向本地居民，还用来招揽外地游客。面对这种由外力主导、推动歌谣记忆再生产的强力举措，一部分本地居民报以正面的情感反馈，认为增强了自己对地方

的认同感;然而也有部分居民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对此反应冷漠,形成不稳定的、含混的地方认同。

何以如此?这里隐藏着社会和环境的辩证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歌谣生长的农耕环境剧烈变动,民间歌谣逐渐散佚,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加之近年来,旅游开发和流行文化的并行趋势,肇生了城市同质化现象,侵蚀了地方感知和本土营造观念。特别是当保护和建立地方感知被当作一项资源,援引地方的本土传统和形象时,需要将民间歌谣及其背后历史文化记忆的丰富层级进行压缩和简化,以便转化为消费产品和服务。为扩大宣传影响力和传播效率,当地政府在推广歌谣时,常以单一历史叙事或“非遗保护”标签化方式界定民众的文化身份。然而,这些举措未必能够被所有临海居民认可,反而可能因个体感知和经验的差异引发排斥,进而阻碍地方认同的形成,削弱民众参与深层次地方文化互动的意愿。

### (三)内外共生的地方认同

在对大陈岛歌谣及群文设施的个案研究中,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在宏伟的纪念建筑、单一的垦荒叙事之外,岛上居民无人能回想起祖辈的歌谣;而通过网络检索,策划组发现在海峡对岸,一首《墨鱼谣》的旧词被重新发掘和创作,编入《要忘大陈》的新曲,牵动了70年前撤退到台湾的大陈岛居民的乡情。

台州生来福建养,回到台州好劈鲞。

大陈撤退到台湾,落在各处当故乡。

百工百业在各方,各自努力枝叶旺。

辛辛苦苦为子孙,大陈精神永弗忘。<sup>①</sup>

1955年2月,在一江山岛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施行了“金刚计划”,裹挟大陈岛上的居民撤退至台湾。大陈居民上岸后,按照渔、农、工、商等类别被重新安置和分散在台湾各地,今天台湾仍然可以见到“大陈新村”“一江新村”等安置居所。2025年2月,在“集大陈”团队发布的《要忘大陈》歌曲中,副歌首句取自民间歌谣《墨鱼谣》:“台州生,福建养,回到台州好劈鲞。”这句歌词描述的是墨鱼的洄游习性,一般在春夏之交,墨鱼随洋流到台州海域产卵,形成了传统的东海墨鱼汛。渔民会将捕捞的墨鱼制作成鱼干,称之为“鲞”。清人王克恭在临海隐居期间撰有专论《鲞经》。

在大陈后人的回忆中,这首歌谣不仅有关于故土的饮食习惯,而且融入了漂洋过海、落地生根的艰辛场景,历史和日常在歌谣中相逢。展厅的最后板块“尾声:未竟的故事”体现了随着环境整体条件改变而不断变化、内外共生的地方认同。一方面,溯源而上,策划组从历史档案中的原岛印象出发,于2024年7月对大陈岛进行实地考察,并追寻群文线索,在8月与台湾的“集大陈”团队从网络相逢走到线下交流。策划组和“集大陈”团队似乎被不可言状的缘分所牵引,最终触发共鸣和感动:尽管相隔大半个世纪,甚至两岸联系中断、政治变动,而民间传唱的歌谣始终享有共同韵律,始终是连续性的。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歌谣的文化传统是长久不变的。事实上,“集大陈”团队热心保存、转译、复兴的文化,部分内容是我们熟悉的乡音乡情,部分内容源于台湾地方创生、多元族群融合的现实语境,譬如其团队成员中不仅有大陈岛的后人,而且有客家人、台湾少数民族等。于他们而言,“乡土情怀”并非特指一籍一地,还可以是一种凝聚各方力量、共赴共同心愿,并以此推动现实议题解决的实践路径。

## 六、结语

“民众的诗情:临海民间歌谣新集”展览,突破了传统上歌谣研究偏向文献的、静态的范式,聚焦于作为“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民间歌谣实践。展览以具体的歌谣为例,呈现了临海民间歌谣的发展脉络:从纯粹逍遥于民间的文体,到受到革命力量鼓舞、被官方文化秩序统合,经由群文系统编纂为书面文献《集成》,再到当代文旅宣传事件中成为旅游景观和公共文化的展示物。民间歌谣在时间、空间的湍流中不断被借用和重塑。

与此同时,临海民间歌谣本身具有抗拒传递单一历史叙述、拒绝被固定于“非遗保护”的封闭框架中的势能。不同主体在讲唱、编纂、呈现民间歌谣时,或是基于个人过往体验、乡土情结等内在驱动,或是立足于改善经济、促进社群凝聚等现实考量,共同参与着歌谣的传承和更新。总之,

<sup>①</sup> 《要忘大陈》来自“集大陈”团队,原视频网络链接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963Oy1XyE>。

敞开对歌谣复杂性的感知,容纳民众真实的心声和表达,有助于唤醒不同主体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才能获得更广阔也更坚实的地方认同,让扎根于血脉的传统在当代长出创造力的新枝。

#### 参考文献:

- [1] 威斯勒.人与文化[M].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8.
- [2]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1-91.
- [3] 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4] 戴旭俊,刘爱利.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9,38(5):662-674.
- [5] 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5.
- [6] 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51.
- [7] 郑永富.群众文化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348-350.
- [8] 丛新强,李丽.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论“十七年”小说的歌谣嵌入现象[J].当代文坛,2020(5):7.
- [9] 韦大列.《北京的歌谣》序[J].常惠,译.周作人,校.歌谣,1923(20):8.
- [10]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自序6.
- [11] 袁瑾.民众的诗情:歌谣研究七十年综述[J].民间文化论坛,2019(3):30-41.
- [12] 薛冰.风从民间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92.

## Realms of Memory and Local Identity of Ballads —Taking the Exhibition "The Poetry of the People: A New Collection of Linhai Folk Ballads" as an Example

Wu Zhijing

(Institute of Aesthetic and Critical The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Folk Ballads, as "the national poetry" that expresses the sincere emotions of the people, embody rich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revival of folkloristics in the new era, folk ballads have becom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The exhibition "The Poetry of the People: A New Collection of Linhai Folk Ballads"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compilation of *Collect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Volume of Ballads of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It revisi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folk ballads' transmission, preserv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community. Rooted in rich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as well as vivid fieldwork experiences, the exhibition presents a complex and vibrant "realms of memory", where the past and present intertwine. The exhibition's exhibits and the event itself not only sort out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alms of memory" of Linhai folk ballads, but als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how ballads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through arous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y. Ultimately, three representative place identity models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Linhai; folk ballads; realms of memory; local identity; exhibition

# 方孝孺古籍辨伪之探赜

陈心怡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在朱熹、宋濂等理学先贤的思想熏陶下,方孝孺不仅继承了前辈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在辨伪方法上有所创新,最终形成了系统而精深的古籍辨伪思想。方孝孺通过对古籍的细致研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质疑,并对存疑文献进行了严谨的考辨。他以实证为基础,从语言特征、概念演进、思想脉络三个维度初步构建了系统的古籍辨伪方法。方孝孺的辨伪工作以“疑”为始,方法严谨、态度审慎,其辨伪成果不容忽视。

**关键词:**方孝孺;古籍辨伪;思辨性;思想脉络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7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世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享有“天下读书种子”的美誉。在校雠学领域,方孝孺以其“正统思想”为底色,发展出系统的古籍辨伪方法。在《读三坟书》《读夏小正》《读司马法》《读子华子》等杂著篇章中,方孝孺展示了其对古籍真伪的深刻思考。针对不同类型的作伪方式,方孝孺采用不同的辨伪方法,或以观点是否合乎“道统”考察真伪,或以内容是否合乎历史逻辑核验真伪,或以文字风格比勘文体特征辨别真伪。这种系统、完备、综合的古籍辨伪方法在辨伪学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学界仅有张心澄、顾颉刚、司马朝军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方孝孺的辨伪成就。张心澄在《伪书通考》中收录方孝孺对《周易》的辨伪之篇,司马朝军更是称“惟有高明如方孝孺者始可味其辞而断其真伪”<sup>[1]329</sup>。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了解方孝孺的古籍辨伪思想提供了帮助,但是仍然有可以深入研究之处。本文拟对方孝孺辨伪思想的形成、辨伪方法特征及古籍辨伪的影响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深化学界对方孝孺辨伪成就的认识。

## 一、方孝孺辨伪思想的形成

作为历史文化古国,我们历来重视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研究,但古人传播文献的途径有限,文献保存不便,一些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出于追求个人名利或者政治地位等原因,一些人伪造或篡改文献、制造伪书,加之古代文献鉴别的技术有限,促使了伪书数量的增加。因此,辨别伪书的工作变得十分重要。最早的伪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秦火以后,中国古典文献大半烧毁,而西汉初,政府悬金求书,于是伪书大出。”<sup>[2]</sup>到了魏晋时期,作伪的风气一度猖獗。有作伪就有辨伪,汉代的辨伪是考据学的创始时期,对后世辨伪学影响深远。宋代之后,随着辨伪学研究的深入,辨伪的风气蔚为大观,欧阳修、王安石、郑樵、朱熹等学术巨擘将辨伪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元明辨伪则是继宋之后的又一发展。学界通常认为,胡应麟的《四部正讹》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辨伪方法,但在此之前,方孝孺已经在总结辨伪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辨伪三法”<sup>[1]324</sup>。方孝孺

的辨伪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既继承了宋濂的辨伪意识,又融合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并且在辨伪方法上有所发展。他对《三坟》《夏小正》《汲冢周书》《周礼》《三略》《子华子》等古籍进行严谨的辨伪考订,形成了一套辨伪的方法。

### (一)方孝孺辨伪思想的师承脉络

作为继宋濂之后浙东文人群体的领袖,方孝孺深受其师宋濂考辨群书的影响,在辨伪思想上与宋濂一脉相承。宋濂(1310—1381),字景濂,被朱元璋列为“开国文臣之首”。提及明代的辨伪学家,除却熟知的胡应麟、王世贞之外,一定绕不过的学者就是宋濂。司马朝军曾评价宋濂著作《诸子辨》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著”<sup>[3]</sup>。在群书考辨领域,宋濂功勋卓著,作为我国辨伪学史上第一位专著一书以考辨群书的学者,其代表著作《诸子辨》中所涉及的辨伪方法、辨伪思想以及对古书作伪规律的总结对后世影响极大。宋濂的《诸子辨》考辨了先秦至宋代44种子书的真伪,杨绪敏在《中国辨伪学史》一书中将宋濂考辨的特点和方法总结为以下几点:“承袭旧说而又有所发明”<sup>[4]110</sup>，“采用新的方法和角度考辨其伪”<sup>[4]111</sup>，“驳正旧说,阐发己见”<sup>[4]113</sup>，“揭示古书作伪之规律”<sup>[4]114</sup>。方孝孺作为其弟子,自然也在这种学术影响下形成了自己对于辨伪方法的想法。

方孝孺在古籍考辨上明显受到了宋濂古籍辨伪的影响。宋濂的古籍辨伪从源流、思想、史实、风格、来源等方面入手,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考辨古籍真伪。方孝孺综合考辨古籍的方式正是源于对宋濂辨伪方法的继承。在《三坟》的考证中,宋濂从文本内容出发,将《三坟》中的《山坟》《气坟》《形坟》与孔安国所称《三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相比较,指出现传《三坟》与孔安国时期《三坟》的内容大不相同。他在《诸子辨》中言“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sup>[5]</sup>,质疑现传《三坟》为伪书。而后,方孝孺在其师宋濂的基础上作出系统辨别:“书之名真而实伪者多矣,何从而信之哉?亦在审辨之尔……。若世传《三坟书》者,则又凡鄙而易见者也。”<sup>[6]126</sup>方孝孺从内容、思想、概念三个方面出发,更加系统全面地证实了《三坟》为伪书,是对宋濂辨伪内容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尤能证明方孝孺受到宋濂影响的是《子华子》的辨伪。宋濂在《子华子》辨伪中提出四条“不可知

者”以证其伪:一为子华子跨春秋前后二百余年见秦襄公与韩昭僖侯,时间相去甚远,不符合实际情况;二为程国作为西周内小国却并于河内湿地,地理相距远,亦不符合实际;三为此书称子华子乃鬼谷子师,然而内容却似道家思想,且拼凑多方典籍;四为文章风格与刘向校书特点不同。宋濂通过这四条内容判断《子华子》为伪书。方孝孺则在《读子华子》一篇中指出该书多有虚妄,实为伪作。他认为《子华子》既有老子、庄子的思想,又刻意模仿《左传》的风格,内容牵强,并窃用韩愈的文句,还涉及后世之事,存在八卦、解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子华子》的辨伪问题上,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基本辨伪思路,又在语句风格分析方面形成了更加系统的论证。方孝孺言:“余始闻太史公言,《子华子》为伪书。近求其书以观,其辞婉丽可喜,未觉其为伪也。及详味而徐察之,始知为伪书无疑。”<sup>[6]131</sup>此文段中太史公指宋濂。宋濂的辨伪观点为方孝孺提供了关键性的学术指引,在没有受到宋濂启发前,方孝孺对该书的评判也只停留在其辞婉丽的文风上;在宋濂辨伪思想的启发下,方孝孺又通过系统考察形成了独立的判断。由此可知,在古籍辨伪上宋濂对方孝孺影响极大。

### (二)方孝孺辨伪思想中的朱熹理学底色

在方孝孺辨伪思想的构建过程中,朱熹理学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世称晦庵先生,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辟了新的方向,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方孝孺理学思想就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方孝孺正统论的问题意识首先起于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述正统谱系的质疑”<sup>[7]</sup>。在辨疑上,方孝孺的“始于有疑而终于无所疑者,善学者也”<sup>[6]120</sup>与朱熹所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sup>[8]</sup>有异曲同工之处,明显融入了朱熹的怀疑精神。方孝孺称“然近世先儒,立言为世法者,莫大于程子、朱子”<sup>[6]327</sup>。朱熹对他的影响不仅在理学思想方面,还渗透于他的文学主张,体现在他的古籍辨伪工作中。方孝孺的《读朱子感兴诗》一篇最能体现他对朱熹的推崇:

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岂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

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岂吾所谓诗哉!呜呼!若朱子《感兴》二十篇之作,斯可谓诗也已。其于性命之理昭矣,其于天地之道著矣,其于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系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无愧,虽谓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亦可也。斯道也,亘万古而不亡,心会而得之,岂不在乎人哉!<sup>[6]144</sup>

方孝孺认为《诗经》之后的诗歌背离了“道”,因而不能称之为“诗”。这里的“道”不仅指儒家诗教的理念,还有朱熹所阐释的性命与天理。在对朱熹《感兴》诗的评价中,方孝孺尤其重视“道”的阐释,将朱熹的诗歌与《诗经》相较。从这一诗评中可以看出方孝孺的诗学观与道统观是融汇在一起的,这种以“明道”为标准的诗学评价体系,与方孝孺古籍辨伪思想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呼应。在进行《夏小正》辨伪时,方孝孺提到“圣人之经,传之万世而无惑者,以其明道也”<sup>[6]128</sup>,这一论点与他评价朱熹诗歌中的“斯道也,亘万古而不亡”思想一致。在古籍辨伪中,方孝孺不仅通过评判古籍中的道统价值来判断其真伪,还通过古籍的现实意义判断古籍的价值,这正是因为他受到“明道”思想的影响。

除此之外,朱熹辨伪古籍时注重义理。他曾言:“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sup>[9]</sup>朱熹的辨伪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义理辨伪,即依据儒家义理判断古籍真伪;二是佐验异同,即通过比勘不同文献的内容异同,进行详细考辨,最终得出真伪结论。白寿彝在《朱熹辨伪书语》中将朱熹辨伪时重点比勘的内容概括为:“确知作伪者是谁”<sup>[10]7</sup>,“一书的内容与历史上的事实不符”<sup>[10]8</sup>,“一书中的思想与其所依托的人之思想不符”<sup>[10]8</sup>,“一书中的内容之抄袭凑合之迹显然可见”<sup>[10]9</sup>,“一书之文章的气象”<sup>[10]9</sup>,“一书之文章的体制”<sup>[10]10</sup>,“一书所用的词句”<sup>[10]10</sup>。根据白寿彝的总结,朱熹的辨伪方法兼具简明性与多样性,涉及体制辨析、词句对比、思想验证、文章气象辨析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以义理为依据辨别古籍真伪的方法,在方孝孺的辨伪实践中均有相应的体现与拓展。如《读荀子》一文中,方孝孺推崇孔孟学说,批判荀子剽窃孔孟余言,反对以私心蛆蠹理性。可以说方孝孺的古籍辨伪,既延续了朱熹义理辨伪的方法,又体现了程朱理学在明初的影响力。

## 二、方孝孺古籍辨伪的特征

方孝孺的辨伪以历史考证为根基,辅之以思辨性质疑和综合辨伪方法,从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古籍辨伪思想体系。方孝孺曾言:“治经不可致疑也,疑经太过则圣人之言不行,亦不可无疑也,不能有疑则圣人之意不明,始于有疑而终于无所疑者,善学者也。”<sup>[6]120</sup>这段言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方孝孺对于古书辨疑的看法。方孝孺认为致力学古时需要发出疑问,但是如果质疑过度则会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完全不质疑则不能理解圣人的意思。因此,学古应该有限度、有理性,如此方能被称为善学。在对古籍进行辨伪时,方孝孺展现了其丰厚的学术储备和严谨的辨伪态度。具体而言,方孝孺古籍辨伪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 (一)综合性辨伪方法的构建和应用

方孝孺的辨伪方法最初在《读三坟书》中提出,并体现在实际古书辨伪的过程中。方孝孺在辨伪时倾向于通过考证史料来辨别传世文献的真伪,注重文献之间的比较,力求从多个角度对文献进行严密分析。比如文字出现的时间是否符合实际、典制是否符合规制、义理是否符合正统等。在经典古籍的辨伪工作上,方孝孺对《三坟》《周礼》《汲冢周书》等传世典籍提出了判断真伪的新观点,力求辨别古今杂糅中的真伪,并对一些文献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在此基础上,方孝孺总结了三个辨伪的方法,司马朝军将其命名为“方氏三法”,即“味其辞以望其世之先后,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质诸道以索其旨之浅深”<sup>[6]126</sup>。“方氏三法”中,方法一所讲“味其辞”是指品味、揣摩文辞,“望”字引申为察看,即通过揣摩文辞的风格和内容察看文章所在时代的先后;方法二所讲“正其名”为辨正名称、概念,“求”字为求索之义,即通过辨正概念求索文本的核心观念;方法三所讲“质诸道”为辨别道统,“索”为探究之义,即辨别道统来探究义理的深浅。方孝孺以这三个方法为支撑对古籍文献进行判断,并认为通过这三个方法进行辨伪就可以做到“真伪无所匿矣”<sup>[6]126</sup>。

在对古代典籍进行辨伪时,方孝孺有意运用此三法考辨古书真伪。以《三坟》辨伪为例,方孝

孺认为《三坟》“考其辞则不类,正其名则不合,质诸道则浅陋而无稽”<sup>[6]126</sup>,足以证实《三坟》伪书本质。在对《三坟》进行考证时,首先,对《山坟》的《姓纪篇》中提到的观点进行列举,质疑其中的“太始、太极、太易、太初、太素”<sup>[6]126</sup>为庄列的余言,此一疑也。方孝孺认为这些观点剽窃《庄子》《列子》的思想,编造出一些不同的学说,判断其“质诸道则浅陋而无稽”<sup>[6]126</sup>,从而其真伪自有决断。其次,对“木为金所克服”<sup>[6]126</sup>进行反驳,认为这些观点是后世常谈,《三坟》作为伏羲之时的作品,其内容中出现了后世才能见到的观点,真伪则有待考察。同时认为“四民”“策”“天地圆丘”“恩及命妇”等名称出现的时间与书籍问世的时间不符,尤其像“山月升腾”“川月专浮”等词汇作为唐人诗词中的词句出现在这里更是荒谬,此二疑也。方孝孺从文辞的角度考察,发现其与所标榜的时代不符,证明“其名不合者也”<sup>[6]127</sup>。最后,方孝孺还根据自身的学术修养指出“惟天生民”“惟君奉民”等观点是窃取了《书》《易》的观点,此三疑也。通过这三个疑问断定《三坟》为伪书,并且是“近代作伪”。此外,方孝孺还针对《三坟》的源头作了探究,以孔安国对“三坟书”的解释为考辨对象,通过多方探究最终认定“彼伪为书者,因其言而复僭袭《周礼》三易连山、归藏之名,以为伏羲神农之书”<sup>[6]127</sup>。方孝孺认为,这些作伪之人僭越套用《周礼》所载“三易”中提到的《连山》《归藏》的名称,并且将这些书籍冒称为“伏羲、神农之书”。通过多方辨别,方孝孺最终判定《三坟》为后人伪作。

方孝孺的辨伪方法从“味其辞”“正其名”“质诸道”三方面衡量古籍的真伪。它们从文本、概念、思想三个角度平行辨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锁链式的辨伪体系,不单独使用某一方法,而是三个角度同时进行。在实际的辨伪中,方孝孺在辨伪三法的基础上还构建了实用性的立体框架,通过文本互证、文本内证、思想溯源完成对辨伪方法的实际运用,将方法论与实践结合,内化到文本的阅读中。

## (二)历史逻辑考证的实践路径

方孝孺在运用辨伪方法时还会基于历史逻辑展开考证,通过文本特征与时代背景的相互矛盾来揭开作伪的痕迹。比如在《三略》的考证中,他指出不仅文章内容风格浅陋,而且其中杂糅的军事思想也与时代特征不符;在《汲冢周书》的考

订中,结合《大明篇》《文传篇》的内容断定书中所写与史实冲突,等等。方孝孺这种以时间顺序和历史逻辑为依据的辨伪方法在辨伪学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三略》的考辨中,他指出:“《三略》三篇,或谓太公之书,非也,盖后人伪而托焉。……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浅鄙狭,杂援军识以足成之,夫识书起于战国之后,太公之时曾有之乎?”<sup>[6]131</sup>方孝孺认为《三略》文风浅显,理论不够精深,并且杂糅了许多后世的军事思想,但是成书的军事书籍是在战国之后才有的,《三略》被托名为黄石公所作,却明显带有战国以后的兵学特征,因此不符合西周初期的历史背景。这是利用了作品内容的出现时间之误辨别此书是后世伪作。虽然方孝孺对于《三略》“平浅鄙狭”的评价稍有偏颇,但是对于《三略》真伪的考辨却有理有据、观点可靠。关于《三略》作者的考辨问题,清代之前学者大多认同是黄石公所作,清代之后姚际恒、纪昀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三略》为后人伪托之作。这些讨论至今仍然被学者们所关注,但是方孝孺在明代就曾提出的观点却并不在后人讨论的范围内。实际上,方孝孺的这些辨伪方法对文献校勘和历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并未得到挖掘和传播。这是方孝孺学术成果传播的不足,应该被更多后世的学者所发现。

在《汲冢周书》的考订中,方孝孺提出了一系列的辨伪依据。第一,质疑《世俘篇》中记载的人数:“所诛以亿万计,天下尚有人乎?”<sup>[6]129</sup>通过夸张的人数与实际情况不符证明其内容作伪。第二,质疑文中记载的周公考察人才的方法过于低劣:“醉之以酒,以观其恭;纵之以色,以观其常’……虽战国之世纵横权术之徒所不为,曾谓周公而以此取人乎?”<sup>[6]129</sup>他认为这样的识人之术并非周公这种圣贤之人的作为。第三,方孝孺列举了《大明篇》以及《文传篇》的内容对此书提出疑问,对《文传篇》中“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三年之积者霸”<sup>[6]129</sup>的观点,评判其“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尝有之”<sup>[6]129</sup>,这里以文辞出现的时间来评判真伪。通过一系列内容的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及载武王伐商之事,往往缪诞,与书不合。由此观之,决非周书。”<sup>[6]129</sup>第四,方孝孺还会探究书籍的流传情况以辨别真伪。《汲冢周书》的形成和流传问题在学界备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汲冢周书》为战国魏墓所出。班固的《汉书·艺

文志》将其附于《周书》之后,刘向判定此书为孔子删《周书》的余篇,颜师古沿袭此说。晋代始称此书为《逸周书》以区别于《尚书·周书》,直至隋唐才被称为《汲冢周书》。方孝孺判断的核心论断是“刘向谓其书为《周书》,即孔子删定之余者,则非也”<sup>[6]129</sup>,否定《汲冢周书》为孔子删定的《周书》的余篇,从文献源头否定了此书与《尚书·周书》之间的关系,进而判定此书为伪书。在具体的考证中,方孝孺系统比勘《尚书》与《汲冢周书》的差异,得出《汲冢周书》并非周代文献的结论。但是基于部分篇章与《周书》的内容又具有契合性,推理出此书大概是汉初散佚后,由隐士缙绅之流作伪,又解释了司马迁误引的原因,对流传过程中伪书出现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辨证内容完备,考辨过程严谨。

### (三)思辨性辨伪立场的形成

在考辨古籍时,方孝孺提倡要审慎,反对草率判断书籍的真伪,不能仅凭片面或偏颇的证据做出结论,而忽视伪书的价值。在辨伪的基础上,方孝孺对于作伪的时间有所关注,在对《汲冢周书》进行辨伪时提出,此书虽然为伪作,但是文章内容近似古体,仍然有可以采用的地方。方孝孺在辨伪时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流传于世的文献,不会轻易因为伪书性质而全盘否定流传文献的价值,但对于《三坟》这类“近代作伪”的书籍则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这类近人有意作伪的书籍有愧于人。

在对历史典籍考辨的过程中,方孝孺常采取质疑的态度,对于经典内容的接受并不因书籍问世时间的先后而盲目相信。在分析《夏小正》时,方孝孺指出:“孔子有取于《夏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耳,岂诚谓此书乎?使此书果夏之遗书,孔子曷不编于《禹贡》《胤征》之间乎?孔子倘见此书,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时》乎?”<sup>[6]128</sup>方孝孺质疑《夏小正》是否真的是孔子所说的夏朝遗书,还根据个人经验对古籍真伪进行判断。他认为圣人传承的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万世而不使人迷惑,是因为其阐明了道义。如果这些经典并没有对人们的道义观念有所增进,即使说《夏小正》源自孔子之壁,成于尧舜之时,也只是能够称之为古书而不能称之为经典。这种辩证的观点体现了方孝孺古籍辨伪思想的思辨性。

方孝孺的辨伪工作并不依据前人的成果而盲从。比如对《吴子》的判断,前人皆以为伪书,

而方孝孺却认为其为战国之书。他提出:“观其论兵,则孙武之亚也,而武之说为明备矣。起尝与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险,信战国时之名言。特以无行见少于世,亦可以见圣人之教人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终不可泯也。”<sup>[6]134</sup>方孝孺认为吴起的品行不端而导致其文章被人轻视,但是评价其军事理论仅次于《孙子兵法》,肯定了此书为吴起真作,与历来的真伪判断相悖。《吴子》篇的辨伪体现了方孝孺辨伪工作的主观性,不因前人研究结果影响个人判断。

在辨伪工作中,方孝孺从不同维度辨伪,是其卓越洞察力和严谨态度的表现。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方孝孺寻找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同的记载,通过对语言文字符号、作者的生平和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进一步分析文献内容的逻辑性和一致性,从而辨别古书的真伪和讹误。并且,方孝孺不以真伪为评判古籍价值的唯一标准,对真正的伪书不直接批判而是选取有价值的部分给予肯定,对于流传时间久的文献也不盲目相信而是以思想的正统为辨别标准。这种批判性的辨伪立场为研习古籍留下了更多的可能。

## 三、方孝孺古籍辨伪的影响

### (一)方孝孺辨伪思想的前瞻性

方孝孺虽未构建完整的古籍辨伪理论体系,但其辨伪思想中的批判方法和文献考证思路仍然对后世辨伪学产生了启发性影响。其后的学者们不断总结、概括系统的辨伪方法。无论是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梁启超的辨伪“十二条公例”,还是胡适的辨伪五种证据归纳,都与方孝孺的“辨伪三法”具有相似性。这足以证明方孝孺在明初总结的“辨伪三法”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由此可见,方孝孺的辨伪方法不仅在其本人的学术成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辨伪学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不应该被学者们所忽视。

胡应麟的“辨伪八法”中“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sup>[11]</sup>,这四种辨伪方法从语言习惯、后世引用、文体风格、时代风格四个方面进行辨伪,与方孝孺的“辨伪三法”有相通之处。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鉴别史料之方法”中提出了辨伪的十二种方法,其中也

提到通过时代、文体、内容等去辨别古书的真伪<sup>[12]</sup>。胡适总结出的辨伪五种证据归纳中同样提到了用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史实进行辨伪<sup>[13]</sup>。此外,杨绪敏将阎若璩在伪《古文尚书》的考辨中所用之法进行总结,其中“从伪《古文尚书》袭用古书字句上揭示其作伪之迹”<sup>[4]175</sup>、“从史实、典制上证明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之伪”、“从文体、语言风格与时代不符上揭示其伪迹”<sup>[4]176</sup>三个辨伪方法也与方孝孺在辨伪古书时所使用的的方法类似。在众多辨伪学家所归纳的辨伪方法中,从内容上进行辨伪时重要的辨别方法都需要从文辞、风格、史实、制度等方面着手,方孝孺早在明初就总结并实施了清代之后的学者们所归纳的辨伪之法,足以见其辨伪方法的前瞻性。

## (二)方孝孺辨伪学说的后世传播困境

方孝孺的辨伪学成果已经初步系统化,但是为何没有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和发扬?

从客观原因来看,方孝孺的辨伪成果分散。《方孝孺集》中辨伪的部分体量较小,仅仅占据一章中的一部分,可见方孝孺并非有意识地进行辨伪工作,而是在其师宋濂的影响下对几部古书的真伪进行了合理的怀疑。但是,方孝孺在怀疑时提出了具体的辨伪之法并将其总结点明出来,这就使方孝孺的辨伪工作不只是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还深入探究其方法的普遍性。然而,相比于其他辨伪学家有意识地进行辨伪工作,方孝孺的成果被埋没在了其理学论述中,导致后世学者们难以剥离其辨伪核心方法。由于方孝孺并没有针对辨伪而作的具体著作,对古书真伪的辨疑也仅仅只有几篇作品,不足以佐证其辨伪之法的普遍性,因此后世学者在收集前人辨伪成果时很容易遗漏方孝孺所作出的贡献。

从主观方面来看,方孝孺“普遍研习了宋元理学诸家以及其他派别的遗书,玩索文辞,辨难析疑”<sup>[6]1</sup>,在研究经典时发出疑问。在其杂著中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方孝孺对古书的辨疑,但是辨疑和辨伪仍然有区分,方孝孺更多是在辨疑的过程中,生发疑问但并不直接对真伪下定论,只有少数篇章中直叙其为伪书。明代学者对文本的质疑和辨伪往往容易混为一谈,方孝孺对《夏小正》“非经典”的论述就没有涉及文献真伪问题的辨证。因此,后人在整理方孝孺的成果时也很难将几篇辨伪作品从方孝孺的辨疑作品

中提取出来,因此就忽视了方孝孺在辨伪上的成就。

司马朝军称方孝孺“可于去留之处辨真伪,未明言其所以然,想必还是靠味觉。一般人没有灵敏的味觉,万万不可胡来,惟有高明如方孝孺者始可味其辞而断其真伪。辨伪是一门高级艺术,惟得道者始可与言辨伪”<sup>[1]329</sup>。后世学者对方孝孺辨伪成就研究最深的当数司马朝军。对方孝孺的评价颇高。他认为,方孝孺的辨伪成就之所以未得到重视,是因为“惜乎早死,未能大成”<sup>[1]326</sup>。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方孝孺的辨伪成就被忽视的原因是其理论支撑不足并且成果不够系统化。

## (三)方孝孺辨伪方法的现代启示

方孝孺的辨伪方法总结出的规律适用于大多数的古籍辨伪实践,呈现出早期的跨学科性。在对《三坟》《汲冢周书》等书的辨伪中,方孝孺为他的“辨伪三法”构建了多维互证体系。从他的“辨伪三法”出发,“味其辞以望其世之先后”就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语言历时分析纳入辨伪学考辨的过程中;“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出发,暗含历史制度研究的方法;“质诸道以索其旨之浅深”从文本风格来区分,研究书籍文本价值,属于综合分析的范围。这种辨伪方法的总结在明初就打破了文学的范围,进入历史、语言学等领域,形成了跨学科分析。并且,这三种方法并非独立运用,而是多维分析,相互穿插,打破了单一学科的思维路径。从学术脉络上看,方孝孺的辨伪方法属于萌芽状态的跨学科意识,而这或许正是明代考据学能够突破宋代理学空谈的关键过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下仍然是研究重点,从方孝孺的辨伪方法可以看出,跨学科的研究不应止于现下的成果,还可以扩展到古典文献的领域中。方孝孺辨伪方法的现代启示告诉我们,新的研究方向的出现应该从实践到理论,从现有的成果中挖掘理论的可行性,进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典范。

## 四、结语

方孝孺的古籍辨伪成就推动了明代辨伪学的发展,为后世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对明代乃至清代的文献学和史学研究产生了

深远影响。深入考察方孝孺在辨伪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可以明确他在明代辨伪领域的突出成就。他的辨伪思想和研究实践不仅拓展了中国古籍辨伪的理论深度和实践范围,同时也为后来学者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 参考文献:

- [1]司马朝军.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
- [2]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下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863.
- [3]司马朝军.文献辨伪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5.
- [4]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5]宋濂.宋濂全集·诸子辨[M].黄灵庚,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02-1903.
- [6]方孝孺.方孝孺集[M].徐光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7]金紫薇.正学与践履:方孝孺儒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186.
- [8]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86.
- [9]朱熹.朱子全书: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64.
- [10]白寿彝.朱熹辨伪书语[M].北京:朴社,1933.
- [1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22.
-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3-107.
- [1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15.

## An Inquiry into Fang Xiaoru's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Texts

Chen Xin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tellectual guidance of Neo-Confucian masters such as Zhu Xi and Song Lian, Fang Xiaoru not only inherited their rigorous scholarly attitude but also innovated in textual authentication, ultimately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and sophisticated framework for authenticating ancient texts. Through meticulous textual analysis, Fang Xiaoru raised targeted doubts and conducted rigorous evaluations of questionable documents. Grounded in empirical evidence, h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authenticate ancient tex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linguistic features, conceptual evolution, and intellectual lineage. Fang Xiaoru's authentication process began with doubt, embraced methodological rigor, and maintained a cautious attitude. His contributions remain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Fang Xiaoru;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texts; speculative rigor; intellectual lineage

# 《五音集韵》古文中的“以篆为古”例释

邱龙升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五音集韵》是继《广韵》《集韵》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大型韵书,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古文重文。就形源而言,《五音集韵》中的有些古文并非来源《说文》古文,而是出自《说文》篆文和篆文隶定字。文章就《五音集韵》中收录的37例“以篆为古”的“古文”进行释例,为相关字书、韵书的文字整理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五音集韵》;古文;以篆为古;例释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8

## 一、引言

《五音集韵》,全称《改并五音集韵》,是金朝韩道昭编纂的一部大型韵书。该书鸿篇巨制,全书收字共计56 000余个,其中收录标注“古文(含籀文)”的重文多达1 600多例<sup>①</sup>。这些古文重文,以隶定古文为主体,偶见极少数未经隶定或者隶定不完全的篆体古文。《五音集韵》古文来源多元,除了多数来自《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等篆体古文隶定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古文由《说文》篆文隶定或转录而来,是《说文》篆文的隶定字。对于中古字韵书中这种将《说文》篆文视为古文的现

象,我们称之为“以篆为古”。学界对传抄古文中的“以篆为古”多有关注。例如徐在国(2002)将隶定古文的来源归纳为九类,其中包括来源《说文》篆文类<sup>[1]</sup><sup>3</sup>。白俊骞(2012)认为《康熙字典》中有许多古文是直接隶定《说文》小篆字形,并列举了若干字例<sup>[2]</sup>。王丹(2015)、李春桃(2021)均指出《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中有些形体与小篆相同,是直接承袭《说文》小篆而来<sup>[3-4]</sup>。笔者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

韩道昭《五音集韵》收录的古文进行全面梳理,择取了韵书中较为罕见且尚未整理的37例“以篆为古”的“古文”进行疏证,希望对整理字书和韵书文字有所裨益。

## 二、“以篆为古”例释

### 1. 葱—蔥

《五音集韵·东韵》:“葱、蔥,葷菜,古作蔥、蔥,同上。”(3b)<sup>②</sup>

按:“葱”古文作“蔥”,字形不见《玉篇》。《集韵·东韵》:“葱、蔥,《说文》:‘菜也。’古作蔥。”<sup>③</sup>始将“蔥”录为“葱”古文。《类篇·艸部》亦录“葱”

<sup>①</sup> 韩道昭著、甯忌浮校订的《校订五音集韵》共计收录单字56 598个,其中成化本实有单字56 556个。据笔者初步统计,《五音集韵》共收录1 095个韵字头下所属的古文(含籀文)重文1 683个。参见韩道昭著,甯忌浮校订:《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sup>②</sup> 本文以韩道昭著、甯忌浮校订的《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1992年版)为底本。文中所选取的古文字形均为扫描剪切的原字形图片。引文后的括号内文字是标明在《校订五音集韵》中的详细出处,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a”“b”分别指上栏、下栏,下同。

<sup>③</sup> 丁度,等:《宋刻集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收稿日期:2025-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宋金韵书古文研究”(19XYY017)

作者简介:邱龙升(1977—),男,江西南丰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古文作“蔥”<sup>①</sup>。《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蔥”“蔥”形体微异,属一字异体,均为“葱”《说文》篆文“蔥”的隶定字。类似的还有《五音集韵》古文“息(忽)”(3b)、“聰(聰)”(3b)等,分别是《说文》篆文“息(忽)”“聰(聰)”的隶定字。

## 2. 葵—藜

《五音集韵·脂韵》:“葵,渠规切,《说文》曰:‘菜也。’藜,古文。”(9b)

按:“葵”古文作“藜”,字形不见《玉篇》。《集韵·脂韵》:“藜、葵,聚惟切,《说文》:‘菜也。’隶作葵。”这里将《说文》篆文“藜”<sup>②</sup>列为字头,将隶变字“葵”录为重文。古文“藜”依据《集韵》字头转录,是“葵”《说文》篆文“藜”的半隶定字形,隶定了上方的“艸”部,下半“葵”仍为篆体。《重订直音篇·艸部》录有“葵”古文“藜”<sup>③</sup>,就是一个隶定完全的篆文隶定字。

## 3. 之一—屮

《五音集韵·脂韵》:“之,适也,往也。屮,古文。”(13b)

按:《玉篇·之部》:“之,止貽切,是也,至也。屮,古文。”<sup>④</sup>“屮”即“之”《说文》篆文“屮”的隶定字。《集韵·之韵》:“屮、之、屮,真而切,《说文》:‘出也。’隶作之,古作屮。”这里将“之”的隶定篆文“屮”列为字头,而将未经隶定的篆文“屮”定为古文,比较特别。《类篇·之部》亦录“之”古文作“屮”。《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屮”未作隶定,与“之”的篆文“屮”完全同形,来源于“之”甲骨文作“屮”“屮”等形(古2)<sup>⑤</sup>的演变。

## 4. 差—𡗗

《五音集韵·脂韵》:“差,楚宜切,次也,不齐等也。𡗗,古文。”(14a)

按:《玉篇·左部》“差”或体作“𡗗”。《集韵·支韵》:“差、𡗗,又宜切,参差不齐也。古作𡗗。”始将“𡗗”录为“差”古文。《类篇·左部》亦录“差”古文作“𡗗”。《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𡗗”即“差”《说文》篆文“𡗗”的隶定字,来源于“差”金文作“𡗗”(国差簠)、“𡗗”(不易戈)等形(金311)<sup>⑥</sup>的演变。

## 5. 为(爲)—𧈧

《五音集韵·脂韵》:“为,《尔雅》云:‘作造为也。’《说文》曰:‘母猴也。’𧈧,古文。”(15b)

按:“为”古文作“𧈧”,字形不见《玉篇》。《五音集韵》始录“为”古文作“𧈧”。《四声篇海·爪部》

亦录“为”古文作“𧈧”<sup>⑦</sup>,与“𧈧”形体微殊,属一字异体。“𧈧”未作隶定,即“为”《说文》篆文“𧈧”的省写讹变字形,更加突出了猴的眼睛、脸部等象形,来源于“为”金文作“𧈧”(曾伯随壶)、“𧈧”(中山王壶)等形(古69)的演变。

## 6. 鱼—𩺰

《五音集韵·鱼韵》:“鱼,语居切,《说文》曰:‘水虫也。’𩺰,古文。”(20b)

按:“鱼”古文作“𩺰”,字形不见《玉篇》。《五经文字·鱼部》:“鱼,象鱼尾形,《说文》作𩺰。”<sup>⑧</sup>《集韵·鱼韵》:“鱼、𩺰,牛居切,《说文》:‘水虫也。’古作𩺰。”始将“𩺰”录为“鱼”古文。《五音集韵》古文转录之,且形体微异。“𩺰”“𩺰”笔画微异,均为“鱼”《说文》篆文“𩺰”的隶定字,来源于“鱼”金文作“𩺰”(毛公鼎)、“𩺰”(番生簠),战国盟书作“𩺰”等形(古214)的演变。

## 7. 书(書)—𠄎

《五音集韵·鱼韵》:“书,伤鱼切,《世本》曰:‘沮诵仓颉作书。’𠄎,古文。”(21b)

按:《玉篇·书部》:“书,式余切,𠄎,《说文》书。”《集韵·鱼韵》:“书、𠄎,商居切,《说文》:‘箸也。’或作𠄎。”《类篇·聿部》亦录“书”或体作“𠄎”。《五音集韵》“𠄎”据《玉篇》篆文转录,且认定为“古文”。“𠄎”即“书”《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字,来源于“书”金文作“𠄎”“𠄎”(颂鼎)等形(金202)的演变。

## 8. 春—𡗗、𡗗

《五音集韵·淳韵》:“春,昌脣切,四时之首。𡗗、𡗗,并古文。”(38a)

按:《玉篇·日部》:“春,尺均切,四时之首也,𡗗,《说文》同上。”《集韵·淳韵》:“𡗗、𡗗、春,枢伦切,《说文》:‘推也。’古作𡗗,隶作春。”这里

① 司马光,等:《类篇》,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许慎:《说文解字》(大徐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章黼著,吴道长重订:《重订直音篇》(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张氏泽存堂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⑤ “古”是《古文字类篇》(高明,大通书局1986年版)的简称,阿拉伯数字表示该书的页码,下同。

⑥ “金”是《金文编》(容庚,中华书局1985年版)的简称,阿拉伯数字表示该书的页码,下同。

⑦ 韩道昭:《四声篇海》(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⑧ 张参:《五经文字》(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将“春”的隶定篆文“𦰩”列为字头,将隶变字“春”录为重文。《五音集韵》“𦰩”据《玉篇》篆文转录,且认定为“古文”。“𦰩”即“春”《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春”蔡侯申残钟作“𦰩”(金39)、包山楚简作“𦰩”(战39)<sup>①</sup>等形的演变。古文“𦰩”与《集韵》古文“𦰩”形同,当据其转录,但构形不明,很可能就是由“𦰩”传写讹变而来。

### 9. 啍—𦰩

《五音集韵·啍韵》:“啍,口气。𦰩,古文。”(40b)

按:“啍”古文作“𦰩”,字形不见《玉篇》。《集韵·魂韵》:“𦰩、啍,《说文》:‘口气也。’隶作啍。”这里将“啍”的隶定篆文“𦰩”列为字头,将隶变字“啍”录为重文。《五音集韵》“𦰩”据《集韵》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字汇·口部》亦转录此古文<sup>②</sup>。“𦰩”即“啍”《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

### 10. 迁(遷)—𦰩

《五音集韵·仙韵》:“迁,去下之高也。𦰩,古文。”(50a)

按:“迁”古文作“𦰩”,字形不见《玉篇》。《广韵·仙韵》:“迁,去下之高也。𦰩,古文。”《集韵·仙韵》:“𦰩、迁,亲然切,《说文》:‘登也。’隶作迁。”这里将“迁”的隶定篆文“𦰩”列为字头,将隶变字“迁”录为重文。《类篇·辵部》亦录“𦰩”为字头。《五音集韵》古文据《广韵》古文转录,而字形取《集韵》作“𦰩”。“𦰩”“𦰩”形体微异,均为“迁”《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前者是严格的笔画对应隶定,后者为部件对应隶定,来源于“迁”战国文字作“𦰩”“𦰩”等形(战96)的演变。

### 11. 和—𦰩

《五音集韵·戈韵》:“和,户戈切,《尔雅》云:‘笙之小者谓之和。’𦰩,古文。”(61a)

按:《玉篇·口部》:“和,胡戈切,可也。𦰩,古文。”《龙龕手鏡·口部》则录“和”或体作“𦰩”<sup>③</sup>。《广韵·戈韵》<sup>④</sup>《集韵·戈韵》均转录《玉篇》古文作“𦰩”。《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𦰩”即“和”《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和”𦰩壶作“𦰩”(金64),战国文字作“𦰩”(战国印)、“𦰩”(楚简)等形(战68)的演变。

### 12. 华(華)—𦰩

《五音集韵·麻韵》:“华,户花切,草盛也,色也。𦰩,古文。”(63b)

按:《玉篇·华部》:“华,胡瓜切,荣也。𦰩,《说文》华。”《集韵·麻韵》:“华、𦰩,胡瓜切,《说文》:

‘荣也。’古作𦰩。”始将“𦰩”录为“华”古文。《五音集韵》古文转录作“𦰩”。“𦰩”“𦰩”“𦰩”笔画微异,均为“华”《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华”克鼎作“𦰩”(金422),战国文字作“𦰩”“𦰩”(战国印)等形(战391)的演变。

### 13. 平—𦰩

《五音集韵·清韵》:“平,符兵切,正也,和也,易也。𦰩,古文。”(72b)

按:《玉篇·亏部》:“𦰩,皮并切,成也,正也。平,同上今文。”这里将“平”的隶定篆文“𦰩”列为字头,将隶变字“平”录为重文。《集韵》《类篇》均不录此形。《五音集韵》“𦰩”据《玉篇》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𦰩”“𦰩”笔画微异,属一字异体,即“平”《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平”古文文字作“𦰩(郟公鼎)”、“𦰩(石鼓文)”等形(古365)的演变。

### 14. 陵—𦰩

《五音集韵·蒸韵》:“陵,力膺切,大阜曰陵。”(76b)

按:“陵”古文作“𦰩”,字形不见《玉篇》。《集韵·蒸韵》:“陵、𦰩,《说文》:‘大阜。’古作𦰩。”始将“𦰩”录为“陵”古文。《类篇·阜部》亦录“陵”古文作“𦰩”。《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𦰩”即“陵”《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陵”金文作“𦰩”(陈猷釜)、“𦰩”(长陵盃)等形(古453)的演变。

### 15. 恒—𦰩、𦰩

《五音集韵·登韵》:“恒、𦰩,胡登切,常也,久也。𦰩、𦰩,并古文同上。”(77b)

按:《玉篇·二部》:“恒,何登切,常也。𦰩,同上。”《集韵·登韵》:“恒、𦰩,胡登切,国讳。《说文》:‘常也。’古作𦰩。”始将“𦰩”录为“恒”古文。《类篇·二部》亦录“恒”古文作“𦰩”。《五音集韵》古文“𦰩”据《集韵》古文转录,且将“舟”讹作“月”,古文“𦰩”则由“𦰩”进一步书写讹变。“𦰩”即“恒”《说文》篆文“𦰩”的隶定字,来源于“恒”恒簋作“𦰩”“𦰩”(金881),战国文字作“𦰩”(战国

① “战”是《战国文字编》(汤余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的简称,阿拉伯数字表示该书的页码,下同。

② 梅膺祚:《字汇》(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释行均:《龙龕手鏡》(高丽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陈彭年,等:《宋本广韵》(张氏泽存堂本),中国书店1982年版。

印)、“𠄎”(云梦秦简)等形(战876)的形体变异,将古文字的“月”部讹成“舟”。

#### 16. 蠹—爾

《五音集韵·尤韵》:“蠹,《说文》曰:‘蠹,虫食艸根者。’爾,古文同上。”(79b)

按:“蠹”古文作“爾”,字形不见《玉篇》。《集韵·侯韵》:“蠹、爾,《说文》:‘虫食艸根者。’古作爾。”始将“爾”录为“蠹”古文。《类篇·虫部》亦录“蠹”古文作“爾”。《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徐在国(2002)疑“爾”之“爾”为“矛”部讹变,可从<sup>[1]273</sup>。准确地说,“爾”即“蠹”《说文》篆文“蠹”的隶定讹体,将上方的“矛”隶定作“爾”,形体微讹。

#### 17. 欽—欽

《五音集韵·侵韵》:“欽,去金切,敬也。欽,古文。”(84a)

按:“欽”古文作“欽”,字形不见《玉篇》。《集韵·侵韵》:“欽、欽,祛音切,《说文》:‘欠也。’古作欽。”始将“欽”录为“欽”古文。《类篇·欠部》亦录“欽”古文作“欽”。《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且形体微异。“欽”即“欽”《说文》篆文“欽”的隶定字,来源于“欽”包山楚简作“𠄎”“𠄎”等形(战597)的演变。

#### 18. 癸—癸

《五音集韵·脂韵》:“癸,居谏切,辰名。癸,古文。”(93b)

按:《玉篇·癸部》:“癸,古揆切,太岁在癸曰朝阳。癸,古文。”《集韵·旨韵》亦录“癸”古文作“癸”。《五音集韵》亦转录此古文,且还保留着圆弧线条。“癸”未作隶定,与“癸”《说文》篆文“癸”完全同形,来源于“癸”甲骨文作“𠄎”“𠄎”(甲555)<sup>①</sup>,金文作“癸”(此簋)、“癸”(都公鼎)等形(金980-981)的演变。

#### 19. 举(舉)—舉

《五音集韵·语韵》:“举,居许切,擎也,又立也。舉,古文。”(99b)

按:《玉篇·手部》:“舉,居与切,《说文》曰:‘对举也。’今作举。”这里将“举”的隶定篆文“舉”列为字头,将隶变字“举”录为重文。《集韵·语韵》《类篇·手部》同。《五音集韵》“舉”据《玉篇》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舉”即“举”《说文》篆文“舉”的隶定字,来源于“举”战国文字作“𠄎”(战国印)、“𠄎”(云梦秦简)等形(战794)的演变。

#### 20. 旅—旅

《五音集韵·语韵》:“旅,古文旅。众也。”(100b)

按:《玉篇·旅部》:“旅,力与切,众也。旅,古文。”《五音集韵》古文转录此形。《四声篇海·旅部》亦录“旅”古文作“旅”。“旅”即“旅”《说文》篆文“旅”的隶定字,来源于“旅”甲骨文作“𠄎”,金文作“𠄎”(免簋)、“𠄎”(攸从鼎)等形(古368)的演变。

#### 21. 鄆—鄆

《五音集韵·语韵》:“鄆,地名也,出《史记》。鄆,古文。”(100b)

按:“鄆”古文作“鄆”,字形未见《玉篇》。《龙龕手镜·邑部》:“鄆,正;鄆,今。音许,地名。”这里将“鄆”录作正字,也就是“鄆”的隶定篆文。《集韵·语韵》《类篇·邑部》均录“鄆”或体作“鄆”。《五音集韵》亦转录此形,且认定为“古文”。“鄆”即“鄆”《说文》篆文“鄆”的隶定字,来源于“鄆”金文作“鄆”(鄆子匡)、“鄆”(蔡太师鼎)等形(古445)的演变。

#### 22. 乃—弓

《五音集韵·海韵》:“乃,奴亥切,语辞也。弓,古文。”(106b)

按:《玉篇·乃部》:“乃,奴改切,大也,往也。弓,古文。”《集韵·海韵》:“弓,乃,曩亥切,《说文》:‘曳词之难也。’或作乃。”《类篇·弓部》:“弓,曳词之难也。隶作乃。”《五音集韵》“弓”据《玉篇》古文转录,而字形与《集韵》字头同。“弓”“弓”形体微异,均为“乃”《说文》篆文“弓”的隶定字,来源于“乃”甲骨文作“弓”“弓”,金文作“弓”(孟鼎)、“弓”(鬲鼎)等形(古370)的演变。

#### 23. 萁—萁

《五音集韵·隐韵》:“萁,菜也。《说文》作萁。萁,古文。”(110a)

按:“萁”古文作“萁”,字形不见《玉篇》。《广韵·隐韵》:“萁,菜也。《说文》作萁,黏土也。”《集韵·隐韵》:“萁、萁,菜也。古作萁。”始录“萁”古文作“萁”。《五音集韵》“萁”据《集韵》古文转录,且形体微讹。“萁”“萁”“萁”笔画微异,均为“萁”《说文》篆文“萁”的隶定字,来源于“萁”金文作“萁”(萁伯簋)、“萁”(启卣)等形(金888)的演变。

#### 24. 保—保

<sup>①</sup> “甲”是《甲骨文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简称,阿拉伯数字表示该书的页码,下同。

《五音集韵·皓韵》：“保，任也，安也，守也。《说文》作保。保，古文。”(120b)

按：《玉篇·人部》：“保，补道切，《书》曰：‘明徵定保。’保，安也。保，《说文》保字。”《集韵·皓韵》《类篇·人部》均以“保”为字头，将隶变字“保”录为或体。《五音集韵》据《集韵》或体转录，且认定为“古文”。“保”“保”形体微异，均为“保”《说文》篆文“保”的隶定字，且形体微讹，将右上“口”形变作“𠂔(口)”，来源于“保”战国文字作“𠂔”（陈侯因脊敦）、“𠂔”（包山楚简）等形（战549）的演变。

### 25. 丈—支

《五音集韵·养韵》：“丈，直两切，《说苑》曰：‘十尺为丈。’支，古文。”(125a)

按：“丈”古文作“支”，字形不见《玉篇》。《集韵·养韵》：“支、丈，雉两切，《说文》：‘十尺也。’隶作丈。”这里将“丈”的隶定篆文“支”列为字头，将隶变字“丈”录为重文。《五音集韵》“支”据《集韵》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支”即“丈”《说文》篆文“支”的隶定字，来源于“丈”郭店楚简作“支”、云梦秦简作“支”（仗旁）等形（战132、567）的演变。

### 26. 哽—哽

《五音集韵·养韵》：“哽，哽咽。哽，古文。”(127a)

按：“哽”古文作“哽”，字形不见《玉篇》。《龙龕手镜·口部》：“哽，今；哽，正。”这里将“哽”录作正字，也就是“哽”的隶定篆文。《五音集韵》“哽”据《龙龕手镜》正字转录，且认定为“古文”。《正字通·口部》：“哽，哽本字。”<sup>①</sup>《正字通》以隶定篆文为字头，是继承了小篆正统。“哽”从口哽（更）声，即“哽”《说文》篆文“哽”的隶定字。

### 27. 省—省

《五音集韵·梗韵》：“省，所景切，省署。省，古文。”(127b)

按：“省”古文作“省”，字形不见《玉篇》。《集韵·梗韵》：“省、省，所景切，《说文》：‘视也。’隶作省。”这里将隶定篆文“省”列为字头，将隶变字“省”录为重文。《类篇·省部》亦录“省”字头作“省”。《五音集韵》“省”据《集韵》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省”“省”形体微异，均为“省”《说文》篆文“省”的隶定字，且形体微讹，来源于“省”甲骨文作“省”，金文作“省”（晋鼎）、“省”（散盘），石鼓文作“省”等形（古132）的演变。

### 28. 口—口

《五音集韵·厚韵》：“口，古文口字。”(131b)

按：《玉篇·口部》：“口，苦苟切，《说文》云：‘人所以言食也。’口，《声类》古文口字。”《集韵》《类篇》均不录此形。《五音集韵》古文“口”据《玉篇》古文转录，且保留了圆弧线条。“口”即“口”《说文》篆文“口”的隶定字，“口”未作隶定，与“口”的篆文“口”完全同形，来源于“口”甲骨文作“口”“口”，战国文字作“口”（陶文）、“口”（古玺）等形（古119）的演变。

### 29. 厚—厚

《五音集韵·厚韵》：“厚，胡口切，厚薄，又重也。厚，古文。”(132b)

按：《玉篇·厂部》：“厚，胡苟切，不薄也，重也。厚，同上。”《集韵·厚韵》：“厚、厚，狠口切，《说文》：‘丘陵之厚也。’隶作厚。”这里将“厚”的隶定篆文列为字头，将隶变字“厚”录为重文。《类篇·厚部》亦录“厚”字头作“厚”。《五音集韵》“厚”据《集韵》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厚”“厚”形体微异，均为“厚”《说文》篆文“厚”的隶定字，来源于“厚”金文作“厚”（鲁伯盘）、“厚”（井人钟）等形（古401）的演变。

### 30. 共—共

《五音集韵·用韵》：“共，渠用切，同也，皆也。共，古文。”(138a)

按：“共”古文作“共”，字形不见《玉篇》。《五音集韵》始录“共”古文作“共”。《四声篇海·共部》亦录“共”古文作“共”。又《重订直音篇·共部》录“共”或体作“共”，应由“共”传写讹变。“共”即“共”《说文》篆文“共”的隶定讹体，将上方“共”讹作“艸”，来源于“共”金文作“共”（禽肯匚）、战国印文作“共”等形（古84）的演变。

### 31. 至—至

《五音集韵·至韵》：“至，到也。至，古文。”(142b)

按：“至”古文作“至”，字形不见《玉篇》。《五音集韵》始录“至”古文作“至”。其他字书和韵书均不录。“至”即“至”《说文》篆文“至”的隶定字，来源于“至”甲骨文作“至”“至”，金文作“至”（散盘）等形（古419）的演变。《隶辨》卷六“偏旁”下云《郭辅碑》“至于武王”的“至”作“至”<sup>②</sup>，与

① 张自烈：《正字通》，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顾藹吉：《隶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

“𠄎”同形,可见汉碑隶书已经出现“至”的篆文隶定字。

### 32. 屈—𠄎

《五音集韵·物韵》:“屈,区勿切,拗曲,亦姓。𠄎,古文。”(201a)

按:“屈”古文作“𠄎”,字形不见《玉篇》。《集韵·迄韵》:“屈、𠄎,曲勿切,曲也。古作𠄎。”又“屈、屈,《说文》:‘无尾也。’隶省。”《五音集韵》古文据《集韵》转录,异写作“𠄎”。“𠄎”“屈”“𠄎”形体微异,属一字异体,均为“屈”《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讹变字形,来源于“屈”战国文字作“𠄎”(楚屈吊沱戈)、“𠄎”(秦陶文)、“𠄎”(包山楚简)等形(战589)的演变。

### 33. 辘—𠄎

《五音集韵·薛韵》:“辘,陟劣切,止也。𠄎,古文。”(210b)

按:“辘”古文作“𠄎”,字形不见《玉篇》。《集韵·薛韵》:“辘、𠄎,《说文》:‘车小缺复合者。’古作𠄎。”始将“𠄎”录为“辘”古文。《类篇·车部》亦录“辘”古文作“𠄎”。《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𠄎”即“辘”《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讹变字形,将左边的“车”中移,同时“辘”还保留了圆弧线条,变成一个半篆半隶的半隶定字,比较特别。

### 34. 折—𠄎

《五音集韵·薛韵》:“折,拗折,又虜。𠄎,古文。”(212b)

按:《玉篇·艸部》:“折,之烈切。今作折。”《集韵·薛韵》:“折、𠄎,断也,或作𠄎。”《五音集韵》“折”据《玉篇》字头转录,且认定为“古文”。“折”即“折”《说文》篆文“折”的隶定字,来源于“折”甲骨文作“𠄎”“𠄎”(甲22),金文作“𠄎”(孟鼎)、“折”(兮甲盘)等形(金38)的演变。

### 35. 绰—𠄎

《五音集韵·药韵》:“绰,昌约切,宽也。𠄎,古文。”(214b)

按:《玉篇·素部》:“𠄎,尺约切,缓也。今作绰。”《龙龕手鏡·卓部》:“𠄎,古;绰,正。昌约反,宽也。”始将“𠄎”录为“绰”古文。《广韵·药韵》亦录“绰”古文作“𠄎”。《五音集韵》古文亦转录之。“𠄎”即“绰”《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字,来源于“绰”金文作“𠄎”(蔡姑簋)形(金872)的演变。

### 36. 急—𠄎

《五音集韵·缉韵》:“急,居立切,急疾也。《说文》作𠄎。𠄎,古文。”(227a)

按:《玉篇·心部》:“急,居立切,迫切也。𠄎,《说文》急。”《集韵·缉韵》:“𠄎、急,讫立切,《说文》:‘福也。’隶作急。”《类篇·心部》亦录“急”字头作“𠄎”。这里将“急”的隶定篆文“𠄎”列为字头,将隶变字“急”录为重文。《五音集韵》据《玉篇》篆文转录,且认定为“古文”。“𠄎”从心,及声,即“急”《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字,来源于“急”云梦秦简作“𠄎”形(战708)的演变。

### 37. 晔(晔)—𠄎

《五音集韵·缉韵》:“晔,立也,又为立切。𠄎,古文。”(232b)

按:“晔”古文作“𠄎”,字形未见《玉篇》。《龙龕手鏡·日部》:“𠄎,俗;晔,正。为辄反,晔晔,白光,盛兒也。”《五音集韵》始录“晔”古文作“𠄎”,不见其他的字韵书。“𠄎”“𠄎”形体微异,属一字异体,均为“晔”《说文》篆文“𠄎”的隶定字形,且后一例形体微讹。

## 三、结语

《五音集韵》“以篆为古”的“篆”主要有五种情形。1. 古文来源于《说文》篆文的隶定字,这是“以篆为古”的主体,如“𠄎(葱)”“𠄎(和)”“𠄎(哽)”等。2. 古文来源于《说文》篆文的隶定讹体,就是在隶定篆文时形体有细微讹变,如“𠄎(蝨)”“𠄎(共)”等。3. 古文来源于《说文》篆文的半隶定字,就是篆文隶定不完全,字形还残留了圆弧线条,如“𠄎(葵)”“𠄎(辘)”等。4. 古文直接转录于《说文》篆文,未作隶定,如“𠄎(之)”“𠄎(癸)”“𠄎(口)”等。5. 古文来源于《说文》篆文讹体,就是在传写小篆时形体发生讹变,仅见“𠄎(为)”。虽然这些古文不是隶定《说文》古文,但是由于它们来源于小篆,也是汉代隶变之前的古文字,所以这类古文绝大多数可以在先秦古文字中找到形体来源,能在战国文字、金文,甚至甲骨文中找到与之形体相同或相近的同构字形。

从字书文字传承来看,《五音集韵》古文主要有四种来源:一是承袭《玉篇》古文,如“𠄎(和)”“𠄎(旅)”等。二是承袭《玉篇》字头和重文,如“𠄎(平)”“𠄎(华)”等。三是承袭《龙龕手鏡》正字、《集韵》古文和字头,如“𠄎(𠄎)”转录《龙龕手鏡》正字,“𠄎(葱)”“𠄎(蝨)”转录(下转第61页)

# 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态势

陈振艳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态势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三应用”,即以现代汉语词汇学为主体,以现代汉语语法学和辞书学为助推,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母语词汇教学为着陆点。相应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分为主体研究、接口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子领域。主体研究的基本特征包括研究维度向深化和精细化发展,研究对象兼顾词汇本体和释义元语言,研究方法兼顾归纳和演绎。接口研究的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研究生态转向多层面/界面的互动研究,研究平面注重打通不同界面之间的联系,研究视野向类型学拓展,研究驱动力向基于描写的解释转变,以及对汉语重大事实及其理论蕴含进行重新审视和多重发掘。应用研究的现状主要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母语词汇教学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与思考。

**关键词:**21世纪;词汇研究;主体研究;接口研究;应用研究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09

## 一、前言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出版,汉语研究进入语言学时代。1956年孙常叙《汉语词汇》和1959年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创立。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创立和发展与语言学的两个分支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现代汉语语法学和辞书学。汉语语法学界在对诸如词的观念的确立、词的确定、词类的划分等词作为语法单位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学创立的基础,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词汇—语法问题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学和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交集,因此词汇—语法的接口研究非常丰富,成果卓著。此

外,现代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互动最为密切,很多研究成果都被吸收进了语文辞书中,而语文辞书在编纂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又为现代汉语词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现代汉语词汇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现代汉语词汇学为主体,以现代汉语语法学和辞书学为助推,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母语词汇教学为着陆点的“一体两翼三应用”的发展态势。相应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分为主体研究、接口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子领域。对此,学界已经从宏观层面对现代汉语词汇主体研究的面貌作出了全局性的观照,如杜翔等<sup>[1]</sup>。我们认为,在主体研究渐趋丰富、接口研究日益活跃、应用研究迎来发展新机遇的今天,对21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作出阶段性的整理和思考确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总结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概括21世纪现代汉

收稿日期:2025-0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20&ZD297);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构式语法视域下网络文章标题语篇化的特征与机制研究”(2025-ZZJH-392)

作者简介:陈振艳(1979—),女,河南睢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学。

语词汇研究的特点,思考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未来的走向,从主体研究、接口研究、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对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态势作出宏观的总结与思考。

## 二、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 主体研究的基本特征

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主体研究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研究维度的深化与精细化,研究对象的广化和研究方法的变迁。在主体研究中,现代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互动贯穿其中,很多成果都是在与辞书学的互动中取得和体现的。

### (一)研究维度的深化与精细化

研究维度的深化与细化主要体现在词的意义与结构研究的深化、一般词汇研究的深化以及词汇系统研究的精细化等方面。

1. 词的意义与结构研究的深化。在词义研究方面,学界在同义词和反义词词典的编纂以及别义词、同形同音词和多义词的认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深化了对词义类型和词义关系的相关认识。21世纪以来,出现了同义词、反义词以及根据语义关系分类的词典编纂的代表性成果,如《新华同义词词典》《反义词大词典》《新华反义词词典》《现代汉语分类词典》。此外,学界还提出了“别义词”的概念<sup>[2]</sup>,在词源和现时感觉区分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义素分析法、词源考索法、引申义列梳理法、相关比较法等4种区分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方法<sup>[3]</sup>。

在词的结构研究方面,《汉语词汇结构论》对《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词汇单位(字、词、固定短语等)的结构和构成的特点与规律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与分析。

2. 一般词汇研究的深化。21世纪一般词汇研究的深化主要体现在熟语、新词新语、外来词、字母词等研究方面。

在熟语研究方面,学界在熟语的分类以及成语的用变与演变等问题上取得了深化性的认识。在熟语分类问题上,《汉语语汇学》提出用“语汇”这一名称来代替“熟语”,《新华语典》是体现语汇学观点的实践之作。周荐则把熟语分为“雅言”和“俗语”两类,初次有了带有语体意识的区分<sup>[4]</sup>。在成语问题上,施春宏基于成语使用的变化,提出演

变是用变的积淀和特殊表现,交际值原则才是判断语言规范的根本标准<sup>[5]</sup>。

在新词新语研究方面,出现了新词语词典编纂的新成果,即《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网络用语是新词语的一个重要来源,学界对其性质、影响、意义等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吕明臣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语体——网络语体<sup>[6]</sup>;施春宏认为应该从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两个方面来认识网络语言的交际性质和学术意义<sup>[7]</sup>;李宇明认为网络语言将随网络原住民的扩大而遍及全体社会并影响现实语言<sup>[8]</sup>。

在外来词研究方面,史有为从文化的角度对外来词进行了探讨<sup>[9]</sup>,《新华外来词词典》则是外来词研究在辞书领域的实践之作。施春宏基于对外来词“野尻”使用的语文评议,提出语文评议必须坚持具体的历史的原则,以现实同一性为前提和基础<sup>[10]</sup>。

在字母词研究方面,有学者针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239个字母词一事提出要打“汉字保卫战”。对此,江蓝生认为“中西合璧式字母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类”<sup>[11]</sup>。刘丹青指出词典的功能是描写、记录和规范,提出不要滥用字母词<sup>[12]</sup>。邹玉华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说明了《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的合法性<sup>[13]</sup>。这些文章从词汇学、辞书学、法学的角度深化了人们对于字母词以及语言文字相关规范问题的认识。字母词相关研究成果有《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和《字母词使用六十年》。

3. 词汇系统研究的精细化。词汇系统研究的精细化,一方面体现为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带来的研究精细化,另一方面体现为词群研究带来的研究精细化。蒋绍愚提出用“两次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词汇系统<sup>[14]</sup>。基于此,蒋绍愚提出概念场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并对“投”的词义和“打击”义动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sup>[15-16]</sup>,为我们提供了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词汇系统对比研究的精细化范例。

词群研究主要体现在颜色词研究方面,如刘丹青对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进行了研究<sup>[17]</sup>,《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和《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两本专著展示了现代汉语颜色词的全貌。

### (二)研究对象的广化

研究对象的广化主要表现为学界不仅关注词

汇本体,而且开始关注意元语言。“元语言”最早由哲学界提出,在语言学界“元语言”指语法书、语言学教科书、词典等的“正文”。《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和《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释义元语言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的真实面貌。《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是对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和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对汉语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直接参考作用。

### (三)研究方法的变迁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归纳法注重证实,演绎法注重证伪。语言学研究“假设—演绎—检验法”追求的目标是对语言现象做出预测性的解释。随着语法学研究驱动力(从描写走向解释)和研究方法(从归纳走向演绎)的逐渐转向,词汇学界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归纳走向演绎,研究方向从概括走向模型的构建和预测。《词汇语义学》构建了义位的微观结构模式,为汉语词义系统的多角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使用的分析模型。施春宏提出了词义衍化过程假设,并根据该假设推测出哪些词容易生成比喻义和可有比喻用法<sup>[18]</sup>。假设的部分内容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得到验证,而没有得到验证的部分也都可以找到成为例外的条件。

总之,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主体研究在研究维度的深化与精细化、研究对象的广化、研究方法的变迁等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发展趋向,近年来学界还引入理论拓展研究视角,如袁毓林先生及其团队引入巴赫金的多声性理论在汉语语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sup>[19-20]</sup>,不过总体来看视角的拓展还较为有限。

## 三、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 接口研究的基本态势

现代汉语词汇接口研究主要指词汇学与语法学的接口研究。词汇学与语法学的密切联系根源于词汇在语法系统中如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词汇是语法系统的研究对象之一,语法研究不能不研究词汇的语法功能,而要将词研究透彻也不能抛开语法功能,尤其是虚词研究。另一方面,词法研究词汇的结构化规则,词汇学研究词汇语义,但有时两者并非截然分明,而是有着广袤的

中间地带。如由类词缀构成的词模(如“X家”“X员”“X热”“X化”等)既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带有规则性的一面;又没有完全虚化,具有一定的意义。词的这种跨领域、跨部门特征自然就使得词汇—语法接口研究成为词汇学和语法学共同关注的子领域。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接口研究的基本态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生态的转变、研究平面的多重化、研究视野的类型学拓展、研究驱动力的转变,以及对具体语言现象的重新审视和理论蕴含的多重发掘。

### (一)研究生态的转变

词汇研究生态指的是词汇研究在当前科学研究中所处的环境。这里主要指词汇研究与以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如语素、词、短语、句子、篇章)和不同的语言部门(如音法、词法、句法、韵律、语体)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内部其他研究之间的关系。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接口研究在研究生态上呈现出从单一层面/界面的静态研究转向多层面/界面的互动研究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词汇与语法的互动,词汇、语法与篇章的互动,词汇、语法与韵律的互动,词汇、语法与语体的互动。

需要说明的是,“语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语法”指词法和句法。广义“语法”指“大语法”,不仅包括传统的词法和句法,而且涵盖语言系统内部各层面(语素、词、短语、句子、篇章)、各部门(语音、语法、语义、语用、韵律、语体、修辞)内部诸要素之法,音法、词法、句法、章法、义法、用法、韵律、语体、修辞等都是语法。本文的“语法”,浑言之指“大语法”,析言之指“小语法”。

词汇与语法的互动,主要体现在运用配价理论和生成词库论的研究上。汉语语法学者在“动词决定论”“功能中心论”“投射原则”下的汉语研究。如袁毓林对现代汉语名词配价和动词配价的研究<sup>[21-22]</sup>,宋作艳基于轻动词理论和生成词库论对事件强迫的研究<sup>[23]</sup>,袁毓林对汉语名词物性角色以及动词、形容词论元角色的研究<sup>[24-25]</sup>,都在词项和语法结构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实现了词汇与语法的互动。

词汇、语法与篇章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篇章语法对于虚词篇章功能和话语功能的研究上。篇章语法基于篇章标记和语法范畴,分析跨句语篇的语法现象,研究不同语法范畴和语法手段的语篇地位和功能,以及交际互动因素对语言表达的

塑造作用,是“篇章”与“语法”的结合。因此,虚词就是篇章语法研究的一个理想抓手。如张谊生指出“就是”具有六种语篇衔接功能<sup>[26]</sup>;李胜梅分析了句首“正是”的篇章功能及其产生机制<sup>[27]</sup>;方梅指出“说是”具有传信标记、模棱语和态度标记三种元语言功能<sup>[28]</sup>;李冬梅、施春宏对“说是”的多重话语功能及其浮现路径与机制进行了分析<sup>[29]</sup>。

词汇、语法与韵律的互动,主要体现在韵律语法的研究中。如学界针对汉语多项定语的黏合式名词(如“汉语大词典”“黑皮革沙发”)的定语顺序所提出的诸如“左重原则”<sup>[30]</sup><sup>53</sup>、“自然音步规则”<sup>[31-32]</sup>、优选论<sup>[33]</sup>、“语义松紧度接近原则”<sup>[34]</sup>等解决方案,都实现了词汇、语法与韵律的互动。

词汇、语法与语体的互动,指词汇、语法与语体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陶红印认为操作语体中动词的论元布局是动作行为的通用属性以及以行为为中心的语用原则造成的<sup>[35]</sup>。骆健飞、索潇潇、胡丛欢分别对单双音节对应动词、单双音节对应名词以及副词进行了语体语法考察<sup>[36-38]</sup>。

## (二)研究平面的多重化

研究平面的多重化主要是指研究视角从注重共时的刻画到共时历时兼顾,从关注词汇共时平面的意义到关注词汇化过程,从只关注词汇化到注重打通词法化和词汇化之间的联系。词汇化研究主要对句法结构词汇化和跨层结构词汇化现象比较关注。在句法结构词汇化方面,董秀芳讨论了句法结构的词汇化现象<sup>[39]</sup>。在跨层结构词汇化方面,董秀芳将跨层结构词汇化与短语成词、句法结构成词相并列,确立了其在词汇/词法研究中的地位<sup>[40]</sup>;杨永龙、王灿龙、江蓝生分别对“已经”“恨不得”“物色”“的话”的跨层结构词汇化现象进行了讨论<sup>[41-43]</sup>;刘红妮探讨了跨层词汇化的句法特征、语义基础和语音变化,尝试回答和解决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sup>[44]</sup>。

在词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界还试图打通词法化和词汇化之间的联系。施春宏认为词法化是结构化的一种类型,更多地关涉词汇系统规则化发展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受到语言系统内部结构化机制的制约;词汇化则更多地关系到词汇系统发展的现实性,除了受语言系统内部结构化机制的制约,也会由于受到韵律、频率等因素的促动而形成一项<sup>[45]</sup>。宋作艳认为实体构式化导致词汇化,形成新词语;基于新词语的图示构

式化导致词法化,催生新词法<sup>[46]</sup>。

## (三)研究视野的类型学拓展

研究视野的类型学拓展主要表现为:在语义演变研究方面,从单一的语义演变考察到词汇类型学视角下语义图模型的构建;在汉语构词研究方面,从传统的结构主义的构词分析到基于轻动词理论的构词研究。

语义图模型方面,吴福祥基于东南亚50余种语言,构建出“得”义语素的功能演化路径<sup>[47]</sup>;潘秋平、张敏构建出以处置和被动为核心的汉语方言主要间接题元的语义地图<sup>[48-49]</sup>;贾燕子、吴福祥揭示出汉语“吃”“喝”类动词的跨语言共性<sup>[50]</sup>。

汉语构词研究中,研究汉语形式语法的学者将轻动词理论应用于构词领域,研究特定词类的生成机制与词类结构。如程杰从构词句法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名源动词的生成机制问题<sup>[51]</sup>;汪国胜、王俊认为轻动词的隐现状态是决定离合词以合并态或游离态出现在句法中的关键因素之一<sup>[52]</sup>。

## (四)研究驱动力的转变

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式从描写驱动研究走向了基于描写的解释驱动研究,词汇学界开始采用语法研究的路径来研究词汇现象,研究的理据性增强。孟凯指出三音复合词的形类、韵律、语义之间的匹配理据在于名词性中心成分的性质以及不同形类的定语成分对中心成分的凸显侧面不同<sup>[53]</sup>。施春宏基于“浮出水面”“找不着北”两则准成语的分析,建立了词义的特定认知模式,并认为应将成语当作原型范畴来认识<sup>[54]</sup>。

## (五)对具体语言现象的重新审视和理论蕴含的多重发掘

汉语重大语言事实因其句法、语义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理论蕴含的丰富性,成为各种理论学派讨论和研究对象,或引发学界基于新的认识重新加以解释,其中不乏词汇—语法现象,如动宾倒置复合词(如“军马饲养方法”“纸张粉碎机”)的生成与层次结构问题。

针对动宾倒置复合词的生成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解释思路:一种是形式语法的思路,如界面理论<sup>[55]</sup>、回环理论<sup>[56]</sup>、词法规则和句法规则的互动<sup>[57]</sup>、形式规则与韵律规则的互动<sup>[58]</sup>;一种是韵律语法的思路,如重音规则激发移位说<sup>[30]</sup><sup>50</sup>、“右向构词、左向为语”说<sup>[59]</sup>;一种是多重互动的思路,如韵律、句法、语义的多重互动<sup>[60-62]</sup>,

句法、词汇、语义、韵律、语体、语域、频率、占位、可替换表达等的多重互动<sup>[63]</sup>。

针对动宾倒置复合词的层次结构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语义入手,一是从韵律入手。其层次划分的观点有三:一是认为层次结构是[O[VN]],如王洪君、柯航<sup>[64-65]</sup>;二是认为层次结构是[[OV]N],如刘云、李晋霞、周韧、洪爽、石定栩<sup>[66-68]</sup>;三是认为有的层次结构是[O[VN]],有的层次结构是[[OV]N],如邢福义、郭继懋、陈玉洁、裴雨来、应学风等<sup>[69-73]</sup>。

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接口研究虽然在研究生态、研究平面、研究视野、研究驱动力以及具体语言现象的重新审视和理论蕴含发掘等方面表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但是从整体来看,在运用构式语法、生成词库论、生成语法以及语体语法、韵律语法等语言学前沿理论开展词汇研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构式词法学、形式词法学等方面的研究。

#### 四、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研究的现状

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研究的“三应用”领域是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母语词汇教学,应用研究在前两个领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本体子领域如词汇、语法、语音等的教学研究的发展。在教学法研究方面,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通行的教学法是词本位教学法,即把词作为组词造句的基本单位来学习。21世纪以来,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领域又先后出现过“字本位”教学法<sup>[74-75]</sup>、“词·语素·汉字”教学法<sup>[76]</sup>、语素教学法<sup>[77]</sup>,以及根据词汇的网络性进行教学的方案<sup>[78]</sup>。针对各种教学本位观,施春宏提出语言教学的分层次的综合本位观<sup>[79]</sup>。张博指出语素法和语块法各有其适用性,在多个维度上各有侧重,形成互补<sup>[80]</sup>。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21世纪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研究在数据库、语料库、知识库等方面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荀恩东等介绍了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的建设与应用<sup>[81]</sup>;詹卫东、王惠等介绍了基于配价理论开发的汉语

语义词典——“现代汉语语义词典”<sup>[82-83]</sup>;臧娇娇、荀恩东从中文信息处理角度对动宾型离合词自动识别进行研究<sup>[84]</sup>。

与以上两个领域的研究形成对比的是母语词汇教学研究的缺乏。陆俭明提出中小学语文教学有三个目的,其中一个“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语文技能,那就是‘听说读写’的技能”<sup>[85]</sup>。“听说读写”技能的基础是词汇的掌握。虽然母语词汇教学实践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颇受重视,但目前我国的母语词汇教学研究存在滞后现象,我们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词汇教学的承担者与研究者身份的分离。词汇教学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小学语文教师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词汇教学的任务。但是与词汇教学的任务相比,小学语文教师的科研任务是比较轻的,这就使得一些教学实践中得出的新方法、新思路难以及时有效地总结推广,造成教学与研究的分离。如何才能找到驱动力,以加强研究意识、改变当前局面,是亟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五、结语

语言学研究是在相关学科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既有领先于相关学科的地方,也受到相关学科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科学领域和科学哲学领域。“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恰恰是科学观念,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观念,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理性社会。”<sup>[86]</sup>在物理学领域,牛顿的力学体系在20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取代。科学研究范式的替代带来的是科学观念的改变,各领域都因这场科学革命引发了研究范式转变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领域反应最为迅速,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发生了转变。认识论上,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被证伪主义、历史主义所取代,并朝着结构融贯论的方向发展;方法论上,归纳主义被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所取代,并朝着融贯论的方法论转向。在这种大背景下,语言学尤其是语法研究领域同样也发生了范式转变,“乔姆斯基革命”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词汇学研究也不例外,发生了局部研究范式的转变。其一,研究方法从归纳走向演绎,以及研究驱动力由描写走向描写与

解释相结合,都与“乔姆斯基革命”以及科学哲学领域从归纳主义到证伪主义的转变风向是一致的;其二,研究生态从单一层面/界面的静态研究走向多层面/界面的互动研究,研究平面的多重化以及研究视野的类型学拓展,与结构融贯论的基本精神,即概念的意义依赖概念在其中出现的那个理论结构以及前者的精确性依赖后者的精确性和融贯程度<sup>[87]</sup>,是一致的。现今词汇学或者说整个语言学领域都由于 ChatGPT 以及类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人工智能词汇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人工智能在国际中文教育、母语教学等词汇教学领域使用的有效性、可行性等,都是词汇学今后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1]杜翔.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C]//刘丹青.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2-107.
- [2]晁继周.说别义词[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5):40-43.
- [3]张博.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4):36-45.
- [4]周荐.熟语分类论[C]//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46-267.
- [5]施春宏.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从几则成语的现实使用谈起[J].汉语学习,2006(6):37-43.
- [6]吕明臣.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48-53.
- [7]施春宏.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J].语言文字应用,2010(3):70-80.
- [8]李宇明.关注网络原住民[N].人民日报,2016-09-15(8).
- [9]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25-265.
- [10]施春宏.语文评议中的现实同一性问题:从“野尻”的使用谈起[J].语文建设,1998(1):25-30.
- [11]江蓝生.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2):22-33.
- [12]刘丹青.描写、记录、规范:谈《现汉》收字母词[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2):10-11.
- [13]邹玉华.《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违法与否的法律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4):92-99.
- [14]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J].中国语文,1999(5):323-330.
- [15]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3(4):84-105.
- [16]蒋绍愚.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J].中国语文,2007(5):387-479.
- [17]刘丹青.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J].南京师大学报,1990(3):77-80.
- [18]施春宏.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J].语文研究,2003(4):19-24.
- [19]袁毓林.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J].语言战略研究,2021(5):77-90.
- [20]袁毓林.否定与强调的多声关联:基于“并”与“绝”的对比考察[J].汉学报,2024(3):41-54.
- [21]袁毓林.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3):205-223.
- [22]袁毓林.汉语配价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382.
- [23]宋作艳.轻动词、事件与汉语中的宾语强迫[J].中国语文,2011(3):205-217.
- [24]袁毓林.基于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语义知识体系研究[J].中文信息学报,2013,27(6):23-30.
- [25]袁毓林.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J].当代语言学,2014(1):31-48.
- [26]张谊生.“就是”的篇章衔接功能及其语法化历程[J].世界汉语教学,2002(3):80-90.
- [27]李胜梅.论句首“正是”的篇章功能[J].当代修辞学,2012(2):32-39.
- [28]方梅.“说是”的话语功能及相关词汇化问题[J].中国语言学报,2018(18):1-14.
- [29]李冬梅,施春宏.跨层词“说是”的多重话语功能及其浮现路径与机制[J].语文研究,2020(4):26-34.
- [30]DUANMU S. Phonologically motivated word order move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pounds[J].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1997, 27(1):49-77.
- [31]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中国语文,1998(1):40-47.
- [32]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74-103.
- [33]周韧.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0-177.
- [34]柯航.汉语单音节定语移位的语义制约[J].中国语文,2011(5):410-418.
- [35]陶红印.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J].中国语文,2007(1):3-13.
- [36]骆健飞.汉语单双音节对应动词的语距和语体语法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19.
- [37]索潇潇.现代汉语单双音节对应名词语体语法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17.
- [38]胡丛欢.“语体语法”视域下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32-56.
- [39]董秀芳.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J].语言研究,2002(3):56-65.
- [40]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265-284.

- [41] 杨永龙.“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J].中国语文,2002(1):41-49.
- [42] 王灿龙.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J].当代语言学,2005(3):225-236.
- [43] 江蓝生.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J].中国语文,2004(5):387-400.
- [44] 刘红妮.汉语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 [45] 施春宏.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结构异同及相关词法化、词汇化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17(2):147-170.
- [46] 宋作艳.从词汇构式化看 $A_1A_2A_3$ 的词汇化与词法化[J].世界汉语教学,2019(2):201-213.
- [47] 吴福祥.从“得”义动词到补语标记:东南亚语言的一种语法化区域[J].中国语文,2009(3):195-211.
- [48] 潘秋平,张敏.语义地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J].当代语言学,2017(4):510-545.
- [49] 张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C]//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60.
- [50] 贾燕子,吴福祥.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7(3):361-381.
- [51] 程杰.汉语名源动词生成的句法机制刍议[J].现代外语,2010,33(2):121-132.
- [52] 汪国胜,王俊.从轻动词角度看现代汉语离合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2):101-105.
- [53] 孟凯.复合词内部的成分分类、韵律、语义的匹配规则及其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3):93-103.
- [54] 施春宏.词义的认识模式与词义的性质及构成:兼谈成语的性质[J].辞书研究,2002(6):11-19.
- [55] 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J].中国语文,2001(2):122-133.
- [56] 何元建.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J].当代语言学,2004(3):223-235.
- [57] 程工.汉语“者”字合成复合词及其对普遍语法的启示[J].现代外语,2005,28(3):232-238.
- [58] 庄会彬,刘振前.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词机制与韵律制约[J].世界汉语教学,2011(4):497-506.
- [59] 冯胜利.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J].语言科学,2004,3(3):12-20.
- [60] 周韧.共性和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J].中国语文,2006(4):301-312.
- [61] 杨永忠.动宾倒置的生成[J].语言科学,2006,5(3):39-48.
- [62] 应学风.现代汉语黏合结构韵律与句法互动的语义语用制约[D].杭州:浙江大学,2013.
- [63] 施春宏.合成复合词系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语体语法的视角[J].中国语言学报,2022,50(3):667-702.
- [64] 王洪君.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J].当代语言学,2001(4):241-252.
- [65] 柯航.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2-146.
- [66] 刘云,李晋霞.“ $V_{双}N_1$ 的 $N_2$ ”格式转化为粘合式偏正结构的制约因素[J].世界汉语教学,2002(2):21-27.
- [67] 周韧.关于“纸张粉碎机”的切分[J].东方语言学,2007(2):125-133.
- [68] 洪爽,石定栩.汉语合成复合词的组合结构[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4):76-80.
- [69] 邢福义.NVN造名结构及其NVVN简省形式[J].语言研究,1994(2):1-12.
- [70] 郭继德.“熊猫保护组织”与“保护熊猫的组织”的句法语义区别[J].汉语学习,1996(5):16-20.
- [71] 陈玉洁.联系项居中原则与N1VN2(NP)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2006(2):51-62.
- [72] 裴雨来,邱金萍,吴云芳.“纸张粉碎机”的层次结构[J].当代语言学,2010(4):356-364.
- [73] 应学风.韵律与语义互动视角下的动宾倒置复合词的层次结构[J].汉语学习,2019(4):53-61.
- [74] 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2000(3):89-98.
- [75] 杨烁.白乐桑与“法式字本位”教学法[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
- [76] 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J].世界汉语教学,2008(2):109-118.
- [77] 赵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语素法”适用性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6(2):276-288.
- [78] 常敬宇.汉语词汇的网络性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3):13-18.
- [79] 施春宏.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12(3):390-408.
- [80] 张博.“语素法”“语块法”的要义及应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4):12-24.
- [81] 荀恩东,饶高琦,谢佳莉,等.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的建设与应用[J].中文信息学报,2015,29(3):169-176.
- [82] 詹卫东.基于配价的汉语语义词典[J].语言文字应用,2000(1):37-43.
- [83] 王惠,詹卫东,俞士汶.“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的结构及应用[J].语言文字应用,2006(1):134-141.
- [84] 臧娇娇,荀恩东.基于BCC的离合词离析形式自动识别研究[J].中文信息学报,2017,31(1):75-83.
- [85] 陆俭明.跨入新世纪后我国汉语应用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J].中国语文,2000(6):516-524.
- [86] 袁正光.当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影响[C]//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文明的发动机: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7-238.
- [87]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M].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64.

##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Chen Zhenyan

(Research Center of Hen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body with two wings and three applications", with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as the main body, modern Chinese syntactics and lexicography as the boosters, and vocabulary teaching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native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 as the landing points. Accordingly,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has three sub-domains like subject research, interface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The basic features of subject research cover the refinement and elaboration of research dimensions,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vocabulary and explanatory metalanguage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adoption of both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face resear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ecology shifting towards multi-level/interface interactive studies; the research plane focusing on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interfaces; the research horizon expanding towards typology; the research driving force shifting towards explanation based on description; significant Chinese linguistic facts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being re-examined and explor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pplied research is summarized and consider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vocabulary teaching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native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

**Keywords:** the 21st century; vocabulary research; subject research; interface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上接第53页)

《集韵》古文,“嚙(啍)”“支(丈)”转录《集韵》字头,等等。四是《五音集韵》直接录为“古文”,就是《玉篇》《集韵》等前代字韵书不录的,《五音集韵》直接录作“古文”,如“𠄎(共)”“𠄎(至)”等。这种“以篆为古”的风气在北宋及金代金石学盛行、崇尚古文的大文化背景下比较常见,士大夫们将时间久远的篆文和当时所能见到的金文、《说文》古籀文等相提并论,称作广义的“古文”或“古

篆”,俨然成为一种时尚。

### 参考文献:

- [1]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 [2]白俊骞.《康熙字典》古文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 [3]王丹.《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
- [4]李春桃.传抄古文综合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09.

## Exemplification of the "Viewing Seal Script as Ancient Characters" of Ancient Characters in *Wuyin Jiyun*

Qiu Long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Wuyin Jiyun* (《五音集韵》) is a very important large phonological book after *Guangyun* (《广韵》) and *Jiyun* (《集韵》), which includes lots of ancient characters chongwen (重文). In terms of the origin of character shapes, some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in *Wuyin Jiyun* (《五音集韵》) are not derived from ancient characters of *shuowen* (《说文》), but from seal script and liding (隶定) seal script of *shuowen* (《说文》). The paper analyzes 37 examples of "ancient characters" of "viewing seal script as ancient character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orga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dictionary and rhyme books.

**Keywords:** *Wuyin Jiyun* (《五音集韵》); ancient characters; viewing seal script as ancient characters; exemplification

# 体认翻译学与公示语翻译

——以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为例

陈丽红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体认翻译学为公示语翻译构建了多维度的理论框架,强调从语言、认知和现实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在语言层面,需确保译文表达的规范性与准确性,避免语言错误与歧义;在认知层面,应注重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精准传递文化内涵以促进文化认同;在现实层面,则需突出翻译的实用性与交际功能,满足实际需求。基于这一理论,台州府城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其公示语英译质量的提升需统筹三个层面的动态联动。译者应在三者交互中寻求平衡,确保译文既符合语言规范,又契合受众认知,同时实现公示语的现实交际功能,从而有效服务游客需求,提升台州府城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策略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10

## 一、引言

公示语翻译是指将公开面向公众的告示、指示、警示等文字及图形信息转换为目标语言的过程<sup>[1]</sup>,强调语言规范、文化适应和功能对等。公示语翻译研究横跨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应用次数最多的十大理论依次为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文本类型理论、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关联理论、顺应论、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及模因论<sup>[2]</sup>。其中,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和功能翻译理论关联性最强,实践应用最为广泛。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莱斯(Katharina Reiss)提出文本类型理论<sup>[3]</sup><sup>78</sup>,指出翻译应基于文本类型与交际功能的关系构建对等效果。这一理论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功能导向的实践框架。顾红、丁晓蔚、张群星(2014)指出,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公示语汉英翻译应以预期功能

为导向,依据目标读者的需求选择翻译策略<sup>[3]</sup><sup>78</sup>。王倩、战菊(2019)指出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并探讨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协调和操控源语和译语的文化功能<sup>[4]</sup>。20世纪80年代,莱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在功能翻译理论上正式提出“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sup>[5]</sup>。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指导公示语翻译的核心原则。赵伟飞(2010)基于目的论,以南宁市公示语英译为例,认为采用语意翻译法或交际翻译法,或两者相结合进行翻译,可使译文与源语在目的和功能方面相对应<sup>[6]</sup>。张群星、顾红(2012)依据目的论“让目的语读者明晰公示语交际目的”的原则,针对不同层面的汉语公示语的模糊性,提出采用保留模糊、增补信息变模糊为清晰、改译、略译及零翻译等翻译策略<sup>[7]</sup>。2001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观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sup>[8]</sup>,为公示语翻译的文化适应与本土化提供了新视角。陈锦阳(2016)从语

收稿日期:2026-01-20

基金项目: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台州古城公示语规范化翻译研究”(22GHZ04)

作者简介:陈丽红(1978—),女,浙江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评估了横店影视城公示语翻译质量。分析表明,最佳译文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与选择的结果,旨在实现“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最大化<sup>[9]</sup>。薛红果(2022)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了公示语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转化中的翻译错误或翻译不当案例并提出了改进措施<sup>[10]</sup>。

综上所述,在公示语翻译实践中,功能翻译理论要求译者根据公示语的具体功能(如指示、警告、信息等)选择相对应的翻译策略;目的论要求译者根据公示语的交际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生态翻译学理论则强调译者需适应生态翻译环境,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考量,从而实现公示语译文的生态平衡。总之,功能翻译理论和目的论侧重于实现公示语的预期功能和交际目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强调公示语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适应,平衡语言、文化和社会的需求。然而,无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还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指导公示语翻译时,都未充分关注译者的认知体验和读者的认知接受度。在公示语翻译中,作为信息接收者的认知接受度与理解能力恰恰是决定翻译效果的核心要素。体认翻译学是近年来国内翻译学界提出的新型理论,主张从体认视角重构翻译过程,重在关注译者的主体体验和读者的认知互动,有助于提升公示语译文的实用性和接受度,弥补其他理论在认知层面的不足。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体认翻译学理论,以国家5A级景区台州府城的公示语英译为例,探究体认翻译学在公示语英译中的可行性。

## 二、体认翻译学： 发展历程与研究前沿

王寅教授团队自21世纪初期便开始探讨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存在的局限性。在传统翻译研究中,认知语言学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翻译学在21世纪迎来了显著的革新。2010年,马丁(Martin)开创性地提出了“认知翻译学”这一概念<sup>[11]</sup>,将其确立为翻译学新分支。2012年,王寅教授首次提出“翻译是体验性认知”的观点。2014年,王寅团队进而提出“体认语言学”。随后,王寅教授融合两者精髓,构建了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深化了翻译学的认知研究。2021年,王寅教授的专著《体认翻译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标志着体认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公开呈现。《体认翻译学》一书主要阐述了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和方法论,通过丰富实例展示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理解翻译学的新视角。该著作指出,翻译理论经过“作者、文本、读者、解构、文化、生态”等转向之后亦已出现“认知”转向。该著作反思了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独白译论,指出这种“一家独白”的思路是一种“毒”,是“毒害全面理解和正确翻译的麻醉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催化液,也是消解‘圆满通融、全面兼顾’的避雷针”<sup>[12]</sup>,并针对以往翻译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创新性地提出了体认翻译学的理念。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列主义唯物论、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认知科学五个领域<sup>[13]</sup><sup>44</sup>,其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感觉知觉、意象图式、范畴化与概念化、认知模型、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像似性等)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sup>[13]</sup><sup>46</sup>。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笔者在CNKI中以“体认翻译学”和“体认+翻译”为主题进行检索,仅获得64篇论文。这些论文均发表于2020年以后,主要集中于文学作品翻译和理论研究,少量涉及体认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

1. 文学作品翻译方面。左玉林、卢冬丽基于体认翻译学理论,通过自建《诗经》视听体认汉日语料库,剖析了《诗经》视听世界在现代日语中的映射和创仿<sup>[14]</sup>。王寅和陈兆瑞等学者则通过核心原则“现实(体)—认知(认)—语言”,分别简析了《红楼梦》中歇后语的体认性和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蛙》中的乡土语言翻译的体认过程<sup>[15-16]</sup>。

2. 理论研究方面。王寅简述了其理论基础,并重点解析了如何将“体认”原则运用于翻译实践<sup>[13]</sup><sup>43</sup>。林琳、姚振军通过论证“体认”的内在逻辑关系,阐释了译学体认观的随附、涌现和同一性关系,从而厘清了体认翻译学核心概念的内部逻

辑关系<sup>[17]</sup>。黄忠廉等则进一步阐述了体认的实践运用,提出“三步二次翻译体认系统”。他指出翻译实践需经过理解、变化和表达三个体认步骤;整个翻译行为包含全译性极似体认与变译性特效体认,译者需先体认作者,再重构译语<sup>[18]</sup>。

由此可知,当前的体认翻译学研究侧重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理论体系的探究,研究角度略显单一。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体认翻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也初现雏形。但是,研究表明体认翻译学在公示语领域的研究甚少,近乎空白。因此,本文基于体认翻译学的“现实—认知—语言”三次理论框架,探究体认翻译学在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中的解释力与有效性,不仅为公示语翻译提供新视角,而且有助于深化体认翻译学本土化实践的认知与探索。

### 三、实例分析:

#### 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

公示语的译文不仅要考虑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要关注两种语言承载的不同文化,洞悉其文化差异。在实现两种语言等效表达的同时,要考量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和文化接受程度,同时需兼顾实际应用场景的适用性,使公示语译文实现信息传递、文化内涵再现与语境功能重现这三重目标。因此,对于台州府城公示语的英译,译者需实现现实、认知与语言三个层面的有效转换。事实上,体认翻译学强调三者并非孤立存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始终存在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依托于现实、认知和语言的共同映射。翻译的要务是实现三者的平衡状态,即实现意义、表达和审美的最优解<sup>[19]</sup>,使得公示语译文既准确传达信息与文化内涵,又实现提供指引或告知的交际意图。

##### (一)台州府城公示语语料收集

2025年3月,通过实地调研,笔者收集了国家5A级景区台州府城三大景点的公示语英译照片共计322张。其中,东湖52张、台州府城墙154张、临海紫阳街116张。在场景覆盖上,涵盖景区出入口、路线导览、核心景点等关键节点;在功能分类上,包含信息类、指示类、提示类等公示语主要功能;在文化元素上,涉及地方民俗、历史典故、宋

韵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

##### (二)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的联动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有着密不可分联动关系。词汇选择与句法结构作为语言层面的核心构成,直接影响着认知层面的信息传达与理解进程。译者通过推敲词语、构建句式等方式,为信息传递搭建了跨越语言与文化鸿沟的桥梁。公示语的翻译绝非语言符号的表层传递,而是一段语言与认知深度交织的互动旅程。公示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功能。翻译公示语需要译者跨越语言 and 文化的障碍,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并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必须关注目的语读者认知水平和文化背景,因为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习惯深植于其认知体系,只有使译文在词汇、句法等语言形式上与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完美适配,才能真正实现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的良性联动,确保公示语翻译精准无误,达到预期信息传递效果。

例1:壮城兵组建于北宋,称壮城营……北宋熙宁初定员百人,南宋绍兴元年(1131)增至一百五十人。

译文:Defending City soldiers were form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lled Defending City battalion...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ning had one hundred peopl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oxing Yuan (1131) increased to one hundred and fifty people.

此译文忽略了语言和认知的联动。译文在语法结构上不够清晰,进而可能导致目的语读者在认知上对信息的理解出现偏差。此译文除大小写、标点错误外,还忽略了原文中隐含的主谓关系,不符合英语形合的特点。汉语重意合,强调意义关联;英语重形合,注重形式衔接。例句中,“北宋熙宁”和“南宋绍兴元年”均不是主语,而是时间状语。主语应为“壮城营”,它虽在行文中被省略,但在汉语中不影响语义关联。译文中的“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ning had one hundred people”则极易引发读者对时间节点与人数规模之间关系的误解。译文不妨改为:“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garrison known as Zhuangchengying was set up to guard the city wall, initially staffed with 100 soldiers during Emperor Xining's reign. By the first year of Shaoxing (1131)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s numbers had increased to 150.”通过理清主语和状语,补全主语“壮城营”,修改后的译文清晰地展现了壮城营从北宋熙宁年间的100名士兵,到南宋绍兴元年增长至150名士兵的发展历程。这样的改动不仅修复了语言层面的逻辑链条,更在认知层面使目的语读者感知到这一历史时期军事力量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战略考量。

例2:此事震惊了朝廷,即遣太常博士彭思永至台督修,聚台州各县之力,历三旬而修复城墙。

译文:The court sent Dr. Peng Siyong, a doctor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to Taizhou to supervise the repair, and gathered the efforts of all counties in Taizhou to repair the walls for three years.

此译文将“太常博士彭思永”直译为“Dr. Peng Siyong”,看似正确,其实不然。“太常博士”是古代的官职名,为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而“Dr.”是学位称呼,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直译会造成认知错位。为了准确传达“太常博士”这一官职名的文化内涵,不妨采用释译策略,通过添加必要的解释,让读者准确理解该术语。因此,建议将“太常博士彭思永”翻译为“Peng Siyong, an imperial ritual scholar”,使其在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均与原文一致,既能准确传达公示语的信息,又能避免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偏差。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旬”通常指10天,“三旬”即30天,故将“三旬”译为“three years”会造成认知层面的文化误解,应译为“thirty days”。因此,不妨将译文修改为“This incident alarmed the imperial court, which immediately dispatched Peng Siyong, an imperial ritual scholar, to supervise the repair.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all the counties in Taizhou, the city wall was restored in just thirty days.”,使公示语译文既在语言层面上准确传达交际意图,又在认知层面上准确传达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公示语英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关注语言层面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又要把握认识层面文化内涵转换的适应性,方能确保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期待。

### (三)语言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联动

台州府城公示语的英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符号转化和认知层面的文化内涵传达,同时要考虑现实层面公示语的适用性,即实现其交际意图。

众所周知,公示语的主要目的是向游客告知信息、提供指引或警示风险等,其在现实场景中的实用性不容忽视。语言层面上的信息传达,最终要落实到现实层面的游客行为指引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平衡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通过增译法填补现实语境中缺失的关键信息,通过仿创转换消除翻译腔,使译文尽量接近目的语读者的表达习惯。既要保证译文能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又要确保其在现实情境中对游客行为的有效指引,从而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

例3:斜坡陡峭,行走靠右。

译文:Steep slope! Keep to the right.

这一译文源自台州府城墙的文化地标——揽胜门的一块指示牌,乍看之下,似乎简洁明了,且在语言形式上与原文一一对应,但就公示语的交际功能而言,未能在现实层面有效指引游客行为。根据原文语境和实地路况,因上坡台阶陡峭,需提醒游客抓住右侧扶手拾级而上。因此,该译文“Keep to the right.”指令不清晰,不利于交际功能的实现,需要补充实际情境中的缺失信息,改译为“Steep slope! Hold the handrail.”,便于外国游客准确理解指示牌的意思,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有效避免因理解偏差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例4:揽胜门广场禁止车辆停放,如违规停放,相关部门将作出锁车或拖车等处理。

译文:Parking is prohibited in Lanshengmen Square, relevant departments will lock the vehicles or tow the vehicles away for any illegal parking.

这是揽胜门广场禁止车辆违规停放的告示语,其中“Parking is prohibited in Lanshengmen Square”看似正确,实则不然。译者没有意识到语气也是一种交际手段,使用“prohibit”一词造成语气过于强硬,不符合英美国家强调礼貌和民主的语用特征。此外,使用“illegal”一词,意味着将受到法律制裁,与原文隐含的偏向于行为约束的认知意图不符。为了提升信息沟通的有效性,不妨使用仿创策略,借鉴日常生活中英美国家普遍使用的“No littering”公示语形式,将其改译为“No parking in Lanshengmen Square! Vehicles in violation are subject to wheel clamping.”,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表达习惯,有助于实现实际场景中的交际意图。

概言之,公示语的英译不仅要考量语言形式的对等,更要注重其在现实情境中的适用性,可通过增译法弥补实际交际情境中的缺失信息,通过仿创法贴近现实语境的语言表达习惯,使公示语既能准确传递信息,又能有效指导游客行为,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 (四)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联动

台州府城公示语的英译不仅涉及语言形式的转换、现实场景的适用性,更应关注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关联性。在英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正确理解原文词汇和句法结构,解构原文意义;通过对比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考量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精准传递文化内涵;通过考量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和实际使用场景,选择相对应的目的语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的传递方式,使得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从游客视角检验其实用性。在此过程中,译者只有在认知层面深入理解原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方能在现实层面生成满足现实需求的译文,从而有效实现公示语的交际意图。公示语的英译体现了语言交际的复杂性,又彰显了翻译的文化创造性,要求译者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兼顾语言形式、认知理解和现实效果的平衡,从而实现信息的准确高效传递。

例5:坊墙,系由唐宋时期里坊制度所衍生。现坊墙的主要功能是起着防火隔离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台州府城旧时繁华与历史沧桑,成了古城中的道道风景。紫阳街和西门街现留存有永靖坊、清河坊、迎仙坊、奉仙坊、悟真坊、广文坊、顺政坊和迎春坊8座明清时期建筑的坊墙。

译文:It was derived from Lifang system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existing square wall is to play a role in fire prevention and isolation,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prosperity and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aizhou City in the old times, and has become the scenery in the ancient city. Ziyang Street and Ximen street have eight walls buil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cluding Yongjing Square, Qinghe Square, Yingxian Square, Fengxian Square, Wuzhen Square, Guangwen Square, Shunzheng Square and Yingchun Square.

“坊墙”由唐宋时期的里坊制度衍生而来,通

常指带有防火功能的拱形建筑结构。古城内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道坊墙,横跨街道两侧,既可以分隔街坊,又起着防火隔离的作用。译文中,“坊墙”被译为“square wall”或“square”,容易被误指为广场,完全丧失了里坊制度所衍生的文化内涵和功能价值,造成文化误解。为了准确传递“坊墙”的文化本质,译者应深入洞悉认知层面的文化内涵,同时结合现实场景的物理特征,采用归化策略,将“坊墙”改译为“arched anti-fire wall”或“archway wall”。这样便于游客在现实层面厘清坊墙拱形外观的物理特征,在认知层面明确其防火隔离的历史功能。此外,“西门街”作为街道名称,其大小写应符合专有名词的书写规范,便于读者识别地名。因此,建议将译文修改为“The arched anti-fire walls, evolved from the ward system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erved primarily as firebreaks. They also stand as poignant reminders of Taizhou's past prosperity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its history, gracing the old city with picturesque charm. Eight of thes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ard-walls remain preserved on Ziyang and Ximen Streets, which are Yongjingfang, Qinghefang, Yingxianfang, Fengxianfang, Wuzhenfang, Guangwenfang, Shunzhengfang and Yingchunfang.”,以实现公示语信息的有效传递。

例6: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知州赵汝愚问政于民,将城墙增高加厚,重建镇宁、兴善、丰泰、括苍四门。

译文:In 1175, the second year of Chunxi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dynasty, Zhao Ruyi, a chief prefecture, ask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He increased and thickened the city walls, rebuilt four gates of Zhenning, Xingshan, Fengtai and Kuocang.

公示语译文中,“知州”被译为“a chief prefecture”,不符合中国古代官衔的表达习惯。“知州”实为宋至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主管该地区的民政、司法等事务。而“prefecture”则侧重指省、县等行政区划,一般不用于表示官职。故而,建议采用归化策略,添加解释性说明,将“知州”改译为“the prefectural governor responsible for all civil affairs within his jurisdiction”,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便于目的语读者准确把握“知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际职责。译文中“问政于

民”被直译为“ask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极易被误解为官员在询问政府,完全忽视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具体语境。实际上,“问政于民”是指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听取普通百姓的建议和意见。不妨采用意译策略,抓住本质含义,改译为“take the pulse of public opinion”(探测民意)。这样更能准确传达这一政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内涵,实现认知理解与现实语境的有效对接。此外,“将城墙增高加厚”侧重强调巩固之意,改译为“have the city walls heightened and reinforced”,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习惯。因此,建议将译文修改为“In the second year(1175) of the Chunxi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in the Song Dynasty, Zhao Ruyun, the prefectural governor responsible for all civil affairs within his jurisdiction, took the pulse of public opinion and had the city walls heightened and reinforced. He also oversaw the reconstruction of four city gates: Zhening, Xingshan, Fengtai and Kuocang.”,使其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从而实现认知与现实的联动。

综上所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联动,使译文既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又不乏现实语境的适用性,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度。此联动有助于提升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的质量和效果,能更有效地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

#### (五)语言、认知和现实三者联动分析

语言既是认知的载体,又是现实的反映,认知通过语言解码并重构现实,而现实为语言和认知提供实践场所,形成语言、认知、现实三者联动的循环系统。仅以例6为例,知州赵汝愚通过“问政于民”的语言交流,旨在将民众对城防的认知诉求转化为加固城墙的现实需求。但译文中“问政于民”被直译为“ask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询问政府),将官民互动的原始场景误读为“官方互询”,既造成了认知偏差,又割裂了语言符号与现实行为的对应关系。体认翻译学要求公示语翻译既要确保语言转换的准确性,又要兼顾源语和目的语认知的一致性,同时要充分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考量译文是否契合实际需求。鉴于此,不妨通过调整语言表达,如改译为“take the pulse of public opinion”(探测民意),使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从“官问官”转向“官问民”)与源语现实(官民互动)形成精准对应,从而完成

三者联动的闭环。

## 四、结语

体认翻译学强调语言符号、思维模式与社会情境在翻译活动中的动态关联,凸显了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开展适应性调试的活动实践。本文从体认翻译学理论出发,聚焦语言层面与认知层面、语言层面与现实层面、认知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动态关联,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为切入点,分析了台州府城公示语英译的现状,探讨如何提升译文质量。通过研究发现,基于体认翻译学理论,以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现实语境为立足点,采用地道表达、注重语境契合、强化文化意向传达,对于提高公示语英译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并产生文化共鸣,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语言、认知和现实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这就要求翻译主体在公示语英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台州府城所处的具体语境,准确理解和把握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在认知层面的差异,在经过认知加工后,灵活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精准传递翻译信息,从语言表述、认知理解和现实情境等方面实现源语信息和目的语信息的平衡统一。

#### 参考文献:

- [1]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J].中国翻译,2005,26(6):38-42.
- [2]叶慧君,胡连影.2011—2020年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2021(5):29-33.
- [3]顾红,丁晓蔚,张群星.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汉语公示语的英译[J].语文建设,2014(12):78-80.
- [4]王倩,战菊.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公示语汉英翻译为例[J].外语学刊,2019(1):104-109.
- [5]VERMEER H.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21.
- [6]赵伟飞.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原则及翻译策略:以南宁市公示语英译为[J].东南亚纵横,2010(5):116-119.
- [7]张群星,顾红.汉语公示语的模糊性及其目的论视角下的英译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2012,43(6):143-147.
- [8]杨春丽,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名胜简介英译与地方国际形象提升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4):109-113.
- [9]陈锦阳.公示语翻译的“三维”转换:以横店影视城为例[J].上

海翻译,2016(1):38-42.

[10]薛红果.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问题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30(4):97-100.

[11]MUÑOZ MARTÍN R.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ology [C]// SHREVE G M, ANGELONE E.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169-187.

[12]王寅.体认翻译学: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100.

[13]王寅.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中国翻译,2021,42(3):43-49.

[14]左玉林,卢冬丽.松冈荣志新译《诗经》视听体认的“映射”与“创仿”[J].民族翻译,2025(1):58-68.

[15]王寅.体认翻译学在歇后语英译中的应用:以《红楼梦》三译本中歇后语为例[J].中国翻译,2023,44(5):133-139.

[16]陈兆瑞,艾尼.体认翻译学视域下乡土语言英译认知解读[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24(3):1-8.

[17]林琳,姚振军.体认翻译学框架下“体”与“认”的关系探究:基于心智哲学“体认一元观”的译学新思考[J].中国翻译,2023,44(4):39-47.

[18]黄忠廉,孙福庆.翻译体认系统论[J].中国翻译,2024,45(4):15-22.

[19]张书贤,张智义.关于体认翻译学建构的再思考[J].民族翻译,2023(2):43-49.

##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nd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aizhou Prefectural City

Chen Li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emphasiz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cros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reality-based dimensions. At the language level,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standardization so as to minimize errors and ambiguities. At the cognition level, it is essential to align with the cultural acceptance of target readers to achieve the accurate conveyance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t the reality level,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translation's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to meet practical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is theory, improv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aizhou Prefectural City, a renown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requires a balanced integration of all three dimensions. Translators must harmonize linguistic norms, audience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to effectively serve tourists' needs and enhance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image.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public signs in Taizhou Prefectural City;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论唐末“诗文互渗”现象的样态及原因

蒋宇婷,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诗歌和小品文是唐末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体,两者在创作主旨、艺术手法与风格特征等方面彼此互动,突破了诗文各自领域内的创作范式,促使诗、文创作能更好地发挥其文体自身的特色和影响。所以有如此现象,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的原因:“诗文同源相通”的客观存在使唐末文人难以避免诗文互渗;士人为了立言、行卷,追求艺术创新有意为之;寒士想反抗科举的压迫;文人的意识与行为存在矛盾。唐末诗文互渗有较高的成就和意义,对后世诗文创作和文体互渗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唐末;诗歌;小品文;文体互渗;文人心态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11

“诗文互渗”是指诗文打破文体壁垒,将各自的创作风格、技法等延伸到对方文体中,以彰显文人在不同环境下独特的经验、情感、审美等。此概念的出现,离不开汉魏六朝文人将文体辨析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sup>[1]</sup>,并构建出较为丰富的文体系统<sup>[2]</sup><sup>134</sup>。随着文体的繁多和文人辨体意识的成熟,文体互渗的现象逐渐被注意,其中诗文之辨成为文体辨析的重要话题,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意见:诗文一体、诗文有别、诗文相通<sup>[3]</sup>。总体而言,“诗文有别”的观念更为人们接受,诗文界限愈发明确。此后文人讨论文体互渗多集中于颂赞、碑赋之类的文体,是文体划分过细所致。直至中唐韩愈倡导“以文为诗”,诗文边界再现变化,文体互渗成为文人自觉的创作手段和不可忽视的现象。然文章大家如“韩柳”等人,大量为文而无自编文集,后人对此时诗文关系的讨论也多集中于韩愈“以文为诗”,诗文互动未集中突出,研究便也寥寥。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然咸通之前,唐王朝国势尚有挽救的希望,咸通之后则回天乏术,故李定广在《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中将“唐末”从“晚唐”中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sup>[4]</sup>。唐末之前和之后,诗文的风格面貌是不大相同的,但在特殊环

境影响下,唐末诗文面貌多有相似。文人群体不仅大量写作诗文,且多自编诗、文集,文体互渗也在此得到集中展示。对此有诸多研究成果,如“说”“辩”文体的艺术互渗、小品文与古风诗歌声气相通现象受到注意<sup>[5]</sup>,但未被具体探讨;对文人熔铸自己的气质、性格等入文开拓了文本新形式有了辨析<sup>[6]</sup>;特别是“唐末诗歌受到古文深刻影响,从而总体上走向议论化、通俗化”这一观点论证,展现了唐末诗文互动最鲜明的特点<sup>[7]</sup>。对于唐末诗文互渗的表现与成因,前人鲜有专论,现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作品为主,主要将三人小品文中蕴含对唐末愤慨和冷漠之情的古文与其诗歌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得唐末诗文如何互渗共进,并剖析此现象背后的成因。

## 一、唐末诗文互渗的现象

唐末小品文三大家的创作各有千秋,罗隐之作的主要特色是触物起兴,指事立言,发端随意而议论新鲜深刻,行文驰骋纵横;皮日休之文则善发议论,结构平实而严谨,能高度概括所写之

收稿日期:2025-01-07

作者简介:蒋宇婷(2001—),女,江苏新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李定广(1966—),男,安徽合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魏晋唐宋文学。

事,说理性强;陆龟蒙的小品文极善寓言,常常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些小品文的特点,在三人的诗歌创作中极容易找到两者交叉、重叠的因素,其诗文作品互渗现象具体表现在融会贯通主旨、相互借鉴艺术手法、风格特征相互渗透等。

### (一) 创作主旨融会贯通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可谓唐末的主题曲,文人创作多以此为内容题材,以讽刺时弊、慨叹时局、伤民苦难等为主旨。罗隐《谗书》多刺时疾,直指统治者。在《龙之灵》中,面对中央权力压迫农民的状况,他以龙为喻,告诫上层统治者,如果采取“涸一川而润下,涸一泽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sup>[8]4129</sup>的做法,恶果将会先于益处到来,造成毁灭性冲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论盛唐诗的特点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sup>[9]</sup>。到了晚唐时期,诗歌受小品文斗争气息的渲染,严羽所评盛唐气象基本消掩,批判、痛斥的气象在文人的作品中崭露锋芒。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罗隐作《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痛斥起义军“邪气奔屯瑞气移,清平过尽到艰危。纵饶犬彘迷常理,不奈豺狼幸此时”<sup>[10]3282</sup>,批判起义军是带着“邪气”的“妖”和“豺狼”,只能“跪望峻山重启告”,哀叹“可能余烈不胜妖”<sup>[10]3282</sup>。虽然对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感到痛心疾首,对下层农民的不幸遭遇深感怜悯无奈,但面对动摇封建王朝根基的农民起义,他的立场仍然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立场,主张维护封建统治。

同样在诗文中写到黄巢起义的皮日休,态度截然不同。他对底层人民的辛酸生活深有感触,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军。从他的小品文《原谤》来看,皮日休有着强烈的民贵君轻的思想: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sup>[8]4327</sup>

皮日休从农民的立场出发,认为即便上天赐予了人许多恩惠,人尚且可以因为微小的灾祸怨天,更何况如今凶狠残暴的帝王?尧舜大圣大德,开疆辟业,德行昭昭,尚且有民讥谤,何况那些德行远不及尧舜的君主?所以,对于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人民以暴虐手段将其扼杀,也是情有可原的。皮日休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他创作了许多歌颂下层人民的诗歌。如《牡丹》诗将农民比作牡丹,是“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sup>[10]3146</sup>,通过对

牡丹的称赞歌颂农民勇于反抗的气魄,与《原谤》中对农民地位的重视一脉相承。同时,面对唐王朝对起义的镇压清除,皮日休也表现着非凡的勇气与胆识,如《咏蟹》诗“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sup>[10]3146</sup>。

陆龟蒙的许多诗文作品也在主旨上明显透露着互渗的倾向。曾群弟在《陆龟蒙〈笠泽丛书〉研究》中对其诗文进行了梳理,见表1<sup>[11]</sup>。

表1 《笠泽丛书》诗文题材、主旨对比

作品的主题或内容	诗歌	散文
灾荒、百姓受苦、官吏残暴	《彼农二章》其二、《五哥·刈获》《南泾渔父》《水国诗》	《禽暴》《记盗鼠》《送小鸡山樵人序》《蚕赋》
时局动乱、社会弊病	《江湖散人歌》	《登高文》
小人之危险	《鹤媒歌》	《马当山铭》
潦倒的生活、怀才不遇的郁闷	《纪事》《江墅言怀》《自和次前韵》《村夜二篇》其二	《自怜赋》
激赏奇物	《二遗诗并序》	《怪松图赞并序》

同一种内容题材在陆龟蒙不同文体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关注社会动乱与慨叹怀才不遇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将批判讽刺统治者、不满社会制度和抒发自身境遇作为创作主旨;由于题材、主旨又影响文体风格,因此看似普通的内容、主旨互渗,也使诗文的部分风格趋向相似。如写社会弊病的诗文皆言辞泼辣,写小人危险的诗文则隐晦暗讽,写不遇之愤懑则长篇咏物或记事等,诗文虽仍保留着各自最根本的体式,但在题材、主旨上不断趋同。

### (二) 艺术手法相互借鉴

除了在揭示民生弊病、批判当权者残暴无能等创作主旨上趋同,诗文创作在艺术手法上也体现了互渗的现象。具体来说,体现在贬题与讽刺、议论与对比上。

1. 贬题与讽刺——诗之技法入文。罗隐的诗文,可谓“几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sup>[12]</sup>,《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sup>[13]129</sup>。贬题是罗隐诗歌的一大特色,《甲乙集》中贬题格讽刺诗歌占很大比例,罗隐一改前人诗

歌尊题格的写法,他常用的手段是将所咏之物作为贬低的对象。如《蜂》诗中暗暗讥刺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sup>[10]2411</sup>,选取的对象是勤劳的蜜蜂,但目的并非赞美而是讽刺;黄河本是滔滔雄壮之景,而罗隐却是选取它的浑浊,以“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sup>[10]2409</sup>来写科举的黑暗。除此之外,像《柳》《金钱花》《蝉》等,多是借此物而贬彼物。这种创作艺术,在小品文创作中也可可见一斑。《龙之灵》中,罗隐借“龙”这一神圣之物比喻统治者,看似高高在上的神灵,实则借此由反面着笔,对其竭泽而渔的做法进行谴责;《英雄之言》中,看似所写内容为“英雄”,实则对“英雄”二字反讽,指责“英雄”行盗寇之事。

罗隐诗歌另一大特色,是托物寓言、借物嘲讽,对暗指之事物极尽鄙夷之态度。他在《华清宫》中写君王楼殿之处歌舞升平,好一幅热闹和平的景象,后两句话锋一转,以愚弄的口吻说“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sup>[10]2421</sup>。又如他的《雪》“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sup>[10]2461</sup>,其中讽刺权贵的戏谑口吻与实际事件造成的沉痛后果形成巨大的张力,诗歌的讽刺之能也发挥到了极致。其小品文更是如此:

且不知隋炀帝迷于楼乎?迷于人乎?若迷于楼,则楼本土木,亦无亲属,纵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故曰迷楼。(《迷楼赋》)<sup>[8]4172</sup>

《迷楼赋》写隋炀帝纵情声色,口吻依旧戏谑:不知隋炀帝是被此楼迷住,还是他沉溺粉黛之色和郑卫之音,才致使王侯将相舞弄权术而朝纲败落?以此来暗示唐末王朝亦将如此颠覆,与《华清宫》讽刺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隐诗歌与《谗书》六十篇有类似表达的比比皆是,此不赘述。

2. 议论与对比——文之技法入诗。皮日休的《鹿门隐书》六十篇小品文,采用《论语》的语录体写法,许多篇章仅一句或一段话;且极善议论,发议论时又喜用设问以及重章复沓的句式。这类艺术特色,在其诗歌中也有迹可循。《鹿门隐书》有诸多作品以短小浓缩见长,但也有部分作品体现出善于铺陈议论的特点,如《当仲尼之时》一篇,他不惜用近四百字的篇幅,围绕一个问题进行铺陈议论,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发端,铺叙议论至当下的政教、侵袭和宗庙的乱象,又于末尾揭示题旨,这种风格与他和陆龟蒙的长篇次韵及他本

人的部分写景诗作如出一辙。比如皮日休曾拜访陆龟蒙,因喜爱陆之居所,便作五言律十首四百字,题为《五言十首奉题屋壁》;再如皮日休泛游太湖,心情大好,总作《太湖诗》二十首,每首五言诗二百字,先长篇记游,铺陈太湖各处景色,再于末尾发出心愿或主旨,《正乐府十篇》《七爱诗》等均如是。

除擅议论的特点外,其文亦常运用对比的手法,比如《鹿门隐书》中有言:

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夫毁人者人亦毁之,不曰自毁乎?誉人者人亦誉之,不曰自誉乎?<sup>[8]4471</sup>

古之隐者,志在其中;今之隐者,爵在其中。<sup>[8]4471</sup>

古之置吏者,将以逐盗;今之置吏者,将以为盗。<sup>[8]4471</sup>

皮日休小品文的重章复沓,与《诗经》的句式如出一辙,而他采用这种句式的最终目的,在于更方便地进行对比或借古讽今。这种对比手法在诗歌中的使用量是相当惊人的,如“高下不惊红翡翠,浅深还碍白蔷薇”<sup>[14]215</sup>、“挑灯犹故岁,听角已新年”<sup>[10]3130</sup>、“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sup>[14]165</sup>等诗句,即具这一特点;又如“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sup>[14]188</sup>、“七雄战争时,宾旅犹自通。如何太平世,动步却途穷”<sup>[10]3117</sup>、“昔时驰道洪波上,今日宸居紫气西”<sup>[14]176</sup>等。喜用对比是皮日休诗歌的一大特色,除反义词对比之外,今昔对比手法的使用在其诗歌中也有一定数量。《鹿门隐书》中的大量古今对比使用,由小品文影响到诗歌中,体现为其诗歌中的大量对比,这是两者互渗现象的具体艺术体现。

### (三) 风格特征相互渗透

唐末时期,往日统一和平、蓬勃繁荣的光辉不再,衰亡、暗淡的气息取而代之,文人墨客都转以细物承载思想感情,多以花鸟虫鱼入作品。方回《瀛奎律髓》道:“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sup>[15]</sup>可见,当时文人创作的内容中,花鸟都大受欢迎,尤以诗歌最为明显。同时在小品文中亦不乏与诗歌相类、相同的意象,大致可归为动物类与植物类。作为文本的表现或暗示主体,意象选取对文本风格有重要影响,故诗歌与小品文所选取的相类意象,可作为两者风格特征互相渗透的一大证据。

#### 1. 诗歌的诙谐、通俗、议论化——文对诗之影

响。唐末小品文善议论,厉害而不严肃,多以怪奇的动物意象作讽,风格明畅,口吻戏谑;唐末诗歌汲取了这种风格,意象选取也与小品文趋同,多采用动物意象,即所谓鸟、禽、虫、鱼,此类意象在诗文中的具体使用又可分若干小类。小品文中出现的动物有鸟、鹰、鹤、蝉、虎豹、鸡、蠹、獬豸、鼠、秋虫(蜘蛛)、鱼、蟹、龙、犀象等,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有莺、蝶、萤、雀、鹰、鸚鵡、蝉、蜂、豺狼、蟹等。由此可见,会飞的动物在诗文中出现率最高,其次是害虫、恶兽。根据种类和内涵倾向,可分为“虎豹狼”“鸟鸡”“蝶蝉”“蠹鼠秋虫”四类。其中用“虎豹狼”意象的诗文如:

梁肉在御,狼贪豕肥。(陆龟蒙《陋巷铭》)<sup>[16]9722</sup>

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罗隐《叙二狂生》)<sup>[16]11198</sup>

门外旌旗屯虎豹。(罗隐《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sup>[10]3279</sup>

纵饶犬彘迷常理,不奈豺狼幸此时。(罗隐《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sup>[10]3282</sup>

此外,皮日休小品文《悲挚兽》等篇章也使用“虎豹狼”意象。使用“鸟鸡”意象的诗文如:

好鸟为之深藏。(陆龟蒙《春寒赋》)<sup>[16]9706</sup>

鸟之啄食,务疾而畏夺。(陆龟蒙《象耕鸟耘辨》)<sup>[16]9722</sup>

莺能言而见欺。(陆龟蒙《楠李花赋》)<sup>[16]9710</sup>

故都会恶少年,则以是时鸟兽其形容。(罗隐《市儂》)<sup>[16]11202</sup>

鱼网不在天,鸟网不张水。(罗隐《空城雀》)<sup>[10]3295</sup>

长被鸡声恶破除。(罗隐《早发》)<sup>[10]3260</sup>

出现“蝶蝉”意象的诗文如:

蝶善舞而相掠。(陆龟蒙《楠李花赋》)<sup>[16]9710</sup>

明日复往,则蜕为蝴蝶矣。(陆龟蒙《蠹化》)<sup>[16]9725</sup>

鸣蝉瘦而蝥蛴肥。(罗隐《吊崔县令》)<sup>[16]11220</sup>

舞蝶傍应酣。(皮日休《酒中十咏·酒楼》)<sup>[10]3127</sup>

蝶恋余香舞好枝。(罗隐《清溪江令公宅》)<sup>[10]3263</sup>

残蝉烟外响。(陆龟蒙《北禅院避暑联句》)<sup>[10]4189</sup>

若道能通照,车公业肯长。(罗隐《萤》)<sup>[10]3278</sup>

无论在诗歌还是小品文中,动物的出现往往包含着负面的意义,暗指昏庸无道的君主或滥用权贵的上层人士。特别是“豺狼虎豹”之类意象,常被作者用来讽喻残暴荒淫的君主;“蠹”“鼠”用来比喻横行于乱世的为乱者。具有两面性的意象是“鸟”“蝉”一类,时而用于文人自喻,如《吊崔县令》中“鸣蝉瘦而蝥蛴肥”的“蝉”是只食露水的高尚士

人,用以表达自身以及崔县令虽出身寒微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高洁品德;时而用于讽喻他人,如《蝉》诗以蝉来讽刺那些本出身寒微但获得富贵就即刻得意忘本之人。少见在诗文共同出现并均为正面的意象是“鸟”,如陆龟蒙的《象耕鸟耘辨》与罗隐的《鸚鵡》,分别以鸟类象征行动迅速和自喻敢于直言。小品文将诸多怪奇的动物作为书写对象,行暗讽、议论之笔,逐渐形成趋向严厉、戏谑风格的动物意象,在文人作诗之时进入诗歌,诗歌主体便也趋向讽刺议论;在小品文中被铺展开过的动物,内涵便也不再隐晦,故用到诗歌中显得浅切明畅。以小品文的叙事、议论、诙谐、奇思入诗歌,诗歌虽短小,却也能见起伏跌宕、萧散爽朗的风格。

2. 小品文的短平快与细腻化——诗对文之影响。历来诗歌短小而古文较长。时至唐末,短诗流行,古文受之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出现大量浅切明畅、善于议论的小品文,体制趋向短小精悍,此时诗文意味相投,风格形似;同时常见小品文有细腻微小的植物描写,与唐末诗歌趋向日常琐细的咏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仕途的坎坷与社会的动乱使得唐末文人喜好咏物,一方面是动物,上到飞禽走兽,下至蝶鸟虫鱼;另一方面文人也喜用植物意象,于无尽的自然中寄寓自己的精神家园。诗歌短小的体制不能满足诗人表达心中的“植物精神”,诗歌所咏之物便在小品文中得以铺陈酣畅。三家的诗歌中植物意象出现很多,小品文中出现植物意象的主要是赋体小品,重复率较高者为“花草”“酒”和“药”。其中用“花草”意象的诗文如:

且桃以夭而薜以华,芍药为赠兮芙蓉可嘉。(陆龟蒙《楠李花赋》)<sup>[16]9710</sup>

陋君采芙蓉。(陆龟蒙《采药赋》)<sup>[16]9710</sup>

暖芳随日薄,轻片逐风回。(罗隐《残花》)<sup>[10]2799</sup>

稚子书传白菊开。(陆龟蒙《忆白菊》)<sup>[10]3190</sup>

千回紫萍岸,万顷白莲村。(皮日休《赤门堰白莲花》)<sup>[10]4328</sup>

再如皮日休《悲挚兽》、陆龟蒙《禽暴》等小品文亦有许多“花草”意象出现。用“酒”“药”意象的诗文如:

寒无以衣,病不得酒。(陆龟蒙《登高文》)<sup>[16]1438</sup>

药杯应阻蟹螯香。(陆龟蒙《酬袭美见寄海蟹》)<sup>[10]3172</sup>

烟缘莎砌引,水为药畦担。(陆龟蒙《京口与

友生话别》<sup>[10]3880</sup>

此外,小品文像陆龟蒙《春寒赋》《中酒赋》《采药赋》,诗歌如陆龟蒙《添酒中六咏》《和袭美春夕酒醒》,皮日休《酒中十咏》《春夕酒醒》等也出现了大量“药”“酒”的身影。与罗隐诗歌的贬物见意不同,皮陆两人的咏物诗内容大多格调不高,多为单纯吟咏、奉和次韵之作,但皮陆两人的咏物、记游的唱和诗,创造了很多植物意象,这类柔和之物不仅渗透他们的赋体小品,也时常渗入直陈时弊的小品文中。如《禽暴》《悲挚兽》等都有“花草”意象出现,且语言如同诗歌,多工整顺口,音韵明畅,极有诗歌短平快之风味。文人诗歌大量喜好咏物,自然细小之物愈发被看见,小品文中对物之描写也愈发细小、细腻,风格趋向平易。

## 二、唐末诗文互渗现象的成因

唐王朝大厦将倾时,心情最沉重的是满怀热血报国之心却屡受打击的寒士,复杂的社会环境在折磨文人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思想深度和技法圆熟的土壤。鲁迅先生认为,存在价值强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sup>[13]12</sup>。小品文能被鲁迅先生评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sup>[13]127</sup>,离不开文人在诗、文创作上多方面的交叉互动。这种互动提高了诗、文创作的文学性,使小品文的文学性与实用性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做法,发展到唐代被称为“破体”。吴承学认为必须首先了解文体风格形成和文体相互融合的内在原因,才能把握批评史上辨体和破体的内涵和意义<sup>[17]113</sup>。陈桐生指出,上古之后文体融合的内在原因,多出于后世作家渴望艺术创新<sup>[18]</sup>。唐末文人“破体”现象的背后,既有外在因素的作用,也隐藏着创作者在黑暗时代下的复杂心态,其中原因归为如下几点。

1. 客观存在的“诗文相通”“诗文一体”,使文人在无意识中“破体”。上古时期诗文并不分开。在审美自觉的魏晋,“文”之概念仍没有清晰界定,是广义的“文”,最具代表性的即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sup>[19]9</sup>,文是与天地并生、涵盖万物的概念。随着后世理论家的文体思想观念不断丰富和文体意识觉醒,文体互渗才由一种自然、自在的

状态逐渐演变为有意识的艺术创新,诗文互渗的现象才得以凸显。对于辨析文体的做法,始终存在不一样的观点,如张融在《门律自序》中道:“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sup>[20]</sup>又如元人苏伯衡《空同子瞽说》:“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sup>[21]</sup>辨体和同体的争论一直存在。由于功用、风格特点的不同,对文体进行分门别类是必要的,但自辨体之初,各种文体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文体的界限并非僵化。“诗文一体”“诗文相通”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所以在诗文创作中双方的交流互动是难以避免的。唐末文人是处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写作,强烈的感情在他们心中一旦触发则难以遏制,从心理流向笔下,则体现为诗文文体界限的难以控制和动态变化。《文学风格论》一书提出,作品风格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决定<sup>[22]</sup>。就唐末诗文创作而言,创作题材和意图趋同、心理因素相近,“诗文一体”“诗文相通”便尤能凸现,部分诗文作品便不约而同地呈现相似风貌,即所谓“破体”。

2. 唐末文人希望通过艺术创新实现“立言”、求官。传统儒家立场下的文人,希望通过作品直陈时弊,在救亡图存、展现自己的治世之能的同时,用之于行卷与求官。唐之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制举为临时设置的科目,而常举以进士科为重,进士科常以士人诗赋定优劣。征文射策、文词取士的科举内容极大推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精进。而唐末的科举考场权臣作梗,吏治腐败,又如时人所说“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sup>[10]4302</sup>,花钱买官却比科考来得更简便。征文射策、以取禄位,反而成了判断一个人立身成功与否的“美德”,出现“扇结钩党,私为盟敌,以取科第;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为谈誉”<sup>[16]5565</sup>的局面。贤德温良之人难以出头,奸佞无良之人天下皆知。此时科考,不问德行才气,文人常凭借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奔走钻营、相互援引,不苦心钻研文采技艺,鲜以士人本身才力见举,结识权贵、干谒行卷却成一大出路。《文献通考》记载,为了干谒,天下寒士洋洋洒洒聚集,奉作品于王公大人马前,若行卷不被接纳举荐,则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可见时人对权贵卑躬屈膝的模样,马端临评此现象为“风俗

之弊至此极矣”<sup>[23]</sup>。即便是罗隐、皮日休与陆龟蒙,也受此潮流影响,编《谗书》《文薮》《笠泽丛书》用来行卷。同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又在小品文中展现出激烈的抗争,罗隐《辨害》一文甚至以“全大去小”之思想,提出要另外匡扶真正的君主;重刻《谗书》时说“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戒来世也”<sup>[16]11193</sup>。《谗书》一出,天下人心为之一动,而罗隐却只落个“《谗书》虽盛一名休”。皮日休在《文薮·序》中说,《文薮》之内容“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sup>[14]1</sup>。陆龟蒙在《笠泽丛书·序》表明丛书是“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sup>[8]4602</sup>。由此可见,小品文不仅是三人彰显自己德行、才能用以行卷的作品,也是寄存着他们“立言”追求的产物。若想借这些集子实现立言和做官的愿望,则作品既要体现作者为官才能,内容贴近国家政治与民生现实,体现出严肃郑重的一面;又要彰显作者的德行才气,作文追求字字珠玑与行云流水,体现出生动活泼的一面。这时,将立象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诗歌因子引入小品文,无疑是拓宽小品文表现力、丰富小品文文学性的一条捷径。在此过程中,小品文激切直陈、议论指摘等体裁因素也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唐末诗歌创作。

3. 唐末寒士以“破体”回应科举带来的意识形态压迫。唐末寒士群体长期的“不遇”,使文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价值,试图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寻找平衡点。人生时光有限,唐末文人为何对科考如此痴情?一方面,李定广指出科举制度的变化影响了唐末文人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晚唐之前的文人志士,多数还秉持着传统儒家观念,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算实现人生价值,科举正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步骤。晚唐之后,广大寒士文人逐渐被上层政治边缘化,逐渐走向为科举而科举,科举本身取代了修齐治平,成了他们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即科举从手段变成了目的<sup>[24]</sup>。另一方面,文人们虽身处乱世而难自保自足,但黑暗没有压垮他们内心的风骨和匡国济世的正义之心,故辗转科场几十载也是亘古不变的家国理念体现。备战考试时环境艰辛,罗隐只道“寒窗呵笔寻诗句,一片飞来纸上销”<sup>[10]4878</sup>来慨叹举子的为难;数十年不得一第,他作“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sup>[10]4884</sup>来自嘲,而未真正放下“语出分明”的创作倾向。以罗隐为

代表的小品文家讽刺谩骂不绝于作品,是因为他们的心态与为人太认真、太执着,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将自己置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sup>[25]</sup>。这一群满腹经纶之人,恰处在一个对知识和文人无情的时代,知识是知识阶层立身之本与存在的意义,将知识与知识阶层相剥离对知识阶层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科举制在唐代的兴盛、繁荣,让知识获得了至高的尊荣地位,但科举没有让这些辗转于知识与官场之间的知识阶层得到同样的“尊贵地位”,相反将他们置于被评价和规训的境地<sup>[26]</sup>。因此,他们用来行卷的小品文在站稳现实主义脚跟的同时,多讥讽谩骂,又汲取诗歌戏谑、玩味的风格,采用诗歌怪奇、诙谐的意象,体现出生动活泼的文学性色彩,诗文创作出现同样的诙谐而庄重、玩味而沉思的创作倾向。知识阶层以文体之“破”来回应被“置于评价和规训的境地”,反抗黑暗与不公的同时,也在“不得不科举”与真正实现人生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

4. 唐末衰颓国势下文人自我发现的成功和失败。在黑暗中挣扎无望时,士人便在乌烟瘴气的人生中寻求宽慰与超脱,从而出现咏物唱和诗与闲适小品文互渗的现象。陆龟蒙前期在《登高文》中说“我中时病,言开怒随”<sup>[8]4529</sup>,说自己的文章皆正中时疾,有言有感辄发,不在意其他;放弃科举后,他作《甫里先生传》,记录自己思想与心态变化的前因后果:

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辄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适平淡而后已。<sup>[8]4578</sup>

此段自述,正表明了陆龟蒙在归隐前后的思想与心态变化。陆龟蒙曾狂傲不羁、遇事辄喷薄而出,受科举与世弊蹉跎后,他的心态最终归于平淡。皮日休前后心态变化也很明显,代表其前期心态的《皮子文薮》,多是立论深刻之文;后期以与陆龟蒙的唱和诗集《松陵集》为主,多为风花雪月、松酒竹菊的泰然之诗。多年不第的疲惫总需要消解,加上小品文重地是在南方水土之上,文人容易借山水自然浸润失落之心。激烈的斗争之间,诗歌上的咏物、唱和风貌慢慢转向小品文,为闲适小品文的诞生作足准备。当小品文要从战斗型转型为闲适平淡型时,其创作技法、题材来源等便需要大量新鲜血液,最好的活水源头则是

咏物唱和诗。由于这种借鉴,闲适小品文多铺张吟咏,所以向来被视作“花瓶”,实际上它同样存在有思想价值的闲适之作。如陆龟蒙《记蟹》,议论内容颇多,从蟹类洄游的现象到圣人之道之阐发,将蟹和海之关系分别对应到现实,对应到圣人、书籍,既见其微言大义,又显其后期洁身自好、追求自身精神品质的倾向。这恰也证实文人心中另一种追求,它超越了闲适之作“安慰”的功能,转而发挥其保持本心、真我的作用,但终究他们没有成功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用罗宗强的话来说,无论是魏晋风流、唐末还是明末的文人心态变化,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自我发现成功与失败”<sup>[27]</sup>,即文人意识上成功和行为上失败之间的矛盾,所以陆龟蒙学习自己咏物唱和诗而作的闲适小品文裹挟着深刻思想,消解愁苦心态的诗、文工具,最后呈现为彰显自我个性的工具。

### 三、唐末诗文互渗现象的意义

唐末作为承接唐宋的重要枢纽,此时诗歌与小品文互渗的成果,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意义和影响由以下几方面可见。

#### (一)唐末诗文互渗是对前人文体精神的承接与突破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唐末文人将小品文犀利的文风、议论时事的题材、讽喻的主旨、议论与对比的技法引入诗歌,是对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创作精神的继承;将诗歌中草木、怪奇动物意象引入小品文,是韩愈古文运动在唐末的发展与突破。讨论文体互渗不能不触及文体的高卑问题,诗在众文体中毫无争议地居于首位,它可以向其他文体渗透,而其他文体则不得反其道而行之<sup>[28]</sup>,然而历来韩愈“以文为诗”的评价高于杜甫“以诗为文”,打破了“以高行卑”的定势,唐末“以文为诗”自然接续了这种精神。同时,这并不说明“以诗为文”的不可行,只是杜甫“以诗为文”并非典型,杜文远逊其诗,所以顺便拿来作为韩愈“以文为诗”的陪衬<sup>[17]</sup><sup>146</sup>。观唐末诗文互渗现象,“以诗为文”为唐末小品文的成功与不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视为“以诗为文”成功的典型,也证实了文体互渗“以高行卑”体势的奇异效

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sup>[19]</sup><sup>269</sup>,认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sup>[19]</sup><sup>269</sup>,又指出各种文体“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sup>[19]</sup><sup>278</sup>,为文体互渗提出了一个“度”,即在保持本体风格的基础上,则可与其他文体互动交流。唐末诗文互渗之作大体秉持此原则,故诗文互渗时诗歌、小品文仍能保持各自应有的面貌,诗、文创作声气相通而有新变。

#### (二)唐末诗文互渗对两宋诗文词创作产生影响

唐末诗文互渗最终形成了诗文创作的独特风貌和体式,对两宋不同文体创作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对宋诗的影响。宋诗内容的哲理化、生活化和细节化走向,议论化、主理化和散文化特色,与唐末诗文互渗后形成的体物议论、抒发人生哲理和讽刺现实的风貌存在着一定的血脉关系。其次,唐末小品文作为上承中唐韩柳、下接北宋欧苏古文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链,诗文互渗在其中起到转化古文创作倾向的作用:韩柳古文运动修正否定乐正教化、文关兴衰的旧说,主张修身正心、得人进贤为治国平天下之关键<sup>[29]</sup>,宋代古文运动更加倾向发掘、发挥诗文批判现实的功能<sup>[30]</sup>。讽刺与批判之功用可以说被唐末诗文发挥到极致,唐末诗文共同呈现出批评谩骂、讽刺现实的面貌,是两种文体交流互动的结果,因此,唐末诗文互渗无疑对宋代古文运动提倡诗文的现实功用有所铺垫。最后,唐末诗文互渗对宋词创作内容有重要影响。宋人填词用唐人诗句是当时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其中化用唐末诗句尤多<sup>[31]</sup>,宋词化用唐末诗句后风格清新典雅,成就不少名篇佳作。细观其化用的唐末诗句,可发现词中诸多物象与唐末诗文互渗造出的意象也有“近亲关系”,如花、鸟、蝶、虫、酒、雨等,或将严肃的意象舒缓化,造成小巧、清凉的词意境,或直接采用部分已成凄冷、风雅意味的意象。

#### (三)唐末诗文互渗推动后代文体互动发展

“破体为文”在宋代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家的集体选择<sup>[2]</sup><sup>138</sup>,破体现象虽显目于宋代,实则唐末已见端倪。文体发展与兴替,也是各种文体此消彼长、相互融合的过程。唐末小品文创作大胆破体,到宋代或部分与笔记体融合,笔记驳杂多样,创作手法不拘一格,可看作唐末至晚明小品文的

过渡;小品文在晚明成一大气候,且笔记小品文占据一大部分,又可见笔记与小品文的消融与生长,一环扣一环的文体发展,与唐末文体互渗密切相关。晚明小品文以诙谐之笔写浩然正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与唐末讽刺小品文一脉相承,如今观之,其实两者是互补型。唐末闲适小品文格调稍低,但开启后世同类创作之端,其中赋体小品文可作晚明笔记小品文的先祖。晚明笔记小品文是唐末诗文互渗发展到后世的巅峰,由更多文体汇聚而成,晚明小品文打破文体界限的做法更为大胆主动,但失之于沉,太过沉浸艺术化;唐末讽刺小品文缺少艺术性,但实用性高、积极入世。晚明小品文习气虽由多方促成,但其人标举唐宋,对唐末作品也固有一定继承。在此需说明一点,明人选苏文而不选唐末文,大概因为唐末诗文互渗是发端、探索期,且成就较高者是猛烈的刺世之作,与晚明人审美不符。而诗文革新发展到苏轼,可谓成功的巅峰与集大成之处,苏轼诗文之洒脱某种程度上与晚明人逃避现实相合,所以晚明标举宋文和苏轼,是因为宋时文章创作已经趋于成熟圆润。总之,宋代以后破体为文现象突出,宋代成为破体之争的特殊转型期,都与唐末文体互渗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唐末破体现象的推动。

#### 四、结语

总而言之,唐末诗文在创作主旨、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上趋同,首先是创作者无法避免诗文相混,其次是文人有意渴求艺术创新,最后是唐末寒士群体对人生与现实复杂、深刻的思考使然。除上文所述以外,唐末诗文互渗本身与后世词的韵趣、晚明小品文清晰密集的逻辑、晚明诗文幽奇的词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唐末诗文互渗亦是文人“穷则通变”的一种做法,促使唐末诗歌与小品文成为诙谐与庄严的结合体,成为文体互渗成功的典范。诗文互渗打破文体壁垒、开拓文学创作新可能的做法,对后世诗文创作和文体辨析产生深远影响。

#### 参考文献:

[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J].文学遗产,1996(6):24-33.

- [2]张仲谋.论文体互动及其文学史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3):133-145.
- [3]吴中胜.诗文之辨[J].中国文化研究,2012(4):46-54.
- [4]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3.
- [5]李伟.晚唐五代士风嬗变与古文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304.
- [6]李锋.论晚唐小品文体意识的形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84-90.
- [7]李定广.唐诗的最后一次新变:论唐末近体诗的艺术开拓[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1):64-72.
- [8]倪文杰.全唐文精华[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
- [9]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6.
- [10]王启兴.校编全唐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 [11]曾群弟.陆龟蒙《笠泽丛书》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2.
- [12]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57.
- [13]鲁迅.鲁迅精选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 [14]皮日休.皮子文藪[M].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5]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M].合肥:黄山书社,1994:910.
- [16]周绍良.全唐文新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17]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8]陈桐生.上古文体趋同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3):33-40.
- [19]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729.
- [21]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428.
- [22]歌德.文学风格论[M].王元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8.
- [23]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269.
- [24]李定广.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J].学术论坛,2006(2):145-149.
- [25]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J].中国社会科学,1991(2):147-159.
- [26]张宇慧.苦吟中的“自我”重构:对中晚唐苦吟诗风的另一种解读[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1(2):138-143.
- [27]罗宗强.因缘居存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69.
- [28]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8(5):149-167.
- [29]张建德.小品的突破与局限: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晚明小品的价值[J].中国文学研究,2000(4):58-63.
- [30]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15.
- [31]李定广.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J].求索,2006(11):170-172.

# 在场与不在场：“庄周梦蝶”的文学成像

邓 歆，白宪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中国文化有着重“象”传统，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由“象”到意象的生成路径，以这些作品为母题的图像则在原有基础上多了成像的步骤。文学成像着眼于研究文学作品与图像的互动和转换。作为《庄子》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庄周梦蝶”一直为后人所熟知与再创作。“庄周梦蝶”作为物象组成的元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意趣，并经历代文人笔墨而寓意更丰。当其表现为图像时，与相关作品的互动机制中始终贯穿着文人审美与文人趣味，因此呈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漩涡。

**关键词：**庄周梦蝶；元图像；文学成像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12

重“象”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审美特点与追求。《周易·系辞》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象”与意理的表达、情感的抒发向来联系密切，文字与“象”所对应的画面感也具有深厚的渊源。由“象”衍生出的意象是不尽于“言”也不外于“言”的“象”与“意”的统一，承担了语言的部分描述和抒情功能<sup>[1]</sup>。当表达内容较抽象或传递情感较委婉时，可以用具体的“象”来说明。而在作者试图以“象”表意和读者以“象”体志的过程中，因为主体情感与思想注入了客体，使得意象成为“美的具体形态”<sup>[2]</sup>。意象除了具有审美属性，更有实在的成像的可能性。赵宪章提到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一种“象思维”的语言，更是经由图像与世界发生逻辑联系<sup>[3]</sup>，文学赋予了“象”诗性智慧，使之能反映文人眼中感性的世界，可以说意象作为文学语言的产物，本身具有象形以反映世界的属性。由此看来，“象”以文字为载体时，常为文学中的意象；而意象以线条色彩为媒介，则成为图像中的意象。通过文字编排形成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通过成像来反映哲理，产生艺趣。而由于道不可言说，《庄子》选择用三言来体意尽道。其中，寓言

因虚构故事、寄大道于他人言语而最具形象性，容易使读者在脑海中呈现出情节画面，诞生了诸如“庄周梦蝶”“濠梁之辩”等广为流传的原象与故事，又经后世文人加工衍生出大量有关诗词、戏曲，使得“梦蝶”“鱼乐”等成为文学史的经典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随着艺术载体的丰富，有关《庄子》原典的画作也数量可观。

“文学成像”即“文学图像化”，研究的对象是由文学作品生成的图像艺术，研究的问题是寻找“语象的图像化”的规律，即语言生成（转化）为图像的学理机制<sup>[4]</sup>，本质上是寻找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两种互动机制：一是由文到图，即画家对文学作品的意象进行艺术加工，将自己的阐释融入图画中；二是由图到文，则是观者对图像及其背后文学内涵的美学审视。两者虽方向和主体不同，但处于同一艺术环境和文化传统中时仍能有超越时空的交流。因此研究意象的文学成像能够明晰文字和线条两种载体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探寻其中的文人趣味、审美取向，也有利于逆向推进对原典的深入解读。

收稿日期：2025-04-15

作者简介：邓 歆(2001—)，女，福建三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白宪娟(1981—)，女，山东泰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 一、“庄周梦蝶”元图像分析

米歇尔在《图像何求?》一书中指出,元图像是一个图像“被用作表现图像本质之手段”“可以成为一整个话语的基础隐喻或类比”<sup>[5]xiv-xv</sup>。笔者认为元图像来源于原典中具有能为后世再创作,乃至成为一个母题这种潜力的经典内容,是对原文富有形象性内容的浓缩描述。《庄子》运用了大量寓言,其中《齐物论》谈到的“庄周梦蝶”的故事流传颇广,无论是后世的各类梦蝶图、诗,还是化蝶故事,追根溯源都来自这个寓言,“梦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意象之一。可以说《齐物论》最早赋予了“梦蝶”哲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其物象也成为这一母题的元图像。

### (一)“梦蝶”的元图像组成

文字脱胎于图像,仍保留图像的孑遗<sup>[6]</sup>。《庄子》一书最核心的元图像就是“道”代表的虚无乃至“无无”的境界,“梦蝶”也好,“鱼乐”也罢,都是在以三言说明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次级语象。综观全书对“道”境界的描写,或许可用“忘”代表其中一方面的特点。在“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sup>[7]40</sup>之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sup>[7]44</sup>(《齐物论》),需要忘却万物之区别。要想供养好自己的生命,则需“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sup>[7]120</sup>(《德充符》),即忘却外形的缺陷。《齐物论》还提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sup>[7]23</sup>更是强调了应该舍弃、忘却一些东西以实现思想的自由。由于这部分和“庄周梦蝶”分别位于篇首篇末,相互呼应,因此南郭的“吾丧我”或“吾忘我”<sup>[7]24</sup>精神与庄子的蝶之梦有相通之处。

要分析“庄周梦蝶”的元图像组成,可以借鉴语言学确定语素数量和单位大小的替换分析法,将“庄周”“梦”“蝶”分别替换成其他字词,发现这三个词对整个词的意义都有影响,说明三个词均具有成就整体含义的作用。因此这一故事的元图像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次级单位——“梦(中世界)”“蝶”和“庄周”。根据朱志荣对意象及其组成的概念定义,物是实在的,形是物的轮廓,象则空灵剔透。物象既非质也非形,而是指物的非实体性,无迹而可感,是人们眼中之象或耳中之象,是人们感觉中的状貌<sup>[8]</sup>。如果认为《齐物论》

中对“庄周梦蝶”的整体呈现是这一意象的元图像,那么这三个次级单位便是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物象。

1. 觉梦之辨与“梦”的物象。世俗观念中,梦境被称为“那边的世界”,醒后的世界被称为“这边的世界”。这种观念下梦中的图景总是模糊、虚无、不切实际的。庄子将梦境拉入现实,打破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他对梦境秉持着“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sup>[7]56</sup>的态度,人们身处梦中时,只会视梦境为真实。说梦虚幻,是以醒后的真实为参照标准,如果长睡不醒,梦境就成为一个恒久的现实世界。梦时以梦为真,醒后又觉梦幻,且“觉梦之分,无异于死生之辩也”<sup>[7]61</sup>。在庄子看来,既然生死都是一体的,那么清醒和糊涂、梦境和现实之间更没有跨不过的厚障壁了。许多人执着追求自以为的清醒境界,即使梦见能使自己舒畅愉悦的事,也会觉得只是在梦境而非现实,因此时常不满足,忧虑在怀,结果与自己向往的清醒之境界背道而驰,“皆未寤也”<sup>[7]56</sup>。而圣人明白“不觉醒的一生就像一场大梦”<sup>[9]</sup>,懂得用梦或是思绪的游走弥补现实之遗憾,从而“自喻适志”。

因此可以认为,庄子希望人们忘却觉梦之辨,将美好的梦境也视为现实。这种回到宇宙之初混沌的、亦真亦假的道之境界便是梦形成的象,梦中之景则是该物象最直观的画面。

2. 物我之辨与“蝶”的物象。《逍遥游》中鲲鹏游于北溟,鹏徙于天地,学鸠抢榆枋,庄子认为万物皆顺天性而自适其适。郭象评论道“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成玄英亦言“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sup>[7]6</sup>,可见庄子用自然物象进行说理无关优劣爱憎,只在意选取对象的天性是否和自己论证方向一致。加之《庄子》一书体现出深厚的原始思维,因此在对“蝶”的物象成像进行分析时,不应纠结体积大小和褒贬之间的关系,而应着眼于蝴蝶的天性,寻根溯源,解读其文化内涵。

原始社会由于认识水平低下,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的观念,将人的生命力和思想附在其他生物上,认为人与万物能相互转化。《“庄周梦蝶”文化渊源探考》谈到苗族就以蝴蝶为祖先,古歌《妹榜妹留》和《十二个蛋》讲述了蝴蝶诞下的十二个

蛋化为世间万物,其一便是苗族始祖姜央的故事<sup>[10]</sup>。可见在一些原始图腾崇拜中,蝴蝶代表了生命的起源和种族的延续,具有活力之美。孟瑁《岭南异物志》中也有对蝴蝶的描写:“有人浮南海,泊于孤岸。忽有物如蒲帆飞过海,揭舟。竟以物击之,如帆者尽破碎坠地。视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啖之,极肥美。或云,南海蝴蝶生于海市,其形态变化万端,又名‘百幻蝶’。”<sup>[11]</sup>这里之所以认为蝴蝶能有万般变化,或许是因为其幼虫与成虫形态差别大,且翅膀轻薄、四肢纤细,看上去比较脆弱,给予了蝴蝶变换外形的可能。

由此可见,人类在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蝴蝶的种种特点,并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寄托其中。无论是蝴蝶生人还是化人,这都与庄子所言“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比之谓物化”<sup>[7]61</sup>不谋而合。先人认为蝴蝶化人,庄子则陷入人化蝴蝶还是蝴蝶化人的意识混沌中,可知“吾丧我”精神除了用于统筹梦境与现实,还用于统筹自己与他人他物的分歧和区别。庄子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sup>[7]35</sup>(《齐物论》),疏曰:“若审能见他见自,故无是无非也。”<sup>[7]35</sup>人们秉持是非的观念,是因为有“成心”,而“成心”的来源就是“我”。若能抛却“成心”,那世间就不会有对错标准,不会与持相反观点的对象进行论证,甚至不会过于在意自己与他人他物的区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蝶周不分其实指向共同的道的境界,物化是万物抛却外在区别,实现最初共生状态的途径。忘却自身与外物的区别并非意味着自我的消失,而是将自己的意识也放在外物身上以更好地体悟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丧我’的终解指向齐物我”<sup>[12]</sup>。

庄子谈物化为蝶,使原本古朴的代表生殖、生命崇拜的物象成为世人人生思想的寄托。蝴蝶形态的转变和生命的延续,实际上是人类回归自然、探寻生命最初的逍遥之貌。蝶的物象代表了薪火相传的生命,逍遥自由的理想和物我齐一的境界。

3. 出世入世之辨与“庄周”的物象。意象是“不外于言亦不尽于言”的形象,但从“梦”“蝶”来看,前者是生活中常见行为,后者是自然界一般生物,似乎都没有不能言尽的地方。而最初同时给这两个物象赋予深层意义、蒙上神秘面纱的,则是行为主体庄周。庄周本人在书中始终是道的体验者、宣扬者。用道家思想指引生活的一个

体现便是出世和入世的平衡,这也成为后世文人青睐的生存之道。《人间世》从列举的故事和总结的道理来看,似乎都表达不作为、出世的倾向:颜回想要辅佐卫君,孔子的建议是“心斋”,到达虚无的境界;对于因将出使齐国而内心焦灼的叶公子高,孔子的告诫是“无迁令,无劝成”;社树无用,才得保全生命,不被砍下制作工具。但仔细思量,会发现这些例子并非指向完全避世,也有入世的痕迹:孔子劝颜回“入则鸣,不入则止”,若是君王能接受劝谏,那自然要敢于直言;孔子让叶公子高不要因过于追求完成使命而对两国传话的内容有所改变,既是想让他的焦虑有所缓解,也是希望两国的关系顺应自然发展趋势,不因人为而改变甚至背道而驰;社树也是寄托于社才得以存活,换句话说,使它得以因无用而存活的恰恰是人们对它有用的期待。题注曰:“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sup>[7]72</sup>。由此可窥见出世、入世并非对立,而存在两种转化关系:一种是入世之后因现实黑暗且无力改变,只能或以“心斋”待世或隐居避世;另一种则是出世和入世共生,如被后世认为继承了道家品质的陶渊明曾作诗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若在深山隐居自然宁静,可诗中的这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隐士般的怡然自得则建立在自身所在的闹市和内心的宁静之比较中。无论哪种,都可看到出世、入世两种态度的相辅相成与相伴相生,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sup>[7]85</sup>,实现出世和入世的平衡。这种思想是“庄周”所代表的道对人们处世的指引,也正是在《庄子》这本书所构建的道的域中,各种物象得以焕发哲学光芒。

## (二)“庄周梦蝶”元图像的艺术生命力

作为《庄子》书中的经典寓言,“庄周梦蝶”自然是为阐释道而诞生。而“道不是知识,也不是一种概念,道也不是对象物,所以道无法用语言的指称功能来指称”<sup>[13]</sup>,无论是“道可道,非常道”,还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都昭示了这种思想的难以言说。那么就有必要通过文字符号生成画面,清晰说理。庄子通过“梦”和“蝶”的组合,营造了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氛围,引导人们带着对两者的美好印象体悟道的境界,从而把象的生成与道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也为“梦蝶”能够成像提供了可能。在原文里,“昔者”一词指明了时间,

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sup>[7]61</sup>生动地展现了梦醒之初的懵懂状态，令读者身临其境，仿佛入梦化蝶的是自己。“庄周梦蝶”的生动性直接体现在故事内容的极具画面感，本质上则指向了其文字传达内涵的多样性、趣味性和能用图像呈现的可能性，即为文图建立关系搭建了桥梁。因此相较于其他更晦涩或更浅显的寓言，后世多对“梦蝶”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梁祝化蝶”可以看作是对“梦蝶”反映的生命观、齐物观的继承，不过更添爱情元素；如一些梦蝶绘事图体现了画家和欣赏者暂时忘却现实、梦中作乐的态度，是积极方向的改造，但这种身临其境而产生的忘我感觉和原典语言是相似的。

“庄周梦蝶”里的庄周不完全等同于庄子本人（如上文所谈他也可以是元图像的组成元素），这一寓言里完整的“庄周”既来源于庄子本人的思想，也来源于读者的体验。如果把梦蝶看作庄子对个人经历的复述（这也是其寓言的一个特色），那么“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sup>[7]61</sup>也可以翻译成“不知道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呢”。由“周”到“我”，既转变了叙述视角，也搭建起由叙述者兼故事主角到叙述接受者的桥梁。如此一来，“庄周”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透明，也更能传递自身感悟，调动他人情感。庄子通过自身在寓言里的在场，发挥指示和置换作用，既给予读者将自己与他进行置换的机会，又使捉摸不透的道在故事里沉淀下来，让读者拥有了体验感和真实的情感，让一个看似平常的寓言蒙上诗性色彩，并给予后人发挥空间。

## 二、庄子的在场：

### 梦蝶绘事图与梦蝶诗

《庄子》图像的分类标准多样，比如赵宪章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提到的：文字出现之后的文本时代则表现为“语图分体”，特点是“语图互仿”；宋元之后的纸印文本时代表现为“语图合体”，特点为“语图互文”<sup>[14]187</sup>。值得一提的是，在收集图像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语图关系的时间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以“语图互文”为主要

特点的时期也不乏“语图分体”的作品出现。赵宪章本人也提到这是“关于语图关系的静态分析”<sup>[14]187</sup>，是历史回溯的一种方法，因此若想打破时空，则要以图像自身特点为分类标准。由于“庄周梦蝶”成像发展过程离不开历代文人雅客根据自身体验和艺术功底而进行的加工，“人”的意志、取向是成像的最大变量，反映在梦蝶图上便是庄子形象的有无。因此以庄子是否在场，即这一形象是否出现为分类依据，探究两类梦蝶图的特点。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里就言、象、意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sup>[15]</sup>三者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掌握其中一方，就能生发联想至另外两方。汉字从依类象形到逐渐简化、抽象，原先模仿的属性便让渡到图画上，使得后者具有象征意义。以“梦蝶”为母题的文学作品和绘事图呈现出“语图互仿”的特点，即它们往往能各自独立地表达完整内容，传递诗人和画家的情感，而两者的内涵又能相互映照，使得庄子、梦、蝶联系得更加紧密，成为一种意象组合。

#### （一）自然与隐淡：梦蝶绘事图举例

由“庄周梦蝶”元图像发散、最具有独立性的图像当属绘事图。随着图画史的发展，庄子的外在形象逐渐确定下来，常表现为一位蓄胡长者。此母题绘事图的基础元素就是庄子和蝴蝶，加之中国美学注重整体性，所以画家往往就做梦时除庄子外的客体，即外部环境和蝴蝶进行不同的创造：一是注重场景的自然性；二是省略甚至隐去蝴蝶的笔墨。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分别分析陆冶《梦蝶》和沈周《庄周梦蝶图》的审美趣味。

明代陆冶《幽居乐事图册》的《梦蝶》（见图1）画出了庄子伏石入梦的场景，旁边两只蝴蝶既是现实实在，也是庄子梦的对象。观者所见即画中人梦，不禁要令人以为所谓的画中世界才是真实，那边的庄子正梦见观者看他梦化蝴蝶。趴伏的动作既体现了庄子做梦时安逸的状态，也衬托出自然之大、人之渺小。画家添加的石块、柳枝、远山等物，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代表淡泊、宁静情怀的典型元素，尤其对山的描绘看似无心寥寥落下两笔，实则与近处浓墨画成的石块和蝴蝶形成对照，一张一弛间造物主的成果均展现在纸上，使得整幅画卷的自然气息更加浓厚，“庄周梦蝶”也仿佛有了现实依托。



图1 [明]陆冶,《梦蝶》,绢本设色,纵29.4厘米,横51.4厘米,故宫博物院

在文学活动之初,三象之间具有随机性,即物象间的组合、语象的描绘对象是自由的,一如《齐物论》中“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和“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时“彼我均也”<sup>[7]23</sup>的状态。随着文学活动愈发频繁与复杂,“梦”与“蝶”,甚至与“庄子”的语象结合愈发亲密,最后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意象。这使得画家有时倾向节省蝴蝶的笔墨,令观者一不小心便容易忽略,从而起到类似留白的效果。沈周《庄周梦蝶图》(见图2)中的蝴蝶不似在其他梦蝶图里成双成对,而是形单影只,并且仅有极淡的几笔,需细细观赏才能发现其存在。观者原本就因为素雅的画风和上方的题诗想到或许此图描述的便是庄周梦蝶的故事,此时突然发现蝴蝶,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眼中所见还是自己脑补的庄子化蝶。这种视觉与感觉的错位是题诗“我画梦中梦”的混沌朦胧在观者视角的展现。



图2 [明]沈周,《庄周梦蝶图》,纸本水墨,纵52.6厘米,横3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 (二)“庄周梦蝶”的意象固定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品中不乏对意象创作的论述。陆机在《文赋》中提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sup>[16]20</sup>,说明意象重在入思于象、入情于象。“诗缘情而绮靡”<sup>[16]29</sup>,诗歌是生发意象的主要工具。如果说《庄子》是“庄周梦蝶”意象固定的肇端,庄子本人已经赋予其一定哲理,那么后世的诗歌创作就是在此基础上将世人情感融入原有意象,“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sup>[16]25</sup>,从而形成丰富的意象系统。因此,研究“庄生梦蝶”的意象固定离不开对梦蝶诗的理解,离不开经诗歌浸润而生成的传统情结。

根据李波在《诗文中的“庄周梦蝶”意象》一文中的整理,后世文人对“梦蝶”行为的寓意寄托进行了丰富,使其成为一个经典意象<sup>[17]</sup>。总体来看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延续老庄思想,展现逍遥生活;二是另生情思,且以消极情感为主。这两类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梦观照现实,前者体现的是因为现实不可改变,无奈只能独善自身的精神状态,向往化蝶后自由无忧的生活;后者创作原因往往是对现实不满,抒情方式或平淡或激烈。如郑思肖的《庄生梦蝶图》中“素来梦觉两俱空,开眼还如阖眼同。蝶是庄周周是蝶,百花无口骂春风”暗含着对国破家亡、山河不在的无力与愤慨,这显然不是单纯继承了庄子创作时的思想。以梦为逃避现实的方式,以蝶为自己的理想状态,是梦蝶诗对“庄生梦蝶”原语意的新阐发。

## (三)由诗入画、以画映诗的图像转向

图像转向“是由词到象的转向……每一次都涉及一种特殊的图像”<sup>[5]xi</sup>,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成像所指相同。米歇尔在《图像何求?》中论述图像转向时曾提到,它既是语言的又是视觉的转义,是言语、视觉、图案设计和思想的一种比喻。换言之,它是对众多形象进行反思的二级形象<sup>[5]10</sup>。综观后世以梦蝶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庄周梦蝶”意象已不再单纯是道家思想的寄托,而成为文人某一时刻情怀的承载。在诗歌的浸润下,人们完成了对元图像的理解更新,学会用自己的思想对图像整体或着笔较少的部分进行审美完善。画家和观者对“庄周梦蝶”原典的理解更加多元,使得这个意象组合更加紧密,以至能够跳出文字,展现在图画上。这样的图画不是为了解释诗作而生成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也是文字外思

想观念表达的一个媒介。而庄子的在场又给予紧密意象组合松弛的可能,即略去一部分也不妨碍观者对梦蝶寓言产生联想,反而更生艺趣。由此可见,“庄周梦蝶”绘事图的独立地位、仿诗作用来源于日益丰富的“梦蝶”意象系统,庄子的在场乃至只有他的在场(如对蝴蝶几乎没有着墨)也是意象固定的结果。由哲学、文学的“意”趣到美学的“艺”趣,这是“庄周梦蝶”在“语图分体”状态下的“成(意)象一成(画)像”之路。

### 三、庄子的不在场： 诗意画和题画诗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诗画一律”的概念,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意象的发展带来了图画对象的深入和丰富。赵宪章认为宋元以后,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文图关系呈现“语图合体”的趋势,其中的一种表现为“诗画合体”的题画诗和诗意画<sup>[14]187</sup>。苏轼曾夸赞“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sup>[18]</sup>,且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四美合一”,因此可将诗意画和题画诗看作一体,归于文人画的范畴,从文人画的审美标准探究庄子不在场的诗意画和题画诗之间的关系。

#### (一)本心与别意:梦蝶文人画举例

中国古代讲究“诗画同源”,国画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有款识,其组成部分便包括题画诗。这为理解图像寓意、进行联想提供了条件。“庄周梦蝶”母题下的诗意画常常只着眼于蝴蝶,将对庄子 and 梦境的描写置于题诗之中。如蒋廷锡《滕王蝴蝶图》的款识为:“烟圃吟秋兴不孤,花间残梦绕庭芜。秋意坐掩南华卷,闲写滕王蛺蝶图。拟宋人笔意,蒋廷锡。”其中,“残梦”“南华”与“庄周梦蝶”的寓言相对应。又如董小宛《彩蝶图》的款识中“始信庄周梦不空”也昭示图与题诗、母题的关系。且《滕王蝴蝶图》题诗的落款人为蒋廷锡本人,《彩蝶图》题诗的落款人为“青莲女史”,即董小宛的别号,说明这两幅画自绘画伊始就带有表现寓言的目的,题诗是为了弥补庄子 and 梦境在画中的缺场,代替庄子发挥指示道家思想的功能,从而使主题更加完整鲜明。由此看来,一般情况下的梦蝶文人画体现出文人“我笔写、画我意”的特点。

在这些文人画中,由于人们第一眼往往看到的是画而非题诗,且图像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可以认为,文人画中,画是彰显母题的主体,诗则锦上添花,增加文化气息。诗画合体,相得益彰。也正因为有了诗对观者的提示,画家便可以跳出这类主题画常见的艺术手法,转而将自己或喜或悲的心态和审美取向寄托其中,以不同的色彩装点梦蝶图。

但有时诗画地位会颠倒,即诗显母题,画附和诗。张旭在《中国古代图像中的“梦蝶”意象研究》中提到一种现象,有的蝴蝶画若没有题诗,看上去与“庄周梦蝶”并无联系,并且题诗都不是画家所写,因此有牵强附会之嫌<sup>[19]</sup>。他列举了北宋赵昌的《写生蛺蝶图》和明代戴进的《葵石蛺蝶图》。两者都因后人的题诗而拥有了道家色彩,若删去题诗,丝毫看不出画家本意是否为表达死生如一、万物齐一、道通为一的思想。其观点不无道理,以《写生蛺蝶图》为例,题诗“粉翅浓香共扑春,林园仿佛落花尘。谁教草露吟秋思,惊觉南华梦里人”似乎能表明这幅画与庄子思想有联系,但创作题诗的则为元代的赵岩。根据两人的生平经历,赵昌在绘画领域享有盛名,以至不肯轻易为人落墨,到了晚年也有较强的财力能够将自己流落的作品一一买回,从其业界声誉和个人性格来看赵昌并不需要借道家思想抒怀<sup>[20]</sup>。而赵岩一生潦倒,早年遭遇诽谤退居江南,晚年醉病而卒,仅存的一首小令写道“那一个与祝英台梦里为期”,与他的这首题诗情感一致<sup>[21]</sup>。因此,不能单纯地认为《写生蛺蝶图》属于梦蝶文人画。这类图画因为题诗的误导性指向而使得“别家心意”也被视为原作者的态度。

#### (二)图像暗示和观与被观的角色转变

为何一些图画只有蝴蝶的存在,凭借着题诗便可将其归纳为梦蝶图?此类梦蝶图能带来什么样的体验?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或许可视为同一。相比于绘事图,文人画由于题诗的点缀而更具有文学性,同时因融入画家兼诗人的巧思而更具有诗性智慧。由于创作者是文人,“庄周梦蝶”的故事深入人心,因此即使图像元素有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观者也能通过蝴蝶的暗示想起这个寓言,而题诗则证明观者的猜测方向与画家、诗人一致。庄子的不在场使得观者在欣赏的过程中容易把庄子替换成自己,由置身事外到身临其境,从而由观转向被观。米歇尔根据迈克尔·弗里德总结的绘画“原初习惯”认为,画的欲望就是要与观者交换位

置,使观者惊呆或瘫痪,把他或她变成供画凝视的对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杜莎效果”<sup>[5]37</sup>。原典为庄子梦蝶,本就易使观者陷入如梦似幻的情景中,而庄子不见,梦到的蝶仍在,很难不让观者认为自己正在成为庄子本人,透过他的眼睛看到其梦中之景。至于这个梦,或者说蝴蝶指向的是闲适自在的还是消极苦闷的精神状态,既可以取决于画家、诗人的创作暗示,也可由观者自我意志决定。庄子的不在场给予了诗人、画家以及观者更加自由的对原思想、元图像的阐释与审美空间。在这一方小天地里,人人都能泼墨,创造不同色彩的梦境。

## 结 语

“庄周梦蝶”的文学成像研究,实际上是探究这一寓言从文字到图像转向过程中,如何经过艺术加工使其内涵与审美价值得以丰富。白宪娟在《明代〈庄子〉接受研究》中提到,戏曲、小说的文人化属性表现为文人题材比重的增加、抒发个人情感目的的鲜明<sup>[22]</sup>。综观梦蝶“成象—成像”的过程,可以发现文人性始终贯穿其中。就成象来看,《文史通义校注》中提到:“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sup>[23]</sup>《庄子》中的物象取材于自然,加上作者的巧妙构思,形成了具有审美价值和哲学内涵的物象,又经后人因抒发或积极或消极情感的需求而进行的添砖加瓦,诞生了诸如“梦蝶”的种种经典意象,并逐渐形成系统。就成像来看,绘事图受诗影响而独立,文人画以诗点题,都离不开文学作品的浸润,且大部分都符合国画追求的整体和谐、写意重于描形的特点,这对创作者和鉴赏者的文学艺术素养具有一定要求,其中文人趣味和审美意趣自是不必多言。

由文到图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图像和文字的相互影响之下,原母题的内涵逐渐从一种哲学观向美学乃至生活领域延伸。有的图像既立足于庄子物我齐一、逍遥无为的人生态度,也寄托了画者对生活无奈或豁达处世的情感,令人不禁想到:文人提笔时是否想到庄子?他们对书中表现的道究竟是置身事外,客观不带情感地品读揣摩,还是代入自身,或因体悟了道而潇洒自在,或因共情于双方失意而悲伤?在“人”这个最大的变数之下,每个人的人生经历、

性格气质不同,使得“庄周梦蝶”的寓言犹如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在历史的任一时刻、人的任一心境、文学艺术的任一载体上扎根,生长出不同的故事,由此在“母题要意”的“向心力”和“铺张演绎”的“离心力”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语图漩涡”<sup>[24]</sup>,使得原典中本来平平无奇的物象产生了美的磁场和张力。

## 参考文献:

- [1]孙春旻.表象·语象·意象:论文学形象的呈现机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5(3):115-119.
- [2]朱志荣.论美与意象的关系[J].社会科学,2022(2):186-192.
- [3]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7(5):20-28.
- [4]付骁.文学成像:一个真正的符号学问题?[J].华文文学,2015(4):56-60.
- [5]米歇尔.图像何求?[M].陈永国,高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6]梁奇,计敏.论中国早期文学中的语象构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1):69-75.
- [7]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 [8]朱志荣.论审美意象创构中的“象”[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6):86-94.
-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94.
- [10]吴一文,唐艺嘉.“庄周梦蝶”文化渊源探考[J].贵州社会科学,2014(2):87-91.
- [11]戴胜德.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202.
- [12]陈少明.“吾丧我”:一种古典的自我观念[J].哲学研究,2014(8):42-50.
- [13]包兆会.论语图符号学视野中庄子的象[J].文艺理论研究,2017(6):40.
- [14]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江海学刊,2010(1).
- [15]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187.
- [16]陆机.文赋译注[M].张怀瑾,译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17]李波.诗文中的“庄周梦蝶”意象[J].名作欣赏,2006(18):11-13.
- [18]傅慧敏.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66.
- [19]张旭.中国古代图像中的“梦蝶”意象研究[D].徐州:江苏师范大学,2022.
- [20]周林生.宋元绘画[M].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113.
- [21]宋安群.元曲鉴赏[M].2版.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75.
- [22]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 [23]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19.
- [24]赵宪章.文学理论四题[J].东吴学术,2023(2):21-29.

---

## Presence and Absence: The Literature Imaging of Zhuang Zhou's Dreaming of Being a Butterfly

Deng Xin, Bai Xianj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s image. In ancient literary works, there exists a generation path from the image of an object to the imagery. Images based on these works that are taken as their subject matter have an additional step of imaging. Literature imaging lays an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images. As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stories in *Zhuangzi*, "Zhuang Zhou's Dreaming of Being a Butterfly" has always been well-known and recrea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s a meta image composed of objective images, "Zhuang Zhou's Dreaming of Being a Butterfly"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charm, and its meaning has become even richer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successive literati. When it is represented as an image, literati aesthetics and literati interest consistently ru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with the related works, thus forming a vortex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Keywords:** Zhuang Zhou's Dreaming of Being a Butterfly; meta image; literature imaging

---

(上接第76页)

## On the Forms and Causes of Poetry-Prose Interpenetrat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Jiang Yuting, Li Ding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Poetry and prose essay are both highly influential literary styl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two creatio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motivation,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breaking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creation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of poetry and prose essa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reation of poems and writings that can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re itself. The reason for such a phenomenon comes from four aspects: the late Tang literati's difficulty in avoiding interpenetr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poetry and essay with the same source"; scholars' deliberate pursuit of artistic innovation to establish their intellectual legacies and advance their literary reputations; the humble scholars' attempt to rebel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literati's ideals and actions. The Poetry-Prose interpenetrat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has high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ce, which promotes its future creation and stylistic interpenetration.

**Keywords:** late Tang Dynasty; poetry; prose essay; stylistic interpenetration; literati mentality

# “基础设施捕获”

——人工智能重塑全球新闻业的实践应用与未来展望

张琪云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全球新闻业带来了深度变革。随着全球传播的“深度平台化”,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内嵌于平台的基础设施与应用程序,为新闻机构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然而,新闻机构很难在没有平台公司提供服务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运作,这给新闻业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促使新闻机构转向并依赖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产品,即“基础设施捕获”。展望未来,应注重平台数据的生态治理,完善法律与数据安全监管制度;加强平台嵌入式新闻事实核查,提升新闻从业者的素养;建设自主平台,推动新闻领域的数据主权与治理;开发多语种大模型,打破平台的技术霸权,构建全球新闻发展共同体。

**关键词:**新闻业;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捕获;数智霸权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2.013

##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奇点突破与广泛运用给全球新闻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近3/4的全球新闻机构在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sup>[1]</sup>。自2022年底至今,OpenAI连续推出GPT-3.5模型、GPT-4模型、Sora视频生成模型、GPT-4o全能模型、o3-mini推理模型等,展现出该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引领性的技术创新能力。2025年初,中国公司“深度求索”发布DeepSeek-R1大语言模型,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这股新兴力量凭借其低成本、高性能、开源等特点迅速崛起,冲击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市场格局。

在中美引领的新一轮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浪潮

下,大模型的系列技术革新推动了搜索技术和相关功能的应用,深刻影响着新闻获取的渠道、效率乃至整个网络内容生态。Gemini、Bard、Claude、Grok、文心一言、豆包等海内外众多强劲对手形成技术对垒,全球人工智能市场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和白热化竞争态势,各国逐渐形成基于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竞合共生”的关系,为未来新闻业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从服务内容生产、数据挖掘的辅助性工具跃升为自主生成、精准分发的集成性系统<sup>[2-3]</sup>。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与迭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全球新闻业成为当前传媒领域关注的重点议题。学界和业界机构积极开展相关调研,监测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发展趋势,实时跟进用户和新闻从业者使用人工智能的反馈,发布了一系列基于

收稿日期:2025-03-28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自由探索)“AI作为‘道德行动者’:感知人工智能善念的概念建构、形成机制及其后效”;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奖励计划培育项目“中国非遗文化视频的新媒体传播效果与叙事策略:基于多模态计算研究方法”(202501020018)

作者简介:张琪云(1999—),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数字文化产业。

人工智能实践运用的创新性成果和研究报告。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陶氏(Tow)数字新闻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新闻业中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如何改造、合理化并重塑新闻与公共领域》(202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发布的研究报告《引发变革:关于新闻机构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全球调查》(2023年)和案例研究项目(Journalism AI);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ISJ)发布的《六国公众如何看待新闻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2024年)、《2024数字新闻报告》、《2025媒体和科技趋势与预测》等研究报告。

如今,全球连接迈向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度平台化”时代,数字平台成为全球信息流动与情感交往的新型基础设施,给予新闻机构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例如,Instagram平台偏重视觉呈现和互动,适合生产以呈现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新闻内容,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加自由和流动的空间,改变了传统新闻机构的内容生产界限<sup>[4-5]</sup>。此外,一些新闻机构也选择诸如WhatsApp、Discord等较为封闭、基于群组机制的平台来构建亲密化的新闻社群。近年来,基于强连接社交模式构建的传统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向新闻机构引流的推荐流量逐步下降,而基于非熟人社交关系的视频平台(如TikTok、Instagram Reels)正在强势崛起。调查显示,视频已成为更重要的在线新闻来源,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新闻消费转向在线新闻视频平台,而老年群体仍倾向于通过新闻网站观看视频报道。2024年,Facebook全球新闻消费量大幅下降,而近1/3的全球受访者通过YouTube平台获取新闻;同时,用户通过TikTok平台获取新闻的比例也首次超过了X(原Twitter),许多受欢迎的播客也通过这些视频平台录制和分发内容<sup>[6]</sup>。

学者们使用“平台”概念指“计算领域中支持应用程序的硬件和软件组成的技术架构”<sup>[7]</sup>,或指代“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或公司本身”<sup>[8]</sup>。后文将使用第二种概念内涵,用“平台(公司)”指代科技公司。平台研究分为平台的技术-经济逻辑、平台形塑的文化-社会逻辑、平台基础设施化三大议题<sup>[9]</sup>。就平台基础设施化议题而言,随着平台研究涌现众多跨学科研究,“基础设施”概念被引入<sup>[10]</sup>,平台研究呈现出“基础设施化”转向<sup>[11]</sup>。数字平台在社会中逐渐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例如谷歌等大型平台持续扩张并超出最初的服务范

围,这使得平台和基础设施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平台基础设施化成为前沿话题<sup>[12]</sup>。范·戴克(José van Dijck)、普兰廷(Jean-Christophe Plantin)、尼堡(David B. Nieborg)、赫尔蒙德(Anne Helmond)等学者围绕“平台基础设施化”“数字基础设施”等展开系列研究,平台基础设施化带来的权力聚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也逐渐被更多学者关注<sup>[9]</sup>。基础设施视野下的新闻研究呈现出“平台捕获”和“平台配置”两种研究立场分野<sup>[13]</sup>。就“平台捕获”研究立场而言,新闻业中人工智能的使用展现了当代数字新闻市场的新的捕获方式,即“基础设施捕获”(infrastructural capture)。2018年,埃弗拉特(Nechushtai Efrat)定义其为监督主体(新闻机构/媒体)无法在没有其所监管对象(平台公司)所提供的实体或数字资源与服务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运作,因此对其产生依赖的情形<sup>[14]</sup>。2022年,西蒙(Felix M. Simo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控制或捕获的具体渠道<sup>[15]</sup>。2024年,谢瓦格(Helle Sjøvaag)等学者强调“捕获”概念不只局限于平台,新闻业对第三方服务的依赖深深植根于互联网骨干结构中。平台权力的基础设施化是在对基于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基础设施的“托管”(Hosting)、基于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elivery Networks)基础设施的“分发”(Delivery)、基于互联网交换点(Internet Exchange Points)基础设施的“互联”(Peering)、基于海底光缆(Submarine Fiber Cables)基础设施的“传输”(Transmission)等骨干结构的物理控制中实现的。该生态系统涉及技术公司、电信公司、投资公司、基础产业企业等,正在构建一种“网络化依赖”<sup>[16]</sup>。Facebook、X(原Twitter)和谷歌等大型在线平台的系列服务支持新闻机构的内容生产、传播和盈利方式,推动了新闻的“平台化”<sup>[17]</sup>。

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深刻影响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带来“平台重置”(platform resets)的新浪潮。随着平台深度介入新闻业形成制度化结构,平台凭借其技术和资源优势,与新闻机构等市场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逐渐内嵌为平台的基础设施。这种嵌入能够真正地实现多模态数据的贯通、智能分配、效率优化、标准化保障、规模化输出等功能联动,营造多种共生价值并存和人机协作的生态系统,从而充分地赋能新闻生产全链条再造。在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全球新闻业之前,我们需要梳理平台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特别是“平台重置”背景下人工

智能嵌入平台的表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结构性融入平台生态环境中，与平台架构形成双向依存与共生关系。然而，平台的技术垄断可能使新闻机构逐渐依附于第三方人工智能服务。因此，本文以近期发表的相关报告为参照系，从海外媒体机构的跨界合作切入，梳理人工智能在全球新闻业的应用趋势、问题挑战和未来路径，以期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 二、新闻业中 AI 赋能新闻生产

作为基础设施、终端服务、应用程序，人工智能嵌入平台的路径已经实现了新闻生产的全流程渗透。在当前的全球新闻业实践中，其主要有以下两种形态：1. 拥有国家资金支持或大量资源的新闻机构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服务，并嵌入机构平台当中，以服务内部编辑部人员的特定需求，同时避免对第三方服务的过度依赖。2. 拥有强大技术资源的第三方平台基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基础开发人工智能系统性架构，包括搜索引擎、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并与新闻机构达成合作。新闻机构依托平台提供的优质人工智能服务来赋能和优化新闻生产的全链条。同时，平台吸纳新闻机构的报道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应用（模型训练）的数据库，并为新闻机构提供收入分成。人工智能嵌入平台，被应用于新闻“策、采、写、编、发”等各环节中，新闻机构自发采用“人机共创”模式赋能传统的新闻生产<sup>[18]</sup>。

### （一）新闻机构端：平台化搜索引擎与流量韧性

如今，人工智能嵌入平台正逐渐取代搜索引擎的功能，其角色从“内容索引者”进一步成为“替代性知识生产者”。同时，其集约化、整合性的输出模式将抹平新闻机构的独立性知识生产，其界面开始生成“类似新闻”的答案，从而削弱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可见性。微软 Bing 搜索是首批与 OpenAI 合作并成为提供集成性实时新闻的平台<sup>[19]</sup>。Perplexity 等公司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sup>[20]</sup>，未来将会有更多新闻机构与人工智能平台进行合作。谷歌推出的“搜索生成体验”（Search Generative Experience, SGE）功能将人工智能聊天与传统搜索相结合，能够帮助用户快速获得信息概览、了解新闻要点并激发用户灵感，其支持多种语言，并扩展至超

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可以依据用户的历史搜索趋势自动生成符合目标受众新闻需求的精确标签、关键词和标题，增强“搜索引擎优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效果。

平台通过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工智能引擎，重塑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方式，提升了新闻内容的可见性，并为新闻机构输送有价值的流量。2024 年，尽管 X（原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的新闻推荐流量急剧下滑，但谷歌搜索整体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向新闻机构稳定地输送流量，已经成为许多新闻机构主要引荐的流量来源。

### （二）用户端：平台生态中的多模态信息检索与知识重组

以嵌入 X（原 Twitter）平台的 Gro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可以使社交媒体用户轻松地海量信息中筛选并获取时事新闻信息，解决因信息过载导致用户决策困难的问题，还能对大量已有文本和知识进行分析、训练、学习、推理及联想，进一步重新整合或生成新思路和新知识，激发用户基于检索结果产生新想法。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充分发挥知识“再生产者”和“再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人机协作的智能化工具能够满足用户多模态的信息搜索需求，能够更好地确保用户高效且及时地获取信息。

《瑞典晚报》的“选举伙伴”聊天机器人、《华盛顿邮报》的“询问邮报 AI”实验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金融时报》的“问 FT”试用功能都是新闻机构面向用户推出的人工智能项目，预计未来新闻机构将会把这些服务整合到网站搜索功能中<sup>[21]</sup>。2024 年底，Meta 宣布与路透社合作，路透社将提供新闻内容以支持 Meta 的聊天机器人，Meta 利用路透社的报道内容和链接实时回答用户的新闻问题。

## 三、“深度平台化”时代 新闻业中 AI 面临的挑战

现代技术的本质可以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座架”（Gestell）概念来思考。现代技术不是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工具性手段，而是一种“解蔽方式”<sup>[22-23]</sup>，会带来功能化、替代等系列危机。平台与新闻机构的关系由此亦敌亦友：一方面，平台为新闻机构托管、制作和分发

内容,提供广告、数据分析和洞察工具等集成服务;另一方面,新闻机构也增强了“平台依赖”<sup>[24]</sup>。如今,我们身处于“平台依赖”的传播格局,基于平台的新闻呈现形式并没有显著地提升受众对新闻的探索欲,平台推荐机制使得用户被娱乐性和便捷性的新闻消费所吸引<sup>[25]</sup>。

### (一)平台依附:新闻机构的控制权转移与自主权让渡

由于人工智能开发对数据和算力的超高需求,平台占据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开发定制化人工智能的高昂成本让大部分新闻机构都难以承受,因此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依托平台等第三方为新闻机构提供受众分析、智能推荐、广告收益等方面的服务,但这削弱了新闻机构对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运用能力。此外,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主要基于数据和算法,很难展现出与人类一样鲜活且复杂的情感、道德和价值观。传统上更多依赖新闻从业者直觉和经验的工作流程,被以追求理性、效率、实用和结果为目标的人工智能所介入或取代。新闻生产过程更加标准化与自动化,更偏向“工具理性”的导向。随着技术不断演进和发展,新闻从业者可能会对人工智能产生过度依赖的“工具崇拜”心理。同时,公众也开始逐渐依赖平台获取新闻内容,一项针对阿根廷、巴西、德国、日本、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八个国家的调研显示,谷歌、必应和雅虎等搜索引擎是公众搜索政治新闻信息时使用最广泛的在线平台类型<sup>[26]</sup>。这些都使得新闻机构逐渐依附于不止一家平台所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和基础设施,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平台是较为受欢迎的选择。

除此之外,过度依赖第三方人工智能服务可能会对新闻机构的商业模式、技术条件和把关人地位构成潜在威胁。新闻机构被外部势力控制并失去部分或者全部的自主权,即控制权转移,对新闻从业者而言则限制了其自由决策能力。这种情形被称为“媒体捕获”(Media Capture)<sup>[27]</sup>,此处的“捕获”等同于(隐性/显性的)“控制”,具体指“捕获主体对新闻机构的状态和/或行动有影响力,并可以利用这种控制为自己谋利”<sup>[15]1839</sup>。随着人工智能在新闻业的广泛使用,这种“死亡之握”的权力控制只会愈演愈烈。因人工智能的复杂性、技术门槛和高昂的转换成本,平台对新闻机构的控制会不断增强,以至于新闻机构被第三方人工智能服务及产品所束缚和绑定。特别是在平台与新闻

机构经济利益不一致或出现矛盾时,新闻机构的主导地位将被削弱,面临被“一刀切”的风险,并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技术支持。调研显示,1/6的受访者较为担忧政治极化、对媒体的攻击增加和媒体被操控等方面会对新闻业的自由运作产生威胁<sup>[21]</sup>。在此背景下,“媒体捕获”日益转向“平台捕获”(Platform Capture)<sup>[28]</sup>。“媒体捕获”“平台捕获”和“基础设施捕获”概念都强调平台等外部行为者控制新闻业并带来一系列影响。

### (二)数据合规性危机:平台大模型训练中的数据泄露和法律争议

人工智能训练中的数据合规性、版权争议和隐私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新闻业的知识产权争议,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公司面临的重大法律挑战。在新闻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因未经授权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报道内容来构建和运行其人工智能系统而面临起诉,特别是新闻业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版权纠纷时有发生。2023年12月,《纽约时报》成为首家将OpenAI告上法庭的大型媒体机构,起诉OpenAI和微软未经授权复制、使用《纽约时报》的时事新闻内容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并要求数十亿美元的高额赔偿。《纽约时报》强调,ChatGPT的免费开放语料库中《纽约时报》的新闻稿数量仅次于谷歌专利和维基百科,并且生成的内容与原报道相似度极高<sup>[29-30]</sup>。2025年1月14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美联社、新闻集团和沃克斯传媒已与OpenAI达成内容共享协议。然而,《泰晤士报》、《纽约每日新闻》和调查报道中心对OpenAI和微软的诉讼被合并为一起案件,指控OpenAI非法使用其新闻作品来创建具有竞争性的人工智能产品,威胁新闻机构本身提供该服务的能力<sup>[31]</sup>。此外,2024年10月,道琼斯和《纽约邮报》诉讼Perplexity AI,指控其将大量拥有版权的新闻复制到数据库里面,并宣传推广其借助“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网络上最新、更具体的信息整合到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中”,在工具界面“跳过链接”为用户直接提供AI生成的新闻摘要<sup>[32]</sup>。

### (三)数智霸权:平台的技术垄断加剧区域间差异

“深度媒介化”时代,掌握渠道、平台乃至“网关”(gateway)的机构将主导全球新闻传播的未来。也就是说,新闻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差距与新闻

机构资源、媒介基础设施状况等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在线平台上的新闻消费日益碎片化,在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域和国家差异,其中变化最快的是“全球南方”地区<sup>[6]</sup>。“全球南方”最初源于1926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南方”概念,并于1969年在奥格尔斯比(Cal Oglesby)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中被提出。“全球南方”在新时代被赋予更多地理、政治、历史和发展诉求等层面的内涵,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sup>[33]</sup>。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并非指地理位置在南半球的国家,而是指在历史和政治层面上形成反西方、反殖民、反霸权和反强权传统的国家。如今,全球数智发展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实力和财富匮乏,面临更多知识差距、资源限制、资金限制、技术发展落后、语言障碍、基础设施不全、法律和政治待完善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因素加剧了不同新闻机构间的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当地社会和文化环境还会赋予新闻机构额外的挑战,进一步强化了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差异与权力控制。

海德格尔提出的“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sup>[34]</sup>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以“数字集置”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技术对于人类思维的反向构造。这种现代数字技术的本质更多体现在底层语料库及其算法偏见上,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算法偏见对边缘化群体的影响十分严重。例如,ChatGPT模型的互联网语料库C4中对阿拉伯种族带有消极偏见<sup>[35]</sup>。ChatGPT不会帮助非西方国家撰写反对西方叙事的新闻报道,而辅助撰写非洲国家的特写报道时往往提到战争、贫困、腐败等刻板印象<sup>[36]</sup>。此外,“全球南方”国家的公众也感知到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学习中所暗含的偏见。例如,在巴西和阿根廷,公众普遍担忧平台中呈现的信息和政治观点存在系统性的偏见<sup>[26]</sup>。除了系统性偏见外,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也受到包括技术垄断、资源差异、文化偏见和语言挑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使用人工智能受到结构性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等重大障碍的制约,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sup>[37]</sup>。例如,部分非洲国家没有关于在新闻制作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方针,可能是该国媒体机构资金有限所致;与此相反,“全球北方”媒体机构已经快速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方针<sup>[38]</sup>。另一方面,

因互联网普及率、平台限制乃至国际政治等问题,一些人工智能服务(如ChatGPT)暂时不支持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访问,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古巴等。这都凸显了新闻业中人工智能应用的地区性差距。平台通过对边缘群体的压迫、控制和掠夺,持续强化“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间的不平衡趋势,可能使“全球南方”在数据权力的竞争中逐渐丧失话语权和自主权,进一步导致“全球南方”陷入“数字贫困”的循环中。

#### 四、全球新闻业中AI的未来展望

未来,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多元且错综复杂的。如何在“深度平台化”时代构建和营造新闻业与人工智能相互协调发展的环境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课题。

##### (一)平台数据的生态治理:完善法律与数据安全监管制度

当前,新闻版权侵权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模型是否可以通过“合理使用”(fair use)获取海量网络公开数据(如新闻报道)进行训练,关键是如何在人工智能与新闻业交叉领域界定“合理使用”这一概念。“合理使用”必须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转变为具有显著变化的新内容,或对原作品进行评论、回顾,且新作品不能与原作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等。平台将新闻机构的大数据转换为免费数据输入语料库进而获利,关于数据的权力斗争也进一步加剧了版权纠纷。相关政府部门与监管机构应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解释,以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管机制。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重视对虚假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和科技公司对个人数据的处理等方面的政策设计<sup>[26]</sup>。对于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而言,应该强化法律风险意识,加强隐私、版权保护和数据安全监管。对于媒体而言,需引导公众了解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和新闻价值,增强公众对新闻业的支持度。

##### (二)平台嵌入式新闻事实核查:改善算法偏见与提升素养

缺乏人工智能素养的新闻从业者难以辨别平台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的内容是否包含虚假信息,因而常被“AI幻觉”所迷惑,从而传递“假新闻”,消解新闻真实性并造成负面的公众舆论。例如,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人工智能生成的战争、政

治和选举等重要议题的虚假信息,让受众难以识别,甚至被欺骗。与此同时,算法黑箱也加剧了人工智能嵌入平台的不透明度和对少数群体的认知偏见。大模型基础语料库使人们通过知识、信息、观念、文本形式及风格等集成要素进行认知连接,其产生的偏见与大模型训练语料集本身存在的偏见、模型算法的设计(即设计者的文化偏见)相关<sup>[39]</sup>。因此,新闻从业者应提升AI素养、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在使用大模型时需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通过多种大模型进行审查、交叉验证和监督,确保能够提前识别到各类安全风险和信息漏洞,对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可能引发的各类危机做好应对措施,从而不断完善新闻的事实核查机制。我们需从根本上解决大模型的自我审查问题。例如,在大模型中植入反“AI幻觉”的检测机制,等等。针对新闻事实核查的法律治理,我们需从源头防范、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等方面进行立法规制和行政监督,特别是在治理中关注负面使用结果。此外,我们还可以开发嵌入平台的新闻追踪系统,实时对信息内容进行事实核查、删除虚假新闻等。

### (三)自主平台建设:推动新闻领域的数据主权与治理

“全球南方”倡导建设自己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应用程序等,运用技术建设自己的“数字托管平台”来抵抗外部控制并支持“共同目标”和保持“自主权”<sup>[40]214-215</sup>。例如,印度本土社区拒绝了大型科技公司开发的语音识别应用程序,选择开发自己的AI语言工具,通过收集和管理语言数据的方法,抵抗外部平台对其语言乃至文化的控制和压迫。新闻公共活动的平台化需从单一的中心行为体的责任模式转向平台、用户和公共机构共同参与、动态互动的协作治理模式<sup>[41]</sup>。例如,新闻机构可以从关注垂直流量和垂直视频两个方面来建设自主平台:通过实时通信平台、播客等方式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从而控制自有渠道,培育新世代忠实用户;同时,还可以在自有新闻网和APP上发布视频吸引用户回流<sup>[42]</sup>。在体制内展开工作、与体制对抗、超越体制行动是三种对抗数据掠夺的可行策略<sup>[40]221-222</sup>。在体制内行动层面,存在两种可能的监管方式:一是“数据国有化”,即数据为国家资源;二是将数据视为“原材料”,由政府监管,并向社会以“共享数据”的资源形式开放<sup>[40]224-225</sup>。在超越体制的运作层面,强调想象一种新的世界观,尝试构建“反殖民数据管理体系”,替代性的数据主

权模型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案例<sup>[40]236-238</sup>。中国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的新主张有利于数据跨境的国际合作,中国已经与德国等国家签署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并建立数据政策法规的多边对话交流机制,以便更好地实现技术主权保障。未来,我们要持续加强数据应用与交易的标准化,推动数据确权、数据资源的合理使用与调用,进一步完善新闻数据库的自主建设和制度体系建设,共建多方参与、共享的数据治理新生态,塑造开放、安全与公正的国际传播秩序,使人工智能真正为全球新闻业的平衡发展和繁荣共生赋能、赋智、赋力。

### (四)平台数据反殖民:开发多语种大模型与打破技术霸权

大型平台正以数据掠夺的形式对个人数据甚至新闻机构的报道数据进行商品化和私有化,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使用中加深了对资源相对短缺的新闻机构的数据剥削。占主导地位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网关等不可见的媒介基础设施贯穿数据殖民的数据生产、收集与传输的各个环节<sup>[43]</sup>,这类数据关系可能塑造了一种21世纪独有的新型“数据殖民主义”形式。如今,以基于英语语料库的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正塑造并主导着现有的全球传播格局,数据底层的技术逻辑所带来的刻板印象和语言霸权会深刻地强化“中心—边缘”的传统地缘格局。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大多数新闻机构仍持积极态度应对,特别是“全球南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建设和使用,并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新闻机构间的合作,尤其希望开发更多符合“全球南方”国情的非英语语言的模型。2025年初,DeepSeek的崛起开拓了基于多语种数据集的大模型技术路径,为非英语语言的大模型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的技术霸权,为重建全球数智传播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开发多语种大模型需要质量良好的多语言预训练模型、充足且多语种的训练数据等基础,但未来可能存在幻觉、知识编辑、安全性、语言扩展、多模态扩展、可解释性、部署效率等问题<sup>[44]</sup>。“全球南方”虽然受到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但通过开发去中心化的技术、使用开源软件、小型新公司的抱团取暖、开发独属于“全球南方”的数据集等实践,能够团结起来、以打持久战的心理韧性共同抵制“数字剥削”和对抗现有的平台霸权困境,从数智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探索更加包容、多元和共

通的全球化人工智能使用路径。此外,新闻业的思考和决策链需遵循“人一机一人”的方法,强调人类的监督和验证,把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从而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消除偏见,打破平台垄断<sup>[45]</sup>。未来,需进一步突破人工智能“南弱北强”的发展格局,构建数字资源合理分配的南南合作机制,共建全球新闻领域的发展和治理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1] CHARLIE B, MIRA Y. Generating change: a global survey of what news organisations are doing with AI [EB/OL]. [2025-02-20]. <https://www.aiunplugged.io/wp-content/uploads/2023/10/Generating-Change-A-global-survey-of-what-news-organisations-are-doing-with-AI-By-Cyber-Gear.pdf>.
- [2] SONNI A F, HAFIED H, IRWANTO I, et al. Digital newsroom transform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journalistic practices, news narrativ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J]. *Journalism and Media*, 2024, 5(4): 1554-1570.
- [3] KOTENIDIS E, VEGLIS A. Algorithmic journalism: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Journalism and Media*, 2021, 2(2): 244-257.
- [4] PERREAULT G P, HANUSCH F. Normalizing Instagra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4, 12(4): 413-430.
- [5] 白红义, 刘畅, 姚舟怡, 等. 2024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 [J]. *新闻记者*, 2025(1): 71-98.
- [6] NEWMAN N. Overview and key findings of the 2024 digital news report [EB/OL]. (2024-06-17) [2025-02-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4/dnr-executive-summary>.
- [7] MONTFORT N, BOGOST I. Racing the beam: the Atari video computer system [M]. MA: Mit Press, 2020: vii.
- [8] GORWA R. What is platform governance?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9, 22(6): 854-871.
- [9] 易前良. 平台研究: 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 基于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学术考察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12): 58-75.
- [10] 刘洁, 刘战伟. 平台基础设施、数字主权与新地缘政治: 一项基于抖音和TikTok的研究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5, 78(2): 97-108.
- [11] 郭小平, 杨洁茹. 传播在云端: 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 [J]. *现代出版*, 2021(6): 30-37.
- [12] CHEN J Y, QIU J L. Digital utility: datafication, regulation, labor, and DiDi's platform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3): 274-289.
- [13] 姬德强, 余威健. 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 : 一个理论视角的兴起与进路 [J]. *青年记者*, 2025(3): 5-14.
- [14] EFRAT N. Could digital platforms capture the media through infrastructure? [J]. *Journalism*, 2018, 19(8): 1043-1058.
- [15] SIMON F M. Uneasy bedfellows: AI in the news, platform companies and the issue of journalistic autonomy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10(10): 1832-1854.
- [16] SJØVAAG H, FERRER-CONILL R, OLSEN R K. Capture beyond the platforms: the material and infra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digital journa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5, 13(7): 1331-1350.
- [17] POELL T, NIEBORG D, DUFFY B, et al.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OL]. // The 1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AOIR), 2017: 1-19 [2025-02-20]. [https://pure.rug.nl/ws/portalfiles/portal/103169850/AoIR2017-Platformization\\_of\\_Cultural\\_Production.pdf](https://pure.rug.nl/ws/portalfiles/portal/103169850/AoIR2017-Platformization_of_Cultural_Production.pdf).
- [18] 张琪云, 黄枫怡. 生产视角下 ChatGPT 对新闻业的重塑、冲击与风险 [J]. *新闻前哨*, 2023(19): 78-80.
- [19] NEWMAN 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4 [EB/OL]. (2024-01-09) [2025-02-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24>.
- [20] Reuters. Meta Platforms to use Reuters news content in AI chatbot [EB/OL]. (2024-10-26) [2025-02-20].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e/meta-platforms-use-reuters-news-content-ai-chatbot-2024-10-25/>.
- [21] NEWMAN N, CHERUBINI F.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5 [EB/OL]. (2025-01-09) [2025-02-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25>.
- [22]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3-15.
- [23] 海德格尔. 人, 诗意地安居 [M]. 邢元宝,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9-104.
- [24] NIEBORG D B, POELL T.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1): 4275-4292.
- [25] 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 2024年全球新闻创新新报告 [J]. *新闻记者*, 2025(1): 18-40.
- [26] EJAZ W, FLETCHER R, NIELSEN R K, et al. What do people want? Views on platforms and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 eight countries [EB/OL]. (2024-11-28) [2025-02-20].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what-do-people-want-views-platforms-and-digital-public-sphere-eight-countries#header--4>.
- [27] SCHIFFRIN A. In the service of power: media capture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2017: 33-42.
- [28] SCHIFFRIN A. Media capture: how money, digital platforms, and governments control the new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30-45.
- [29] ALLYN B. 'New York Times' sues ChatGPT creator OpenAI,

- Microsoft,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EB/OL].(2023-12-27)[2025-02-20].<https://www.npr.org/2023/12/27/1221821750/new-york-times-sues-chatgpt-openai-microsoft-for-copyright-infringement>.
- [30] ALLYN B. 'New York Times' considers legal action against OpenAI as copyright tensions swirl[EB/OL].(2023-08-16)[2025-02-20]. <https://www.npr.org/2023/08/16/1194202562/new-york-times-considers-legal-action-against-openai-as-copyright-tensions-swirl>.
- [31] ALLYN B. 'The New York Times' takes OpenAI to court. ChatGPT's future could be on the line [EB/OL]. (2025-01-14) [2025-02-20]. <https://www.npr.org/2025/01/14/nx-s1-5258952/new-york-times-openai-microsoft>.
- [32] CHMIELEWSKI D, PAUL K. Murdoch's Dow Jones, New York Post sue Perplexity AI for 'illegal' copying of content [EB/OL]. (2024-10-22) [2025-02-20]. <https://www.reuters.com/legal/murdoch-firms-dow-jones-new-york-post-sue-perplexity-ai-2024-10-21/>.
- [33] 吴志成, 王尹泽. "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发展[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4): 110-119.
- [34] 海德格尔. 存在之天命: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 孙周兴, 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8: 147.
- [35] 何小雨. 海德格尔技术批判哲学视域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8): 35-42.
- [36] GONDWE G. CHATGPT and the Global South: how are journalists in sub-Saharan Africa engaging with generative AI? [J]. *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2023, 2(2): 228-249.
- [37] AZAROUAL 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fric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B/OL]. (2024-05-16) [2025-02-20]. [https://www.policycenter.ma/sites/default/files/2024-09/PB\\_23\\_24%20%28Azero-ual%29%20%28EN%29.pdf](https://www.policycenter.ma/sites/default/files/2024-09/PB_23_24%20%28Azero-ual%29%20%28EN%29.pdf).
- [38] UMEJEI E, AYISI A, PHIRI M,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ournalism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 optimists, pessimists, and pragmatists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5: 1-17.
- [39] 彭兰. 智能传播技术驱动的“认知连接”[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8(1): 71-78.
- [40] MEJIAS U A, COULDRY N. Data grab: the new colonialism of big tech and how to fight bac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4.
- [41] HELBERGER N, PIERSON J, POELL T. Governing online platforms: from contested to cooperative responsibility [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8, 34(1): 1-14.
- [42] 史安斌, 刘勇亮. “平台依附”时代的新闻自主: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新闻业生态[J]. 未来传播, 2024, 31(5): 24-30.
- [43] 陆国亮. 数据殖民的物质痕迹: 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对话[J]. 新闻界, 2022(6): 86-96.
- [44] QIN L, CHEN Q, ZHOU Y, et al. A survey of multilingu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J]. *Patterns*, 2025, 6(1): 1-30.
- [45] DE-LIMA-SANTOS M F, YEUNG W N, DODDS T. Guiding the way: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AI guidelines in global media [J]. *AI & SOCIETY*, 2024, 40(4): 2585-2603.

## "Infrastructure Capture"

###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ing Global Journalism

Zhang Qiy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global journalism industry. As global communic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deeply platformized", AI is gradually becoming embedded within platforms as both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fering enhanced services to news organizations. However, it is challenging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o operate sustainably without relying on services provided by platform companies. This dependency gives rise to numerous issues and challenges, pushing news organizations to adopt and rely on AI products offered by platforms—a phenomenon known as "infrastructure capture." Looking ahea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platform data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and data security regulatory systems.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platform-embedded fact-checking mechanisms and enhanc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literacy. Independent platforms can be built to promote data 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s field. Meanwhile, developing multilingu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can help break the technological monopoly of major platform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journalism community.

**Keywords:** journal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 capture; digital-intelligent hegemony

# 台州学院教育硕士学位点简介

## 师资力量



乐传永教授在第61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上作专题报告



李建军教授参加和合文化全球论坛

学位点共有专任导师79人，行业导师36人。专任导师中教授34人，副教授44人，博士生导师6人，博士67人，分别来自教师教育（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学位点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浙江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等高层次人才；聘请地方教育管理专家、资深校长与中小学一线名师担任行业导师。

近五年来，学位点专任导师主持国家级课题28项，省部级课题36项，在CSSCI来源期刊及其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7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转摘。多人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等奖项，1项成果获国家领导人批示。

## 科研实践平台

学位点依托浙江省教师教育基地、浙江省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平台，根据培养方向的不同，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科研平台，如台州市大陈岛垦荒精神研究中心、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台州学院研究中心等。除此之外，学位点还拥有浙江省“十四五”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名师摇篮”卓越教师培养流动站等育人平台。同时，与临海市人民政府、台州市教育局签署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与台州市外国语学校、台州学院附属中学等学校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与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着力淬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院领导为行业导师颁发聘书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联培基地签约仪式

## 中国·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韩得满

Editor-in-chief Han Dema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Postcode 317000

网址

The URL <https://journal.tzc.edu.cn>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E-mail [xbb@tzc.edu.cn](mailto:xbb@tzc.edu.cn)

电话

Tel. 0576-85137169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8卷 第2期

(总第256期) 2026年4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56) Vol. 48 No. 2 Apr. 2026

封面题字: 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定价: 12.00元



ISSN 1672-3708



9 771672 370265